

目 录

回忆毛主席关于“绥远方式”

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曹志浩 (1)

参加绥远和平解放工作的回忆 柯树声 (7)

绥远“九·一九”起义回顾 董其武 (22)

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

——绥远“九·一九”起义的回忆 孙兰峰 (54)

绥远“九·一九”起义侧记 周北峰 (67)

光辉的里程

——回忆绥远光荣起义三十周年 胡景通 (78)

一九四九年绥远省“九·一九”起义

的片断回忆 孟昭第 赵晓峰 王 兴 (83)

回忆绥远“九·一九”起义 王雷震 (91)

绥远之光

——纪念绥远起义三十周年 王景林 (100)

参加绥远起义的前前后后 樊折桂 (109)

冲破重重险阻 踏上革命征途

——忆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 安思达 (117)

对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情况的一些回忆 潘瑞征 (135)

我所知道的绥远和平解放的一些情况 李福志 (141)

- 我在“九·一九”起义过程中……………梁子村（150）
- 绥远《奋斗日报》社被砸前后……………李西桥（158）
- 绥远省“九·一九”起义前片断回忆……………张鸿恩（165）
- 我是怎样由北平来到绥远的……………苍一平（174）
- 绥远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参加
“九·一九”起义经过……………尔 萨（整理）（179）
- “九·一九”起义在河套……………董美炳（187）
- 解放前夕 武川一片混乱……………赵淑普（194）
- “九·一九”起义回忆片断……………李国斌（205）
- 从“河曲会议”到“绥远起义”
——邓宝珊与傅作义的认识和共事始末……………杨令德（209）

资料

回忆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曹志洁（247）

- 附录：（一）一九四九年四月划定停战线前
双方部队对峙示意图
- （二）一九四九年四月划定停战线后
双方部队防区示意图

回忆毛主席关于“绥远方式” 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鲁志浩

今年是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这个战略方针在绥远地区胜利实现的三十周年，也就是绥远“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这个战略方针不仅有历史意义，对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来说，也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散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回忆当时“绥远方式”的实现，完全是在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

了傅作义将军，并将“绥远方式”的战略思想告诉了傅作义将军。随后，我党和傅将军双方指派了代表（我方为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方为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在华北局薄一波、聂荣臻同志的指导下商定了“绥远和平协议”。协议内容大体是：划定双方部队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和在绥西（归绥以西地区）通用人民币问题。以及由华北人民政府派出驻归绥联络处为我方代表机构，协同执行协议，推动绥远的和平解放。当时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我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傅方为董其武将军（由康保安代签）。

在实现“绥远方式”战略方针的过程中，是经历了尖锐复杂和曲折的斗争的。

一、国民党特务枪杀我联络处人员，阴谋破坏和平谈判。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是一九四九年七月进驻归绥的。联络处的处长是潘纪文，主任是鲁志浩，还有李贵、曹文玉、何树声、张露、李文超、于峰等同志。此外还有一个铁路工作组，组长是郎觉民；一个银行工作组，组长是张光；还带一个警卫排、一部电台。进城后驻在西落凤街。联络处首先与董其武将军商妥，按照北平和平协议开展工作的安排；铁路工作组与归绥铁路部门商谈通车步骤；银行工作组与当地银行研究绥西通用人民币和贸易问题。由于共产党解放区的工作人员，不断出现在归绥市的街道上，广大人民群众认为和平解放的前途是有希望了。当时平、津已经解放，以张庆恩为首的国民党特务成批地潜入绥远。他们为了破坏和谈，在七月下旬的一天，当铁路工作组的部分同志由旧城回车站，路经当时的“纯一善社”（即今联营商店以东附近）时，突然遭到武装特务的袭击。当场三个同志受伤，其中王士鑫同志（铁路工作组的秘

书)因伤势严重,送医院抢救无效,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献出了生命。当时归绥便衣特务到处活动,阴谋继续谋杀我方谈判人员,联络处的同志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在此情况下,联络处除留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少数同志,由鲁志浩负责坚持联络处的工作以外,其余全部由潘纪文同志率领撤回解放区。联络处的同志移住德王府(在新城建设厅街)以后,特务曾向院内冲击几次未能得逞。一天中午,曾有便衣武装特务二人撞进院内,幸被联络处警卫员发现,当即将其赶跑。惨案发生后,联络处大部人员撤走,当时归绥市内已经出现的和平气氛,又为战争的紧张空气所笼罩,有的人已开始西迁,以避免战祸。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华北局及时指示,揭破敌人枪杀我联络人员破坏和谈的阴谋,坚持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不变。对此,联络处曾邀请绥远地区国民党政府全体厅局级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讲明党的政策;还通过到学校、工厂参观,以及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进行访问,广为宣传坚持和平解放的方针。尤其是对一些实力人物,沟通思想,解除顾虑,说明和平解放既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又有利于个人的前途,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稳定了局势,促成起义的早日实现。继之,联络处又派刘志远、金毅二同志开展了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指导一部分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后来,绥远人民政府进城以后,一些中小学的领导骨干,就是当时读书会的积极分子。

二、美蒋反动派百般阻挠破坏和谈。国民党中央阴谋将主和的董其武将军调离绥远,并促使部队西撤,但遭到拒绝。特务们见整体西撤的目的难以实现,遂分化部队将领,以牵制起义并争取部分人员西撤。当时,国民党中央曾宣布成立第九兵团,以高官厚禄拉拢分化绥远部队,企图达到破坏全部起义。与此同时蒋介石、阎锡山一方面亲自电令绥远部队西撤,一方

面通过蒋帮分子潘秀仁、郭运民等，制造混乱，发动西撤，并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乘飞机前来，亲自劝诱董其武、孙兰峰将军的部队西撤。这种情况，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九·一九”起义前夕，蒋家王朝还不甘心失败，乘傅作义先生来绥远之机，再次派徐永昌飞绥，从中破坏，终至被“九·一九”起义通电逼离绥远为止。

三、“九·一九”起义后，反动特务策动部分起义部队哗变，枪杀我官兵一百余人。当时，起义部队的一个军长，一个骑兵师长和绥南保安司令是公开反对起义的。他们，有的提出要收缴联络处的枪支，有的提出要限制联络处的活动，特务们还包围少数将领，迫使某些将领拒绝起义。这些，在后来虽然都为党的和平解放绥远的正确政策和以傅作义、董其武将军为首的拥护和平的力量所粉碎，但在当时阻力是很大的。傅将军曾派张濯清、王克俊等人，来绥协助董其武将军进行发动起义的工作。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傅作义将军在八月底亲来绥远（从北京到丰镇由潘纪文同志陪同，由丰镇到归绥由鲁志浩同志陪同），从傅、董部队内部作了说服推动工作。这样终于在九月十九日由董其武将军领衔，有孙兰峰、俞方皋、张钦、柴祥等三十九位将领和各方代表人士签名，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脱离美蒋反动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人民的道路。

在起义部队整编的过程中，反动特务又策动部分起义部队哗变，杀害包括我县、团级干部杨金山、彭志超、王锦云同志在内的革命同志一百余人。这一情况与和平谈判联络人员王士鑫同志的被枪杀，都说明在和平解放绥远的过程中，是有着尖锐复杂的情况和流血斗争的。

毛主席、朱总司令接到“九·一九”起义的通电后复电

说：“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时，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说：“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毛主席关于“绥远方式”这一战略方针之所以能够胜利实现，是由于：

一、当时全国形势具备了实现“绥远方式”的客观条件。一九四八年底，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就全国形势来看，共产党解放军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绥远地区国民党的军队，已处在战必败、逃必垮的情势下。

二、“绥远方式”战略方针的伟大正确。它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不仅可使双方十多万军队免于战斗伤亡，使其有四百年历史的归绥和文物古迹得到保全，而且使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战争灾祸，并给当时国民党部队和军政人员以光明的前途和出路。因此这个伟大的战略方针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同时更重要地是为全国即将解放的国民党占领区残余部队树立了榜样。

三、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又对和平解放绥远作了有力的具体部署。在此情况下，起义部队以傅、董为代表的将领们，激于爱国思想、深明大义、认清形势，接受了党对和平解放绥远的号召，从而下定了走向人民方面的决心。

和平解放以后，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包下来，团结使用、教育改造。对起义以前的历史罪行，在不继续搞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下，既往不咎。这一政策几十年来坚持不变，将来也

不会改变。回顾解放三十余年来，起义的人员，经过工作、学习，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绝大多数人跟着共产党走过来了，不少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起义人员的儿女后代和全国人民的儿女后代一样，分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个战线上。这是何等可喜的情景啊！当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全国人民都在新的长征路上，大踏步地前进，起义人员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同样是老当益壮，奋发图强，学习、工作，光荣地过好自己的晚年，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各尽自己可能尽到的力量。

“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了。实践证明“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它闪耀着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光辉，它在当时，推动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绥远方式”也团结了爱国人士，孤立了反动派，有利于全国的革命和建设。“绥远方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思想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斗争中，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参加绥远和平解放工作的回忆

何树声

一九四九年，我在中共绥远省委工作，组织上派我参加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工作，经历了绥远的和平解放。这当然是三十一年前的事了，但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解放军直迫归绥城

一九四八年冬天，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充满着凄惶、绝望的情绪。国民党在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的惨败，使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军队，完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解放战争的烈火已在傅作义当时统治的晋冀热察绥五个省中熊熊燃烧起来。

十二月二十二日，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新保安全歼了傅作义多年亲自训练培养、伴随他数十年的王牌部队——三十五军，素以强悍著称的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戕身死。三十五军的被歼，使傅作义坐镇的华北局势，更加风雨飘摇！

十二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攻克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傅作义所部十一兵团和一〇五军全部被歼，察哈尔全部解放，跟随傅作义多年的察哈尔省主席孙兰峰逃到绥远。

元旦刚过，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

一月十七日，华北重要港口塘沽解放，傅作义部海逃之路

被截断。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使绥远省国民党军政当局瞠目结舌，惊慌失措。更使他们焦灼不安的是，绥远卓资山以东地区也全部解放了。元旦以后，人民解放军又向绥远省省会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挺进，前锋已达旗下营，直迫归绥城（离归绥城只有四十来公里）。

绥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面临覆灭的命运，充满着末日来临之感。驻守绥远的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坐卧不安。自三十五军被歼，察哈尔解放。他的部队同傅作义其它部队在地理上的联系割断了，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三十年来的戎马生涯，他从未处过如此的困境。他是傅作义将军的老部下，跟随傅作义将军数十年，随着傅作义将军擢升而擢升。抗战初期，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得力部员，驰骋疆场，累建军功。抗战胜利后，他跟着傅作义，率领军队，向绥远、察哈尔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夺取了包括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在内的一些城镇，傅作义被任命为所谓华北“剿匪”总司令，移驻北平。然而曾几何时，形势急转直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董其武和傅作义早年隶属阎锡山。曾和共产党有过交往。一九三六年傅部在百灵庙抗战大捷，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特意从陕北给傅作义发了贺电，并派南汉宸携带慰劳款和锦旗前来绥远参加祝捷。“七七”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以及晋西北各个战役中，与傅作义的部队曾有所配合。一九三八年，傅作义部队从太原战役溃退下来后，应傅作义的要求，共产党还派了一些干部帮助傅作义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抗日动员工作。当时，傅部驻晋西北有两个师、一个旅，其中的一些政治干部就是由延安派来的。共产党还为傅部动员补充了几千名士兵。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不

久就被蒋介石破坏了。一九三九年，傅离间投蒋，蒋派大特务张彝鼎任傅作义的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傅作义以“欢送”为名将共产党派来的人员全部送走，换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人。从此傅部就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这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前景越黯淡，而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傅作义被围，孙兰峰被打跨，而董其武手下仅有的四万多人马，也已处于外无援兵、势孤力穷的境地。但是，董其武也还存在着幻想。他不相信自己就这样失败了，还幻想着傅作义还有几十万军队，事情也许还有可为。

党中央提出“绥远方式”

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困守北平的傅作义，或者率部起义，或顽抗覆灭，已不可能创造任何奇迹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傅作义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北平终于解放了。晚上，坐镇归绥的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感到震惊。他和傅作义的关系十分密切，傅每采取重大步骤必先告知董其武。董其武对傅也是忠贞不贰。他的办公室里从来就不挂蒋介石像，只挂傅的大幅照片。如今傅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事前为什么没有通知和征询他的意见呢？他立即向北平打了电话，要傅作义派飞机接他去北平。二十二日他到北平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董其武问道：“北平和平起义的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傅作义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研究了绥远问题。考虑到绥远部队以及董其武同傅作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党中央认为，绥远问

题可以不用战争方式而用和平方式解决。不久毛主席就解放绥远问题和傅作义作过一次谈话。毛主席说：“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解决”。并说：“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先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还对傅说：“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去看你的旧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了“绥远方式”。毛主席说：“绥远方式，……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三月间，华北局和傅作义具体协商绥远和平解放问题，商定双方各派代表在北平协商。我方的代表是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同志，国民党绥远当局方面的代表，傅作义指定周北峰（华北剿总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王克俊（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阎又文（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担任。双方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五月二十八日，举行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共产党方面代表为董必武、薄一波、张友渔、杨秀峰。傅作义方面的代表为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绥干团教育长）。在协议上签字的共产党方面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绥远方面是董其武（由康保安代表签字）。协议的内容大体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

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确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协议还规定，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

签字仪式后，华北人民政府立即着手筹组驻绥联络处，责成中共绥远省委抽调人员组成，并在绥远丰镇作准备工作。当时中共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设在丰镇。联络处的组成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和我等二十余人。潘纪文任处长，鲁志浩任主任，他们都是富有统战工作经验的同志。抗战初期曾被党派往傅作义部队做政治工作。潘是傅部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鲁是三十五军二一一旅（后改编为新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联络处下面分两个组，即铁路工作组和银行工作组。

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就要付诸实施了。这个革命的协议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但它的实施还将要经历一场严峻的斗争。

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搏斗

在北平签订和平协议时，双方约定联络处于七月十五日进驻归绥，但是董其武方面对此迟迟不见行动，我方曾派人送信联络，也无消息。我们决定先派少数人去归绥商谈联络处进驻事宜。鲁志浩、曹文玉和我等几个同志到旗下营后，又由我和北平傅作义方面派来的工作人员肖如芝（原华北剿总总务处上校课长）陪同去归绥，与董其武联系。七月十日，我们乘汽车由旗下营出发，路过白塔车站附近豪沁营子村董部十三师师部驻地。师长不在由师参谋长出面接见。肖在部队用电话报告董其武，说中共联络处代表准备进城。董问来多少人？肖说三十多人，由鲁志浩带队，现先来了何树声代表。董说，没有接到他

们的信。肖管，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未收到？事后才知道信被董部军长刘万春扣下来，未呈交董其武。当时，董其武是拥护和平协议的，但鉴于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不敢放我进城，回肖管，我让人去接尔们。当我到达归绥新城东门时，董其武已派代表康保安、张国林等人在那里等候。他们声称准备工作没作好，请求延迟进驻日期。肖进城见董去了。康保安等和我又乘车返回旗下营，与我联络处的鲁志浩、曹文玉等一起商谈延迟问题。后董其武又派原绥远乱肃奸委员会主任寿跃亭等人去丰镇与潘纪文同志谈判进驻日期。这样，几经周折，直到七月二十日，联络处才进驻归绥。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第一次与董其武谈判，研究了如何贯彻绥远和平协议的具体措施，并着手划分双方部队驻地临时分界、恢复平绥铁路交通等工作。董其武将军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委派康保安、张国林等人与我们经常联系。同时联络处在绥远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中广泛开展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活动，向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讲解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鲁志浩、曹文玉和我还经常去这些人家中访问。绥远上层军政人员迫于大势所趋，在我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政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有的上层人士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联络处做工作，以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

联络处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也积极开展工作，向他们讲解，宣传绥远和平解放协议精神，鼓励他们为和平解放绥远作贡献。这时，知识分子阶层和董其武的一些中下级军政人员比较活跃。他们中许多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促使绥远当局尽快执行协议，有些人还主动找到联络处，向我

方反映情况。有的人还组织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和我党的方针政策，要求联络处给他们提供书报等学习材料。联络处也派出工作人员指导他们的活动。

与此同时，我地下人员也积极配合开展了工作。

这样一来，和平解放绥远的声浪越来越高。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些军、政地方上层人士，对和平解放绥远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起来。董其武将军对实现和平解放绥远协议的信心也进一步增强了。

当时绥远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晋北等地解放后，这些地方的特务、反共顽固分子等聚集绥远。华北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飞到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在绥远内部，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师长鄂友三、骑兵旅长乔汉魁等等，坚决反对《绥远和平协议》。孙兰峰驻在包头，张庆恩就在那里组织特务活动，成了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这些人结合起来，形成了“绥远和平协议”的反对派，叫嚷：“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决不会完蛋。”

“和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对傅作义方面派去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说：“你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狗命”。还听说傅作义方面有一个团级干部叫于洪儒，因为宣传和平解放北平好，被他们活埋了。联络处要进归绥时，他们向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到归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要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他们更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把联络处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以此来达到破坏和平解放的目的。他们大肆造谣，说联络处在进行欺骗工作。他们还指挥军警特务，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这种挑衅，在

七月份，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高潮。

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密切注视绥远的动向。北平一解放，他们就命令驻绥远部队西撤，当时董其武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便以停发军饷相要挟。到七月份，又派徐永昌、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他们飞到绥西陕坝，派飞机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劝董其武率兵西撤，进一步玩弄拉拢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的勾当，以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们回去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随后又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

与徐永昌、王叔铭活动相呼应，绥远顽固反共分子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冲击联络处工作人员。七月中旬一天的下午，在归绥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上制造了一起打死打伤我联络处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那天，一群身着便衣，持有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的家伙，在大街上把我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和另外几名同志团团围住，他们推搡、谩骂王士鑫等同志，最后竟开枪打了王士鑫同志和其他两位同志。这时，在场的同志飞快跑回联络处汇报情况。我们立即乘车赶赴现场，反动分子已逃跑无踪。我们将倒在血泊中的王士鑫同志急送医院，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了。

杀害负有和平使命的革命者的枪声，竟在接受和平协议的地区响起，我联络人员义愤填膺，立即把董其武和王克俊请到联络处，指出这是反动派破坏绥远和平解放而制造的严重事件，绥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要求绥远当局立即追究，严惩肇事者。董其武和王克俊当即表示歉意，答应追究凶手（后查明，杀害王士鑫烈士的主谋者是刘万春，下师政工处

长赵元德，解放后已被我镇压）。我联络处考虑到董其武无法驾驭局势，难于开展工作，联络处人员人身安全无保证，提出了准备撤走联络处的问题。

董其武看到了事态发展的极端严重性，如果联络处撤走，他将被顽固分子所挟持，和谈必将决裂。他立即驰电北平，请示傅作义。然后又特意来联络处，恳请联络处继续留住，并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联络处人员的安全。

我联络处将王士鑫同志被害事件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指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使和平解放绥远不能实现。如果我们全撤走，正好上了他们的当。因此，必须留下坚持斗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董其武请到联络处商谈。潘纪文同志正告董其武将军，我党对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不变，绥远的解放是注定了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和平解放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我们决定留下鲁、曹、何三人继续工作。董将军当即表示：“这太好了，我一定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坚持贯彻北平协议。”决定留下的三人当着董其武先生的面，严正谴责了反动分子的破坏罪行，表示我们留下来是为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不怕反动分子的任何挑衅，但希望董先生能接受教训，采取措施保证我们人身安全。董其武将军一再表示，这一类事件一定不会再发生了。

在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还接见了傅作义。毛主席对傅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还说：“必要时，你可借邓宝珊先生去绥远一趟。绥远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

这时，撤走的我方人员和王士鑫烈士的遗体，由董其武派车护送到旗下营。为了安全迎回我方人员，我人民解放军骑兵部

队特越过了旗下营以西分界线向前推进，使破坏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当联络处大部人员撤离归绥后，董其武为确保留下人员的安全，将联络处由新城西大街六号（现为庆丰西街11号）一座院子，搬到建设厅街德王府院内居住办公，并派他的部队警卫。

这一重大事件，震动了绥远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阶层，一些愿意走和平道路的军政人员感到惊惶不安，广大人民义愤填膺，同时也担忧绥远和平解放中途夭折。我们联络处留驻人员坚决贯彻我党中央提出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当时，就我们三人带着三个警卫员留下工作，电台也已撤走，与上级联系暂告中断。在我们搬进德王府内后，一些反动分子看到我方联络人员并没有完全撤走，就继续进行破坏。一次，康保安来联络处说，大门外边就见到一些特务在活动，你们最近不宜外出，并希望我们的警卫员能在我们住的房间窗下站岗，以防万一。我们说，没有必要，保证安全是你们的事，只要大家有诚意执行绥远和平解放协议，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好的。敌特暗害活动没有吓倒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安定人心，使绥远广大人民知道联络处人员并未完全撤走，仍在为绥远和平解放奔走，我们有意地社会上活动，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还开了一些座谈会。我们去过归绥一中、归绥师范、土默特旗中学、毛纺厂等。为了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后来又从丰镇派来了金毅（女）、刘志远等同志。董其武也常来联络处和我们商谈工作。一次，他说北平傅作义来电指示他，北平正在研究绥远的局势，要他采取措施保护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安全。当时，虽然危险很大，困难很多，但我们为了和平解放绥远，都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其间鲁志浩和我曾分别回丰镇向绥远省委汇报过工作。省委领导同志高克林、苏谦益、杨植霖、姚喆等都给我们作了详细的指示。

绥远和平解放的工作，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下继续向前推进。

绥远和平解放胜利实现

绥远起义，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九月开幕以前完成。但由于顽固分子的掣肘，到八月下旬仍未能实现。党中央十分关怀绥远，特派傅作义到绥远促进起义。傅来绥时，党中央还特地拨出一笔军饷，交傅作义带来慰军。

九月初，傅作义偕同邓宝珊将军由潘纪文同志陪同从北平到丰镇，再由鲁志浩同志陪同由丰镇到达绥远。邓宝珊是北平和平谈判中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并跟随傅在北平起义。

傅到归绥召见了绥远高级军政人员，然后到美岱召暂驻，九月十日到包头。在美岱召和包头，分别召见了驻军军、师、旅以上将领，还同他们个别谈了话。

傅作义来绥远以前，绥远方面反共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制造了种种谣言。如“傅作义起义后已被监禁起来了”，“傅作义又从北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等等，使绥远一些军政人员对起义心存疑惧，不摸底，不放心。傅在绥远出现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许多人的顾虑消除了，决心走起义的道路。

刘万春、乔汉魁、鄂友三等顽固反共分子，原来指望靠谣言欺骗一些人跟他们跑。现在谣言破产，黔驴技穷了。他们发现自己势孤力单，阻挠和平解放已无能为力，便只好勉强接受傅作义劝告，表示愿意倒向人民。这时孙兰峰还不愿意起义，任傅作义和联络处如何晓之以利害，他对起义仍存疑虑。但军心所向，民心所向，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傅作义、董其武决定在九月十九日通电起义。九月十八日，傅作义派人将起

义通电草稿送联络处，联络处由鲁志浩同志持电稿带回丰镇向省党委作了汇报。

此时，已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得知傅作义离开北平到绥远促进起义，便开展了一番紧张的活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密电给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赵思武，电报中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同时国民党政府再次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来绥远作说客，以破坏起义。徐永昌于九月十七日飞到包头见傅作义。他携有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邀请傅作义到广州去的亲笔信。另外，蒋介石还给傅拍来了个电报。电报中说，傅作义这次回到绥远，正象他蒋介石当年由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获得了自由。但他（蒋介石）当年由于一念之差，遂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傅作义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傅作义看了信和电报对徐永昌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到广州也无能为力了。”徐永昌见他的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第二天便以患病为名，住医院治疗。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如果他不走，就可以继续施展阴谋破坏绥远起义。傅作义发了愁，于是他和邓宝珊将军、傅部原参谋长李世杰一起商量，决定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要徐永昌领衔带领起义。徐永昌听了一楞，意识到自己已不能阻止绥远起义了，便说：“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包头飞返广州。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亲自到机场送行。上飞机时徐永昌还对送行的人们说：“三年后再见吧！”蒋介石反动派妄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的一切勾当，彻底的失败了。三年后卷土重来的留

言，只不过是一个自我解嘲的肥皂泡罢了。

这一天是九月十九日。送走徐永昌后，傅作义、董其武率领送行人，包括绥远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共三十九人，到包头的绥远省银行礼堂，举行通电起义仪式。由董率领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孙兰峰最后也签了名。原来，当天凌晨，傅作义再次派人向他劝告，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最后他也走到起义的行列中来了。起义后，我党即邀请孙兰峰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非常感动，在会议发言中说：“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在一个星期以前，还是罪恶反动集团的一分子，反动派曾拼命的使用挑拨、分化、欺骗、破坏等种种卑鄙手段，阻止我走向人民的阵营，直到九月十九日，我才随同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这些是后话。

起义通电于当天发表了。通电说：“我们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电又说：“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九·一九”起义通电发出后，傅作义即返回北平，联络处派我陪送到丰镇。到丰镇车站时，绥远省省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省军区司令员姚喆等负责同志在站上迎送，傅在丰镇车站略事休息后，即返北平。

九月二十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复电说：“看了你

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千方百计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至此，酝酿已久的绥远和平解放终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前夕实现了。

董其武将军为庆祝和平解放，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分别举行了军民庆祝大会。董其武邀请了联络处的同志参加归绥的庆祝大会，我们登上了主席台。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大家欢欣鼓舞，热烈鼓掌。董其武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永远跟共产党走。会议进行中，一小撮顽固分子贼心不死，捣乱会场，往主席台上扔石头，有的家伙还想扔手榴弹，被群众发现制止了。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绥远方式时曾指出：“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以后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个预见是正确的。董其武将军起义后，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傅作义、副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秘书长王克俊，副秘书长潘纪文。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秘书长李维中，副秘书长康保安。绥远部队改编为二十三兵团，一九五一年由董其武将军率领参加抗美援朝，对祖国作出了贡献。原绥远省国民党政府人员全部留用，他们

中绝大多数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也有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一开始就是搞假起义，妄图“借水养鱼”，伺机蠢动，当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的指示，派出大批军官和干部改造绥远部队时，少数特务控制的部队竟策动叛变，杀害了我一百多名干部。他们这样倒行逆施，当然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们的惩罚，终于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

绥远“九·一九”起义回顾

董其武

前 言

三十年前，绥远军政各界和各族人民举行了光荣的起义。

绥远起义主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英明政策的胜利，特别是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①这一伟大政策的胜利；是傅作义先生举行北平和平解放对我的启示和傅先生对绥远起义无限关怀和大力诱导的结果，也是我逐渐看到国民党丧尽军心，丧尽民心，解放军人民欢迎，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危局势难挽回，逐步觉悟到执行南京政府“戡乱”政策是根本的错误后，认识到只有跟傅先生走人民的道路才是生路的必然归宿。

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起义以来，我们和我们的部属一贯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照顾和策勉。尤其是亲眼见到在短短的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把一个受列强欺凌侮辱的民族，变为昂首挺胸，巍然屹立于世界

^①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对傅作义先生说：“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来解决。”傅问：“绥远方式将是一种怎样的方式？”毛主席说：“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去看看你的旧部队。对董其武的经济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

民族之林的受人尊敬的民族，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把历史上几千年来存在的民族矛盾，一变而为各族人民和睦团结的大家庭；可以说中国人民为之长期奋斗的理想，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傅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在“二·二八”座谈会上情意深长地说：“北乎和平解放，当时我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傅先生的话，正是表达了我们的起义人员的共同心愿。我和傅走的道路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亲眼看到了我们祖国，冲破百余年来的黑暗，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昂首阔步地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走向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使我最为欢欣鼓舞的。

这里我回顾绥远“九·一九”起义的历史事实，我想，对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有意义的，是有好处的。

（一）绥远起义有深远的根源

五原大捷后，一九四〇年秋，我以暂四军军长的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的情况。第一次见到何应钦总长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你们武器不够好，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二次见何的时候，何突然问我：“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何突然变了脸色，厉声地说：“怎么！你高级将领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以后注意吧。”

在要回前线，向何辞行时，何说：“现在国家困难，武器只能给你们补充一部分。”当即亲自交我一个领取武器的凭单。我一看，仅仅是轻机枪二十七挺、步枪三百支。我很难过，我反复沉思，怎么？所谓“大部分”，就是机枪二十七挺、

步枪三百支吗？①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只打日本不打共产党吧！

一九四三年，我从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结业后回到绥远时，傅作义先生问我学习有何心得与收获。我说：“当然，战略战术等方面讲的不少，可是我得到的反面教育也真不少。”傅问：“这是为什么？”我说：“我对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种种情况实在看不惯。前方炮火连天，浴血奋战，官兵生活十分艰苦，一个较长的时期，不得不以马料代主食；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而在后方看到的是，头面人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在政治上：党派分歧，门户林立，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毫无一点抗战的气味。有些高级将领，趾高气扬，生活骄奢，官兵脱节。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领能不能担负抗战救国的责任，我抱有很大怀疑，甚至失望。”傅先生只听我说，他默然不语。我又说：“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在艰苦环境里奋斗，我们也一直在战斗环境里成长。我们应当考虑得更多、更远处，应当准备给国家民族担当更多更大的责任。”傅先生倾听着我的话，仍然是默然不语。

一九三三年傅部的长城抗战，曾受到中共的赞扬。一九三六年绥东抗战的百灵庙大捷后，毛主席从陕北特给傅作义将军发了祝贺百灵庙大捷的电报，派南汉宸同志携慰劳款和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并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一时的捐款祝捷慰劳热潮，音乐家吕骥同志亲到祝捷大会上教唱救亡歌曲，抗战救亡的歌声从塞上传到了全国。从“七七”抗战以后，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以及晋西北的各次

①当时，和我同住一个招待所的胡宗南所属第十六军军长董钊，奉领武器的凭单给我看，该军的武器全部都更换了。这种厚此薄彼的对待，不能不使我难过。

战役中，傅作义部和当时中共所属八路军曾经是在一条战线上抗日的战友。一九三八年中共的发动下，为傅将军部动员补充了三千名士兵，增强了傅部的抗战力量。延安曾派多批干部，参加傅部的各级部队政治工作和抗日动员工作。当时，傅部驻晋西北的部队只有两个师、一个旅，其中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担任的。他们是康保安、王庆贞。在此时期，傅部队中一直有共产党人参加合作抗日。共产党对傅部的各种鼓舞，使傅部全体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产生了和平建国纲领。对此，傅作义先生异常振奋，积极发动各级军政干部热烈学习讨论。遗憾的是一九四六年初反动政府就撕毁了和平协定，此后傅的情绪就沉默了。

到一九四六年秋，傅部进入张家口后，对国民党当然是有利的，但傅的思想上也产生了矛盾和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当我接任绥远省主席，从张家口回绥远时，我到傅的办公室辞行。在谈话中间，他突然问我：“其武，咱们为谁打仗？”我半晌答不上来。傅急剧地又问：“其武，咱究竟是为谁打仗？”我说：“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的是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停了片刻傅又问：“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傅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我答：“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的！”傅停了片刻，又问：“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呢？”我说：“干脆不去。”傅问：“为什么哩？”我说：

“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我当时还存在一些小封建思想，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傅和我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里明显地产生了矛盾。

一九四七年秋，当时我在绥远，听说蒋介石亲到北平，当面任命傅为华北总司令。同年十一、二月间傅部移到北平时，别人都纷纷给傅先生打贺电，我不但没有打贺电，而且内心起了很大隐忧。

一九四八年春季，傅先生在北平召集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形势及其前途展望。与会者大都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好象都抱有必胜信心似的。而实际是，当时南京政府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败象已露，我相信，对此傅的内心是很清楚的，但表面不便流露。当我会后返绥时，在西郊傅的住室我俩谈了很多的话。傅最后说：“其武，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头！”我说：“已经走上这条路啦，走到那里算那里吧。”傅沉默了一会儿，很深沉地说：“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听了傅的这次谈话，我认为傅先生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此后，我在绥远经常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知道国民党军队处处溃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尤其听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整个东北被解放后，解放军势必源源入关，我思想上感到华北局势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十二月中旬，傅部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包围。三十五军是傅亲自培养、训练的较为有力的一支部队。如果这支军队被歼灭，不但对傅的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直接影响整个华北的局势。结果，这支部队于十二月下旬被解放军歼灭了。接着解放军又解放了张家口，傅部第十一兵团和一〇五军也全部被歼。同时，由东北入关的

解放军大兵团和华北解放军大兵团分别分割包围了平、津、塘。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天津陈长捷部被歼，解放了天津。

这里，我愿意叙述一段促使傅作义先生的思想进一步向正确方向转变，并最后决心举行北平和谈的历史情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刚一结束，傅先生飞抵南京，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那时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据傅说：他一到南京就看到南京已是乱纷纷，一团糟。

在那种情势下，蒋介石想抓紧傅部的力量以挽救残局是很自然的。因此，蒋对傅当然是优礼有加。蒋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和何应钦代表他到机场去迎接傅。傅下榻后，何应钦等奉蒋之命，到傅处和傅密谈。何应钦称：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蒋已内定，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傅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何应钦表示，撤退华北部队的船位，已经准备就绪，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对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要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对蒋的这种安排的全部用心，傅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否则，对速返华北，掌握局势，有所不利。

此后，蒋邀傅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一开始，蒋把陈诚、熊式辉大骂一顿，把丢掉东北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接着完全换了另一副面孔，对傅表示慰勉有加。随即把何应钦向傅转达的事项，又亲自向傅说了一遍，并相信傅决不会辜负他的重托。傅先生深思熟虑，在此情况下，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当即向蒋郑重地做了如下表示：一、华北局势不象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绝望；二、对扭转华北的危局还有办法；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

傅的后面的几句话，打动了蒋，他当即表示尊重傅的意见。

傅先生还说过在那次军事会议上的一个插曲：在进入会场时，张治中将军用肩膀碰一碰傅的肩膀对傅说：“宜生兄，今天这场戏，我张文白可是要演主和派的角色阿！”傅只是向张默然一笑。是的，傅先生在那次会议上确实自始至终都是以主战派的角色出现的。正是这样，会议一结束，傅就平安地回到北平。

解放后，张文白将军有一次探望傅先生时，曾谈起了这段往事。傅先生哈哈大笑说：“其实我早就想和，不想战了。”

傅先生回到北平，虽然在公开场合一再说：要遵照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危局。但在内部对他的左右却表示：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决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此后，如果我们再参加内战就无以对国家，无以对民族。从那以后不久，傅即由他的长女傅冬通过中共地下党可靠的渠道，给毛主席去了电报。与此同时，傅先生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精心地安排了同共产党的和谈。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晚，我在归绥（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从广播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一时间我的感想颇多，一方面兴奋，一方面波动。当即向北平打了电话，要求明天派飞机接我到北平去看看。我二十二日到北平，直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先生。傅一见就说：“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我说：“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傅说，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傅略微沉吟了一下，就安详地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要随时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拼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啦。”傅接着又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先斯派了蒋纬

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劝我大军南撤，并任命我为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语，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以海军全力支持我们。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傅加重了语气又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了。”

傅又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去、宁夏去，那可以的嘛，现在呢，不要看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了。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是用特别郑重的语气重复地讲的。此刻我才更进一步了解半年多前傅对我说的“走人民的道路”的意思。我从傅先生的语意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时我问傅先生：“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傅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当晚，傅设便宴，找我和石觉、李文等一起吃便饭。我就把傅对我讲的话对石觉、李文等人讲了讲。主要的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说：“我们跟上时代的潮流前进吧！”石、李等只好表面上表示，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对的。

傅作义先生及其所部，虽然有两年零八个月和中共对立的历史，但是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始终是爱国思想。正是这个内因在起作用，傅先生及其所部才能从错误的道路上，经过曲折痛苦的认识过程，终于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我多年一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在他多年的思想教育启发

和爱国思想影响下，我个人可以说一直是跟着傅先生走的。

（二）绥远起义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

1、绥远走上和平道路中的一般情况

（1）对军政各方面思想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我和傅作义先生在北平谈话后，根据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和当前全国形势的发展，我认定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走和平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时代的要求，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因此，我决心带领绥远跟傅先生走和平道路。但同时也想到绥远情况复杂，不能不慎重从事。

首先我估计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由于北平和平解放，南京政府一定会对绥远部队不放心，进行这种或那种的干预，并指使特务进行捣乱破坏。这在思想上应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问题。

同时我也分析了绥远的内部情况。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虽绝大多数都是反对内战倾向和平的，但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在中上层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当权派的顽固分子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工作做不好，时机不成熟，骤然提出和平问题，反会受到挫折，因而愤事。因此，当前首先是安定部队情绪，团结一致，深入了解和掌握思想情况，然后随时进行思想和说服工作，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

我回绥远后，首先与军师旅长级以上干部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着重说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后全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北平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大家放开眼界，观察全国形势的发展。我说：当前，要安定部队，团结一致，不要听信谣言，注意部队反应。并征询了他们对绥远的意见。接着，又与厅局长以上干部，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面谈的情况，并征询了大家的意见。这样，经过同军政高干与地方代表等的谈话，便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都赞同傅先生的决策和行动，认为应当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只有极少数人持怀疑态度，有个别的人态度暧昧，一言不发，有的甚至怒气冲冲。

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一般中下级军政干部的思想情况，便针对着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一个时势讨论提纲，发给各部队各机关讨论。提纲内容大意是：（1）当前国内外形势如何？共产党军队能否渡过长江？（2）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3）对北平起义的看法如何？（4）在当前的形势下绥远应该怎么办？……。从讨论结果看，大多数人认为：（1）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很快会渡过长江。（2）三次世界大战是谣言，是幻想。（3）北平和平解放是大势所趋，傅作对了，不然，还不是同天津一样！（4）在当前形势下，绥远也应走和平道路，不应再作无谓牺牲……。少数人认为“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决不会完蛋；美苏矛盾很大，三次大战很快会打起来，和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应等待时局转变”。还有的说：“北平和平解放，一切都完蛋了，绥远要坚持到底”。从这些意见去看，显然大多数人认清了时势的发展趋势，是赞成和平的；只有少数人有顾虑或有幻想，甚至于坚持顽固立场。

在春节过后，我巡视了部队和地方，并讲了话，还和一些

军政干部和士兵作了个别谈话或开了小型会议。了解到一般的思想是倾向和平，部队情绪基本稳定；但在中上层干部中确实顾虑不少，主要的是：信不信，用不用，怕算旧账，怕身家安全没保障等等；还有极少数对北平起义不谅解，有抵触，甚至存在幻想，别有企图。同时我也访问了各族人民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表示热望和平，不愿打仗。

由于上述一系列工作，我基本上了解和掌握了各族人民和军政干部以及士兵们的思想情况，认为绝大多数人倾向于走和平道路，但仍然有不少阻力，需要认真进行工作。

(2)《绥远和平协议》的协商与签订。我从北平回绥不久，旧历年来临。除夕前，绥东人民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同绥远前线部队在归绥以东六十里的陶卜齐车站地区发生冲突。当时，绥远局势顿呈紧张，我立即电报傅先生请示，经傅和华北局联系，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于是绥远局势便趋平静。

正在前线冲突之际，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兼建设厅长）、副主任委员张遐民（兼财政厅长），竟然要求我军政立刻西撤。他们说，后套粮多，后方补给容易，以免敌人切断包头，我们就无法后撤了。潘、张等的用意是以后撤为辞，妄图阻挠我们走和平道路。

到了三月间，华北局和傅先生商定，对绥远的和平解放，由双方各派代表二人在北平协商。党派的代表是李井泉、潘纪文，绥远方面代表傅先生派的是周北峰、阎又文。经数次开会商讨，拟定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草案的内容大体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

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

四月下旬，傅先生派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原傅的随从参谋刘庸笙携带《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来绥，并传达了傅先生的话：“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经我分别召集军政和地方首脑共同研究了和平协议草案，并传达了傅先生的意见。经研究，除对草案中军队驻地个别地方须略加修改外，余均同意。但，与会的人中有的不表态，也有极个别的人怒气冲冲，几于动武。

虽然有个别人反对，我决心接受和平协议，就立即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携带协议草案和所提部队驻地修改意见去北平，在傅先生指导下，代表我履行签字手续。到北平后，经双方协商，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华北局举行签字仪式。参加者，傅方有：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华北局方面有：董必武主席、薄一波政委和张友渔、杨秀峰等同志。在协议上签字的华北局方面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绥远方面是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由康保安代表签字）。康保安于六月三日离京返绥。

同时，傅先生派前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来绥，协助我进行和平工作，对孙兰峰、刘万春、张世珍、赵晓峰和张钦、于存灏、荣祥、胡凤山等，转达了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及和平条款。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先生。在座的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毛

主席说：“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我们在感戴毛主席对绥远和平政策的宽大下也感念傅先生的北平起义作了我们的先导。

（3）统一思想认识，开展革新运动。基于前述各方面的思想情况，虽其中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甚至有个别人坚持反动立场；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我未便公开表态，不能不有所等待。因之一般比较倾向和平的人，也对当时政治情势，感到不大了解。从而有些人说：“董主席的葫芦里头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就对了嘛！”甚至还有人怀疑说：“董主席是脚踏两只船。”

在和平协议签字前，四月一日，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发出通电，声明政治立场。这给绥远军民干部人等的思想认识，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统一的契机。由于他认真地检讨了过去执行戡乱政策的错误，认识了过去说的是为人民，事实上是摧残和压迫人民，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给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一切为了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能够成功。并说明北平的起义，就是遵从人民意愿，勇于自觉而实现的。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解放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并表示决心，要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从这篇通电看，他说明了过去在政治上谁是为人民的，谁是反人民的，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北平和平解放是有其

重要意义的。因而这给绥远对北平和平解放有错误认识的人是个很大的教育，指明了今后应该走的道路。而且在这时，绥远和平协议已经签订，曙光在望。我为了能顺利执行，以达到完整的起义，使所有部属都走上光明的道路，不致于掉队落伍，以符合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和傅先生爱护干部的愿望，也有必要普遍地澄清过去的错误，提高觉悟，弃旧图新。因此我便借助于傅先生发表通电的东风，借干部多年对傅先生的信任，来迎接和平起义的未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向所有军政干部普遍宣传和平革新，统一思想认识，开展绥远革新运动。其具体措施如下：

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我在省府邀请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举行座谈会。会上我先作了形势分析，要大家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检讨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实行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因而在政治经济上贪污腐败，脱离人民，错误地执行戡乱政策。我们要接受教训，开展革新运动，革除旧弊，振刷新机，实行经济民主、政治平等，以适应形势，走向新生。我讲罢后，大家热烈发言，争论激烈，除少数人坚持不同意见外，大家一致认为开展革新运动是走向新生的必要途径。经过几天的座谈讨论后，推举张钦、于存灏、刘万春、张国林、常佩三、张国宝、张立范、佟树蕃、赵国鼎、赵励师、张登鳌、卢健飞、康保安、李忠孚、梁子材等二十多人为委员，并推举我为主任委员，成立了绥远省革新运动委员会。首先是从思想上重新认识时代，政治上重新确定方针任务，作为进行革新运动的基础，并决定在委员会下设立了时代认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土地房产四个组，分别制定革新工作计划草案，迅速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在各项工作计划草案的制定中，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

等，提出反压迫、反剥削、反贪污、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论点，召集会议讨论。讨论中曾出现过尖锐的争论。大多数人同意上述论点，极少数顽固分子坚决反对说：“这是赤化，这是投降共产党的理论，不是革新。”辩论得不可开交，最后我作总结发言说：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是新三民主义的目标。我们革新就是要真正实行新三民主义，不为时代所抛弃。希望大家再详细考虑。因此，草案也就以此为主要的思想依据。

改组省级机构。为统一事权，节省经费（北平和平解放后，南京政府停发了绥远省的军政各费，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薪饷无法开支，生活十分困难），解除了一些反动当权派如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兼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张遐民、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省政府社会局局长杜品三（CC特务）等的职务。这些人有的在旧历除夕前，形势紧张时已逃跑到后方，有的在上海、广州等地暗地指使在绥远的党羽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把省政府厅局处二十多个单位裁并为四厅二处，编余人员经甄别后，充实了县乡基层工作。

改革人事制度。各部门的首脑，任用私人，党同伐异，互相拉拢，发展个人势力，为政治腐化贪污的重大根源。为改革这种制度，决定成立人事委员会，将全省干部统一任用，统一考核，统一训练，以杜塞任用私人、贪污腐化之路。

以上种种措施，都是为扫除走和平道路的障碍。

成立革新学院。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培训革新干部，把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改组为革新学院，分期分批训练省县科长级以上干部。革新学院的课程，主要是新三民主义、《论联合政府》、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革新草案等

等。用上大课、讲小课，大组讨论、小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学习，要求达到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学习的结果表明，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人，思想认识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为和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育、利用东归干部和督训处的工作。东归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跟傅先生多年的可信赖的人。他们到绥后，我先后都同他们谈了话。为了发挥这些人应有的积极作用，我分别把这些人安置到部队中去，以代替部队中那些对和平抱怀疑态度和不稳定的人。替换下来的人调往革新学院学习。这样以利于巩固部队而走向和平。

设立督训处。以原第九兵团副司令长官兼整编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为处长，在东归干部中选择职务较高的三十余人组成督训处。一方面，为了整顿部队加强纪律，达到巩固团结，使绝大多数中级干部根据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认识到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是正确的。绥远跟我走傅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利用这些人员与部队各级干部的同学同事关系，帮助督训部队，老朋友间说说知心话，使大家认识清楚，走和平道路，必然对部队有好处，对官兵有好处，对地方对人民对个人都有好处。千万不要受特务的煽动和不明大义的坏分子的引诱，而遭受不可想象的损失。

另外，我还指示卫景林去找一个愿意立功赎罪的姓贺的特务分子做工作，尽可能地掌握特务的名单和活动情况。后来，把这些特务约百余人集中到革新学院，另编一个队，任命原三十五军的一个团长鲁乐山当队长。集中特务这件事，不仅控制了特务的一部分力量，使特务分子互相猜疑，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大大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

改进报纸宣传。《奋斗日报》是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我为

了制造舆论，转变大家的思想认识，配合革新运动，特派苗平章到报社和报社原有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宣传和平革新，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介绍一些进步文章和抨击反动的腐朽政治，对改变思想认识起了促进作用。

召开军队高干会议。在革新运动开展后，和平已逐渐明朗化。我为进一步统一部队思想认识，召集了旅师军级高干会议。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1）关于当前形势和绥远前途；（2）调查部队人员马匹装备实力情况。我首先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要求大家树立走和平道路的信念。大意是，自北平和平解放以来，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政府已溃逃广州，全国形势急剧转变。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平起义是完全正确的。傅先生站得高，看得远，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清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和平的道路。我们要听傅先生的话，跟傅先生走，走和平的道路，使部队不再作无谓的牺牲，绥远人民免遭战争损害，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自己好。希望大家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勿再犹豫徘徊，贻误时机。经大家酝酿讨论，多数人赞同跟傅先生走，走和平道路；但仍有少数人对和平有顾虑；个别人对北平起义不谅解，有抵触。最后，我作了总结讲话：“多数人赞成和平，这是正确的。和平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都有好处，不必有所顾虑。有的对北平和平有抵触，看法不对，要放开眼界，展望全国，问题就解决了。”我说后，再没人发言。第二项关于调查部队人员马匹装备实力情况，这也是为起义工作作准备，经由各主管业务部门分别布置，作了调查统计。这次会议基本上统一了思想，对少数人还需要继续做工作。

2、进行起义中的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

我从北平回绥前，曾预计在进行和平起义中，会遇到南京方面的干预及其特务的捣乱破坏，而事实上，所遇到的比预计的还要复杂和尖锐。

(1) 停发军费迫令部队西撤。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开始酝酿和平，特务分子把绥远的情况报告南京反动政府，南京政府即命令我率领驻绥部队向西撤。我当时以：一、绥远暂时还安定，不应轻易西撤；二、驻绥部队的班排干部和士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等为理由，拒绝了西撤的命令。继而，南京政府便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祁子厚（绥远萨拉齐县人）乘飞机来绥，劝我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我又以局势不稳，不能轻易离开为辞，拒绝了祁的劝说。

南京政府命令我西撤，遭到拒绝；祁子厚的劝说，也没有成功，他们就使出了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以困毙绥远部队的恶毒手段，来作胁迫。当时驻绥远部队包括邓宝珊的第二十二军在内将近十万人，在生活上确实陷于困境。经多次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均不予拨发。唯一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而绥远又是一个贫瘠的小省，财政向即支绌，我们只好千方百计采取措施，从各方面撙节支出，来维持部队官兵和行政人员最低的生活。文武干部除本人及家属供给吃粮外，最困难时每月只发生活费现洋五元；士兵和工勤人员除口粮菜金外，每人月发生活费现洋二元。夏季到来，士兵无单衣可换，只得把棉花抽掉，改冬装为夏装。尽管如此，我们却并没有被他们强加的这些困难所吓倒。

六月十六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中央召集各省主席在广州

开会，要我去参加。由兰州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嶠派飞机一架（美国人驾驶），并派绥远省在兰州催发补给的绥远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飞机来接我去兰州，再转往广州。我仍以前方军事重要，不便离开为辞，未去。马分监乘飞机返回兰州时，天已黄昏，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到山崖上，机毁人亡。这一幕也就由此结束了。

（2）特务麇集绥远破坏和平运动。在北平、天津、察哈尔、晋北等地先后解放后，这些地方的特务都麇集绥远。华北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到绥远，了解绥远情况，并给特务们作了布置后返回南京。特务们即到处大肆活动，并渗入到部队内部，有的特务头子甚至带着电台和特务们潜伏在部队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们相勾结，力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但随着军政干部的觉悟逐渐提高，绥远一步一步地走向人民方面，反动派惊慌了，派张庆恩重返绥远，以包头为中心，亲自指挥特务们大搞破坏。最显著的有以下罪恶表现：

制造谣言。从绥远酝酿和平起，一直到“九·一九”起义，特务们制造了许多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谣言。如他们散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了，今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再来中国了；日本空军志愿队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志愿军要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还没有拿出来，绝对会有前途……”。又说：

“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对于这些煽动欺骗，我们都及时地予以揭露，所以除少数顽固分子受其蛊惑存在幻想外，大多数军政人员都没有为他们的谣言所蛊惑。

组织少数暴徒游行示威。他们伙同一些顽固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受蒙蔽的人在包头大街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标

语，散发传单，还沿街大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动摇人们走和平的道路。

砸毁报馆。由于绥远《奋斗日报》在绥远开始革新运动后，一切言论，均逐步向人民靠拢，不但宣扬和平革新，还有时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和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此被特务分子们视如眼中钉。他们于夜间聚众到报馆大肆打砸，门窗、机器、家具多被毁坏，有的工作人员还受了伤。报馆被砸毁后，我当即命令刘万春军长彻底追查。经查明：砸报馆系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欺骗士兵二十余人干的。凶犯赵元德在追查中逃逸。此人后来被镇压。

袭杀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七月中旬，中共华北局派驻归绥的联络处由潘纪文、鲁志浩两同志带领工作人员来到归绥^①，开展了各项工作，如划分双方部队驻地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设置商业网点等，显示出和平运动进入高潮。特务们看到后，当然是仇视的。他们为了进行破坏，于某天下午在归绥新旧城大马路中间，将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袭杀。事后，潘纪文同志认为工作人员没有保障，难以进行工作，声称将联络处全部撤走。袭杀案发生后，我认为事件是严重的。为使和平工作继续推进，我亲到联络处会见潘纪文同志，为坚决贯彻党的政策，使绥远和平得以顺利实现，请求联络处继续留驻。潘表示，党的政策是不会因此事而改变

^① 和平协议在北平签字后，潘纪文与王克俊、康保安约定，联络处于七月十五日进驻归绥。届时，突然有某些人提出反对意见，故不得不请联络处同志暂缓几日进驻。当即派康保安出城见鲁志浩等同志说明情况，请推迟五日进城。联络处于七月二十日进城前，特派中国军营进行周密警戒。

的，当即决定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三同志继续工作。我对特务的罪行非常气愤，对和平前途十分焦虑，当即电报傅先生转报党中央。毛主席接见了傅先生，指示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同时还指示傅必要时，可借邓宝珊先生去绥远一趟。并说：“绥远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由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傅先生电告我后，我的焦虑才平息下来，并深切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一方面打击了特务们的这一破坏计划，另一方面更增强了我斗争的信心。

王士鑫同志被害后，我当即召集刘万春军长、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和赵晓峰师长等，严令追查凶犯。据刘万春向我汇报：凶犯是二五八师段锦堂团二营六连连长李××。李犯发现他被追查时，即假传命令，欺骗该连士兵奉命“剿匪”。段锦堂团长当即亲自率三个连追剿。追到后，李连士兵才知道受了李的欺骗。当时，段将李犯就地枪决。

特务分子妄图破坏铁路交通。绥远铁路警务段长康玉玺（系军统特务分子）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根据他们主子的指使，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破坏阻挠走和平的道路，企图搞罢工，破坏机车、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去打游击。我找到原跟我走和平道路的老车务段长高文藻，联系多数职工，揭穿了特务们的阴谋。除保证西部正常通车外，还作到接傅先生回绥远，随时派压道车和丰镇取得联系。最后保证铁路完整地交还人民。

（3）反动派封官许愿制造分裂。七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飞绥西峡坝。事前给我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我们到峡坝见面。见面后，徐、王又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

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我们困散我们么？要我们部队往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班排长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后来，徐、王又分别同孙兰峰、刘万春和我作了个别谈话，便回去了。我们仍乘原来的飞机返包，起飞时飞机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轻伤。后改乘汽车返包后，换乘火车返回绥。

回归绥后当时的情况已很清楚，我们的敌人已经不在绥远东部，而是在绥远西部了。^①因此，一方面为了应付徐、王的要求，以使得尽快地得到补给，另一方面，主要的是防止别有企图的人欺骗部队西窜，我就让一个实力较充实、而且可靠的师开到河套去。我向这个师的师长面授如下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想拉上部队向西去的，均坚决予以阻击。”在这时，南京政府以为我整个部队要向西开动了。为了应付我，给绥远部队补发了一些军费。我接南京电拨给绥远部队的一千九百两黄金后，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可以接受蒋的黄金，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徐、王来绥，并不是简单地劝我率领部队西撤，而是别有其阴谋计划的。因为，绥远走向和平已成了公开的事实，南京政府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要拉住我不跟傅走，恐怕是不大容易的事。所以，他们来绥，一方面是要我西撤，一

^①特务头子张庆恩，在包头城外某地煽动某二、三人率部在旗下营向解放军打一下，然后西窜，妄图破坏绥远走和平道路。

方面是从暗中作秘密布置，利用不甘走和平道路的某些人，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的办法，来分裂绥远的部队，以达到他们破坏绥远和平的目的。因此在他们回去后，即使出阴险恶毒的手段，先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妄图让我交出军权，把我架空，以破坏绥远走和平的道路。我当即电复南京政府：“请选派贤能来绥远接替我的一切职务。”他们再没有回电。然后任命孙兰峰（原傅部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代察哈尔省主席，张家口解放后回到绥远）为第九兵团司令官，任命刘万春（绥远部队第一一一一军军长）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妄图使所有绥远部队统归该兵团司令官指挥（原绥远设有华北总部归绥指挥所，我兼指挥所主任，所有驻绥部队统归我指挥），使我没有力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强行起义，势必造成分裂，违背毛主席全面和平解放绥远的宽大政策和傅先生爱护部下举行完整的起义的愿望，也必然使绥远人民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绥远情况也随之更加复杂，使起义行动迟迟不能实现。至是，傅先生也很为关切，经派原华北总部总参议张濯清来绥，对孙兰峰、刘万春进行劝说，并讲述了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及和平条款。

（4）傅作义先生来绥促进起义。绥远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九月开幕以前完成，现在已届八月下旬，绥远起义仍未能实现。毛主席十分关怀绥远情况，经傅先生请示，毛主席同意委托傅先生同邓宝珊先生等携带大批慰问现金，莅绥慰问部队。傅先生来绥的事，事前已电告给我。当得到傅先生已动身西来时，我的心情是极端欣慰而愉快的。当傅先生到达集宁时，以解放军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为首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烈迎送。对傅到绥，我曾做了周密妥善安全的安排。首先派康保安代表我到老解放区集宁迎接，接着派督训

处负责人卫景林代表我率领史国玺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迎接。临行前我告诉卫要向傅先生报告的话。卫见傅后，向傅先生报告说：“你回来很好，同情我们的人非常欢迎，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占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乱了，非常惊慌，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时见傅先生点头微笑。列车到白塔车站时，傅先生下车，检阅了部队。傅先生看到官兵队列整齐，精神饱满，喜气洋洋，表现出对傅先生的尊敬。傅先生也喜形于色，决定到归绥下车。

傅的列车到绥远车站前，我和刘万春、赵晓峰、张钦、荣祥、阎肃、于存灏、胡凤山等人在车站恭候。列车一到站，我们即登车向傅先生表示敬意，并请他下车，下榻在省政府他原来住的地方。下榻后，略事休息，我即把绥远各方面的现况，向他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开具了应传见的干部名单，请他审核。翌日，傅先生分别传见了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并向官兵发了慰问金。同时我随傅检阅了几个驻归绥的部队。在傅先生来绥消息传出后，人民群众和同情和平的人都喜气洋洋极表欢迎。但这件事完全出乎反动派意料之外，他们认为共产党绝不会放出傅作义，因而感觉惊慌，乱了手脚，不知所措。

此后，我随傅先生到美岱召，传见了驻萨拉齐县一带的部队和行政干部，发放了慰问金，并把部队集中在美岱召附近，接受傅先生的检阅。

九月十日，我随傅先生进驻包头，筹备起义，召集旅、师、军级高于到包头，分别进行了谈话。着重说明了全国形势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走和平道路是最正确的道路，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前途是光明的。^③并讲述了毛主席的宽大照顾和既往不咎的政策，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顾虑。大家都表示同意，愿意跟傅先生和我走。接着邀请

各族各界和地方代表人物，如省议会议长、副议长，高等法院院长，土默特旗总管，乌、伊两盟、东四旗及回族代表等，共同商议了绥远起义的前途问题，大家都极表赞同。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和酝酿，大家都同意了。白傅先生到绥后，那些反对起义的人，自知已无力左右部队，不得不跟上大家走。只有一个人仍坚决反对，但他也不能再影响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都是傅先生多年训练的，所以，他对起义再起不了多大阻碍作用。但由于傅先生爱护部属，情深谊厚，对他最后再伸出援溺之手，于九月十九日起义的凌晨，又一次派人向他作了最后的忠告。他终于觉悟了，才跟随大家一起走到起义的行列中来，正如起义后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言中所说：“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在一个星期以前，还是罪恶的反动集团的一分子，反动派曾拚命地使用挑拨、分化、欺骗、破坏等种种的卑鄙手段，阻止我走向人民的阵营，直到九月十九日，我才随同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于是，八个多月来实现完整的起义的目标圆满地达到了。

反动派不甘失败，作垂死挣扎。绥远起义将在大功告成之际，因南京政府得悉傅作义离开北平，来到绥远，便大耍两面手法：一面由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部队中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恩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一面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九月十五日飞来包头，邀请傅作义到广州为反动派效劳。另外，蒋介石还给傅作义一个电报。蒋在电报中说，傅这次回到绥远正象他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由于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傅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傅向徐陈述了北平和平的情况，并说，国民党丧尽军心民

心，大势已去，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徐的要求。我则仍积极地准备起义工作，并于九月十六日上午，着我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和傅先生的秘书阎又文合拟了为绥远起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通电稿。中午拟成，送傅先生先阅后，当即送电台拍往北平呈毛主席核阅。毛主席看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北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将电稿上蒋、李、阎的名字添上，用红绸将全文缮好，准备大家签名后发出。与此同时，徐永昌见他的任务不能完成，不好回去复命，便耍了鬼计。徐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开幕，傅先生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如果徐住着不走，绥远就不便起义。于是他装病说他拉肚子了，要住医院。傅先生知道后发了愁，对邓宝珊先生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住医院。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这不是耽误了我们的的大事吗？这怎么办呢？”这时原傅部参谋长李世杰在座，傅、邓、李计议一番后，邓去找徐永昌。见徐后，邓说：“怎么你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多注意！宜生（傅先生的号）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医院，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再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了一楞！马上意识到他自己的处境不妙，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邓再三挽留，他只是不肯。于是，徐永昌只得于次日早晨——九月十九日起义的早晨——扫兴而去，离包头飞返广州。徐临行前还对别人说：“我是来说服傅宜生来啦，不但没有说服了他，反而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徐临上飞机时狂妄地说：“三年后再见吧！”

(三)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了光明的前途

绥远完整的起义条件成熟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以我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三十九人，于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在起义通电上签名，率领绥远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族各界同胞，胜利地举行了光荣的起义，隆重庄严地发出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的起义通电，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集团，走到人民方面来。

电文说：

“我们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决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太原守城，文水、交城、离石各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抗战到底。

“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

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生命热血，用一切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国家独立民主与和平富强。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违背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的捣乱政策效力。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

“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通电发出后，大家热烈鼓掌，庆祝起义胜利，光荣地走到人民方面来，并举行了会餐。

下午一时，傅先生在中国银行院内召集干部讲了话。大意是：我过去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由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自己负责……。讲了约一个小时。

半年多来，反动派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绥远起义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毛主席留待绥远全面起义的宽大政策和傅先生关怀部下举行完整的起义的愿望，都胜利地实现了。

傅先生胜利地完成了毛主席所交给的任务，于下午四时，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向毛主席汇报，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奉命留绥，同车回到归绥。下车后返回机关，处理各项军政事务，肃清潜伏的特务分子，防止他们捣乱破坏发生意外事件。

九月二十日，接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

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同时也接到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复电，对绥远和平解放，热烈祝贺。也勉励我们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我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报和聂司令员、薄政委的电报都转发给部队和各级政府，认真学习讨论，贯彻执行。

为维护革命纪律，遵守革命秩序，我处理了反革命分子李维业事件。李维业原为察北行政专员兼保安旅长，张家口解放后，他带领察北各县地方团队窜到绥远陶林（现在的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武川一带，编了一个旅，抢劫人民财物，胡作非为。绥远和平协议执行，划分双方部队驻地后，他猖狂破坏和平协议，带领部队越过界限，杀害中共地方干部，抢走解放军青军马二百多匹。为维护革命纪律，将他扣捕镇压，这是有意地打击反革命残余，巩固起义的胜利成果，使得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销声匿迹，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能以顺利进行工作，并要全体官兵，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改造思想，改变作风，遵守革命纪律，维护地方秩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为庆祝绥远起义走向新生的伟大日子，绥远军民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分别举行了庆祝大会。我和在省的军政人员都参加了归绥市的庆祝大会。阳光普照，万众欢腾。所有参加大会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表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幸

福情景。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薄政委给我们的复电，全场热烈鼓掌拥护！我在会上作了庆祝起义胜利的讲话，着重指出这种幸福和光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予我们的，我们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为建设新绥远、新中国而奋斗！各族各界代表也分别在大会上作了热烈的发言。

当时，我在心情欢畅、感激兴奋的情景下，写下了以下的几句话：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
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
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我为了接受党的直接领导，经常派康保安同志到丰镇向绥远党委取得联系。在丰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康保安同志代表我讲了话。

在部队改编和政府改组完成以后，我来京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他们倍加嘉慰地说：起义是给人民做了好事，是受人民欢迎的。特别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七时，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我时，对我的谆谆教导。毛主席说：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哩。共产党和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搞宗派哩，是搞码头哩，不为无因，他是私嘛！共产党人没有私。共产党人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毛主席又重复地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

广大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

毛主席的话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主席说，共产党人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这里引述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段话。他说：“当我觉悟到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才能统一祖国时，就毅然决然走向人民。虽然我个人认为我属罪大不赦之列，但是毛主席、共产党对我的政治和生活各方面都给予了很好的待遇。过去同我共事的人们，也都在‘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政策下，得到了照顾。”一九六五年李德邻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后，傅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对台湾当局说：“李德邻到京时，我举行了家宴招待他和我们国家领导人。我的生活及政治情况你们就可以了解了吧。你们重回祖国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呢？！”

我自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一贯受到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领导上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起义后，绥远部队编为二十三兵团，作为人民志愿军，由我率领参加抗美援朝。我曾是历届政协委员，四届五届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历届人大代表，四届五届人大常委，最近又被选为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近几年虽然因为年岁较大不在军队中做具体工作了，但是始终担任着高级军职。毛主席的“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伟大政策，在绝大多数跟我起义人员身上得到落实。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百余年来，我们国家遭蹂躏，民族被压迫，人民受欺凌，灾难重重，亡国无日，中国的志士仁人，中国的革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终于在共产党、毛主席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灾难深重，黑暗落后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再雄辩不过地说

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目前，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开始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及早地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人生是有限的，历史是公正的。一个人应当顺应人心之所向和历史的发展，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来写自己的历史。

转载说明：

为纪念绥远“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本会特邀请董其武将军回忆撰写了《绥远“九·一九”起义回顾》一文，其后董将军又将原稿修改稿惠寄本会。本会先后收到两稿，均因故未能及时发表。一九八〇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将董稿发表在第六十九辑《文史资料选辑》上。为了史学工作者参考方便起见，本会现在编辑的《绥远“九·一九”起义史料专辑》未用董将军所寄稿件，而转载了董将军在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上发表的文稿。

另，联络处进驻归绥日期，原稿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根据档案和报刊记载，应为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底

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

——绥远“九·一九”起义的回忆

孙兰峰

我同傅作义先生相识，时间较长，到傅先生逝世，有近五十年的历史。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①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罪恶的道路。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十一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

^①涿州——即今河北省涿县。

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我们这些人也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和深感到愧疚的。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我已经退到绥远。我是仅从广播中获得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的，没有从傅先生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我感到难以捉摸。我内心中一会儿为傅先生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先生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此后，有一些傅先生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绥远。凡看过我的人，我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是比较消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奔上我的心头：傅先生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当时我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我也不愿把“投降”这两个字与傅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我的印象，我甚至对傅先生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就在这个个人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来找我。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司令官深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操纵绥远局势，派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坐飞机跑到河套陕坝，约董其武、

刘万春和我与他们会晤。徐永昌是傅先生多年的好友（当傅先生任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时，徐永昌是三十三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交情甚笃。王叔铭和我是山东同乡，又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同期学习过。徐永昌和刘万春有过一段上下级的关系。他们来后所采取的诡计是对我们分别进行拉拢。在他们看来，无论我们全听他们的话，或者部分听他们的话，都是他们游说的成功。他们许给我一个第九兵团司令官的名义，并把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隶属于我这个兵团司令部之下。另外，还答应再给我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我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他们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后方，最后一定胜利。并一再地谈道：傅宜生（傅作义先生的字）已经上了共产党的当，走错了路，你千万不能再上当受骗。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那时苏、美燃起战火，英、法、德、意都将站在美国一方，美国的军队和武器都比苏联优越和强大的多，并且还有原子弹。大战一爆发，肯定苏联必败。苏联失败，共产党还能成功吗？到那时，共产党不打自灭。又说：现在中央尚不愿同共产党最后决战，设法保存实力，以观国际变化。今后你们也要尽量保全实力，不要同共军硬拼。能打就打，打不胜就向西北后方撤退，只要不把力量消耗掉，早晚必有办法，希望你们采纳。他们对我开出的支票越多越大，令人置信的程度当然就越低。尽管如此，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必须同他们周旋应付。

大约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六月，傅先生派王克俊来到绥远。王是多年在傅先生身边工作的人，但是我认为在我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我不能轻信他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只好对他说：你既然来啦，住上一两天就回去吧！不要到部队中

去，因为部队中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部队不完全听我的话，我对你的安全负不到保护的责任。之后，傅先生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来绥远。张是过去傅先生兼任三十五军军长时的参谋长，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很坦然地对张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话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亲眼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都好，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听。我也对张说：既然来啦！就在这里多玩几天吧！但最好不要到部队里去，免生意外，我对你的安全负不了责任。听说张回到北平后向傅先生说：曦九（我的字）倔强的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的确，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只有我亲自看到傅先生，我才能弄清楚傅先生的处境如何，搞明白我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还有，我觉得只有傅先生，才能比较好地收拾绥远这个残局。换句话说，不论起义或不起义，最好都由傅先生来主宰决定。因为部队是傅先生带起来的，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他那样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大家能够获得统一的认识，采取统一的行动。

于是，在当时的绥远社会上流传出一种说法：绥远的军政人员划分了两派：一派是不愿起义的主战派，为首的是孙兰峰；一派是愿意起义的主和派，为首的是董其武。其实，我和董其武都是跟随傅先生多年的老人，我们都不愿做也不会做与傅先生的意志相违背的事。我们两个人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差异，而每个人对人对事采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会相同。表现在对待问题的反应和处理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事实。但是我们都不能离开傅先生自搞一套，即使想搞也搞不成，这是历史所决定了的。当时我心中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傅先生能亲自到绥远来，我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解放

后有一次我同张濯清谈起往事时，他说：晓九，你要的那一套把戏，我这个当过参谋长的人早就识透了，只是我没有给你暴露“天机”就是了。其实如前所述，他回去以后还是向傅先生表达了我的思想情绪，即是要傅先生亲自来绥远一趟。

二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邓宝珊先生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我见到傅先生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那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象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先生来绥，对绥远军政人员来说，好象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但傅先生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和传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九月十日傅先生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我谈论起起义的问题。开头他问我说：晓九，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有什么看法？我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特别是协议规定：凡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区的我军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并均按北平和平起义人员对待，一视同仁，不咎既往。但只将河北、永年的人释放回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如周钧、靳书科等多人，屡次交涉，不予释放。尤其听说在北平把你软禁起来……等。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象这样起义的悲惨结局，我不愿参加。傅先生听了我

的说法后说：这就是你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吗？怪不得克俊和漱泉（张濯清的字）都说你非常倔强，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首先从我来说，我并没有被软禁过，那完全是特务们的造谣。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随便活动，而且还乘飞机到石家庄去见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当然，某些地方作的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因为十个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嘛，有的长，有的短，怎么会一样呢？在河北永年的人员全部释放了，在张家口就没有释放，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这一点必须要认清楚。傅先生又说：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经知道了，已对个别部门提出批评，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察哈尔省让他们赶快释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顾虑。听了傅先生的这段解释，我仍不大相信。因为有人告我说：共产党的手段是先甜后辣。所以，我又说：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共产党绝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傅先生听后说：那就等着以后用事实来说明吧！我同傅先生第一次谈论起义问题就谈了这些。

第二次傅先生同我谈话时，就比较深入了一步。傅对我说：目前全国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地方也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呢？不管共产党对我们怎样，这样不得人心的内战，我们是不能再打下去啦！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过去天天说为人民，实际上是

摧残压迫人民，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给特权豪门保镖。所以得不到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我们遭到失败。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一切全是为了人民，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能够成功。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和出路都是光明的。傅先生的这一段话对我启发较大，心中比较豁亮了一些。但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说：傅先生的话很对，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傅先生在北平的和平解放，弄得一个人也没有剩下，甚而有些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如果我们再同傅先生一样，就都得跳黄河淹死啦！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而这次的条件不能同北平的条件一样。必须是部队不能再解散，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们的人一律释放，并按起义人员对待。傅听后说：绥远这次起义和北平和平解放不一样。毛主席指示：绥远起义是另一种方式，就叫做“绥远方式”。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是包下来，一包到底。在张家口关押的周钧、靳书科等人，已由党中央通知察哈尔人民政府全部释放，并都按起义人员对待，一律既往不咎。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只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些条件比你要求的还要好得多，你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我听后说。如果能如傅先生所说那样，真正说话算话，我们的干部和部队都有了保障，我就再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了。不过我还有怀疑。第二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引退”的蒋介石跑到重庆，派徐永昌带着他的亲笔信于九月十六日飞到包头，请傅先生赴渝同他相晤。蒋介石还让徐带着口信，希望傅先生任西北军政长官之

职。在此以前，“开府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至广州，所谓“开府广州”寓有讽刺之意）的李宗仁和傅先生的老上司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也给傅先生来过电报，邀请傅先生到广州“共商大计”。同时，蒋介石在给傅的亲笔信上说：你这次脱险返回绥远，就象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由于一念之差造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让傅先生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另外，我委托我自己的亲信人员注意探听傅、徐以及其他人的态度。同时，我认为傅、徐会晤之后，将是绥远局势揭晓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我正式表态的时候。傅、徐会晤的结果将是怎样，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知道，但根据我多年跟随傅先生的经验，深知傅先生绝不是出尔反尔的人。徐永昌绝不能扭转傅先生已经确定的方向。据我后来了解，傅先生预先确定的对徐的对策是先声夺人，即一开始就请徐也留下一块起义。而徐永昌看来也是“演戏”来了。一方面，作为蒋介石的“使者”，他必须摆出劝说的姿态。另一方面，作为傅先生的老友，也不能一味不顾事实，昧着良心把国民党的状况和前途说得那么“有希望”，不敢竭力敦促傅先生去蹈蒋介石所埋设的陷阱。与此同时，我感到蒋介石既然明着派徐永昌来劝说傅先生，如果傅先生不上他的圈套，而暗中就有可能让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对傅先生下毒手。为了保证傅先生的绝对安全，我特由固阳调来一个强有力的骑兵团，在傅先生的住处加强保卫及警戒。并对该团长说：如果傅先生的住地发生问题，定以你是问。同时我自己也提高警惕，以防特务们在我同意起义之后，对我进行暗害，或将部队拉走一部分。所以，我在医院一概不接见外人，对起义也不

表态。因此，当时有些人说，起义的电文都写好了，只有孙兰峰不签字。实际在当时，我正是为了稳住中统和军统那些特务们，使他们对我尚存有幻想，听到我不签字，绥远就起不了义，而不敢对傅下毒手、对我进行暗害。及至起义电文写好，徐永昌不能说服傅先生，又知道我之所以不见他就是耍跟着傅先生走起义的道路，徐永昌走了。

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跟我，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那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那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象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话来可说。我只简单地说了：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依照傅先生的看法和主张行事，这本来是我内心中经过多番思考，早就确定了的一条原则。因为根据过去多年的生活经验，证明傅先生要比我们看得远，对部下对同事重义气、重感情、负责任。

既然傅先生认定了起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又把一切都安排停妥了，我怎么会不签字呢？签字，它标志着我自己决心弃暗投明，参加到“九·一九”起义的行列，它代表着我决心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将从头学起，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现在回想起签字的那个时刻，我心中仍然充满了兴奋之情，好象那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三

我同傅先生谈话之后，就在用红绸缮好的电文上签了字。这样，在董其武和我的率领下，绥远起义变成了现实。参加签字的三十九人，在包头市绥远省银行分行举行了庆祝签字仪式。我们庄严隆重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分别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的反动集团，走到人民的行列中来（电文从略）。

通电发出的当天下午，傅作义先生在中国银行院内召集干部讲话。他说：过去我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个责任完全应该由我来负。今天我把大家领到光明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你们中自己走错了道，那要由你们自己负责……。傅先生胜利地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之后，即和邓宝珊先生二人乘火车返回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也同车去参加会议。在西直门车站迎接傅、邓的有华北军区的聂、薄二位首长。

通电发出后的次日，即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

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来。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时也收到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复电，对绥远和平解放表示热烈祝贺，并勉励我们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获悉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复电，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我参加全国政协成立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荣幸。当我第一次步入政协会议的会场时，我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悬挂在那里，这是我作梦也梦想不到的事。心中顿然感到共产党真是伟大。我曾把自己的这一感受写进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里。特别使我感激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设便宴招待过傅先生和我。傅先生不会喝酒，我是能喝一些的。总理亲切地对我说：噢，你能喝酒，我这里还有一点好酒，你尝一杯吧！随即从书架上取下半瓶酒来，给我斟了一杯。总理介绍这酒是一位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珍藏了多少年，解放后孙夫人转赠给了总理。这真是好酒！而且是同这位为中国人民革命一生战斗不息、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好酒！我喝下去以后，立刻觉得有一股热流在我腹中回荡不已，并且传遍我的周身。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后，我参加了十月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象那天那样感到自豪。由北平返回绥远后，我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

并后，我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此外，我还是历届政协委员，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起义三十年来，一贯受到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内蒙古党委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内心实在感激。党的光辉照耀了我的全家。在我的儿女和儿媳中，八个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是党培养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大学生，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他们的力量。孙子辈中，也有两个考入了大学学习。我们的幸福和愉快完全是党给我们的。在旧社会中，绝不可能设想自己的子女会有如此好的前途。

四

三十年前绥远全体军民，能够举行光荣的起义，走向革命的光荣大道，主要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英明领导，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和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对我们的启示，及其对绥远起义无限关怀和大力诱导的结果。当然，这也是由于反动派蒋介石政府人心丧尽，全体军政人员认识到只有跟着傅作义先生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才有前途和出路，人民才能幸福，国家才会富强。回顾三十年来跟随傅作义先生起义过来的傅部全体军政人员和干部，都是按照党的起义政策，既往不咎，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各安生业，而且是一贯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照顾和策勉，尚有一部分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把一个在国际上被人看不起的国家，一变而为在国际舞台上富有极大威望的国家；把一个遭受帝国主义长期欺压侮辱的

民族，一变而为受到世界人民非常尊敬的民族；把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和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一变而为各族人民和睦团结的大家庭；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推置到建设四化的轨道上来，一变而为政治民主，经济进步的国家。三十年来走过的光辉里程，使我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一九八〇年元月十八日

绥远“九·一九”起义侧记

周北峰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傅作义将军派我到河北省藁县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北平和平解放时，就同时提出了绥远的解放问题。

北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罗荣桓政委、聂荣臻司令员和林彪于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将军时说：“今后绥远的解放，由贺龙同志负责。”这就于席间商定了双方的商谈代表。

一、确定商谈代表

平津前线司令部各首长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将军时，贺龙将军提出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代表。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二位同志，绥远方面的可由傅作义先生指定人，就在北平进行商谈。傅说：“仍由周北峰参加吧。”我说：“是否可由王克俊负责，我来协助。”傅说：“克俊还有华北总部结束的事，就仍由你负责进行吧！”贺老总当时就说：“双方各派二人。”傅说：“那就让阎又文帮助周北峰。”于是绥远和平解放的双方代表便这样决定了。贺老总说：“潘纪文是傅先生的旧部下，明天就叫他去拜见傅先生。”

二、商谈开始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我们就在北京饭店开始进行第一次商谈。

商谈时，先谈解放军绥蒙军区姚吉司令员的部队与董其武将军部队的就地停火问题。第一步我们就与董其武将军电报商洽停火线的划定。我们进行商谈，是由李井泉同志任谈判小组长。我们提出了董其武将军对停火线划定的要求，由李井泉同志与华北局和绥蒙人民政府联系后，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定一条停火线。这条线的标定，经过好几次的电报往返，总是确定不下来。这条线的拟定是从卓资山县旗下营北山后大滩到托克托境内的黄河北岸喇嘛湾。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只是喇嘛湾这个村，当时已是解放区了，董要把喇嘛湾这个村划到董的部队驻防方面。单是这一点就拖了十几天。以后还是李井泉同志说：“算了吧！这个营子本来是解放了，董其武先生一定要划过去，也就算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和军队可以撤出来。”停火线划定后，便进一步商谈如何接通铁路线，如何进行商业贸易，双方货币怎样互相通用兑换，以及双方人员如何互相来往联络等，都有了大致上的商定。这个问题谈了个轮廓后，李井泉同志说：“贺老总要离开北平，我也要到的地方去，绥远解放的商谈今后由党中央华北局薄一波书记负责。”华北局派定了张友渔、李哲仁同志作代表。不几天，我们就接着继续进行商谈，并向薄一波书记作了汇报；所谈各项，我和阎又文都向傅先生汇报，并电告董其武将军。根据我们所谈，就定了个协议草案。五月末，华北人民政府与董其武将军派到北平来的代表，于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会议室，对所谈的

协议草案作了草签。

三、毛主席接见傅作义

关于绥远解放的和平起义协议草签后，毛主席于中南海的丰泽园接见傅作义先生。接见时有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同志、陶铸同志。这次参加的还有邓宝珊、阎又文和我。

毛主席接见时指示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些条款进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清楚，是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能有这样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我们叫做‘绥远方式’。傅作义先生这次做得很好。我们所说‘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这都是傅先生——在你的统辖的范围内进行的。”

毛主席接见了傅作义先生后，薄一波同志、聂荣臻司令员就领导我们对绥远和平起义进行准备工作。这时傅作义先生决定派刘庸笙同志偕同几个人，带上协议的条款和划定停火线的地界图，作为先遣小组去绥远。在这个小组走后的三、四天，我偕同傅的原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师长冯梓去见傅作义将军，并由冯向傅汇报了关于绥远近来的情况。

冯梓于北平解放后，因为他的眷属住在归绥，他就回绥远去了十余天。他回到北平后，到医院看我（我那时是在协和医院作甲状腺切除。冯当时甲状腺上长了个小瘤子，所以他到医院看我，同时也打算治疗他那个瘤子）。我们相谈后，他说了些绥远的情况。因为他从当见习军官起，就在傅的部队里，所以他在傅部的熟人很多，知道的内幕情况也很详细。这时我的病已动过手术有四、五天了，所以我们就相偕到傅先生的家里，

将他了解的情况详细地向傅作了报告。傅认为董部下的刘万春、鄂友三、乔汉魁别有企图，不大听懂的话。最近这几个人还在归绥秘密地召集了几次会，都是瞒过董进行的。傅认定有必要派他老一点的高级干部，到归绥帮着董其武，并说服刘万春等人。于是就决定派陈炳谦到绥远去。傅在陈走后数小时，觉得还有要紧的话要当面给陈吩咐，遂又派人到张家口把陈截回北平。当时的京包铁路还没有正式通车，北京到张家口要换车。陈的岁数大了，那时火车通行的是一些简易的设备，陈返北平后便病了。于是改派张濯清去，王克俊偕同前往。张是傅多年的参谋长，后来一直在傅部担任高级军政工作；又因张系回族，与刘万春有旧交，所以派张去主要是帮助董其武将军劝说刘万春。张去后，便协同王克俊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张世珍谈了几次话，传达了绥远和平解放的条款及毛主席、周副主席对绥远和平之所以采取的方式（即“绥远方式”）。待张、王帮助董其武将军作了些工作以后，华北局便决定派潘纪文、鲁志浩同志，还有其他八、九位同志，作为联络处，进驻归绥。这样，绥远的起义便半公开了。国民党的特务此时也活跃起来。刘万春部的一个师政工处长赵元德，纠集了一些特务人员，乘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几个同志上街买东西的机会，于新旧城之间，用手榴弹杀伤联络组的同志，有一位王士鑫同志因伤重致死。此事的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于董致傅作义先生的电报中知道的。傅令我将此电报交薄一波同志看。我见薄一波后，薄一波说：“华北局也接到了潘纪文同志的电报，潘来电并说他准备率联络处返回丰镇。”同时还说：“我们已电丰镇，着潘休息几天，准备再组织人去归绥。”又说：“此事已呈报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待指示后再说。”解放军派到归绥的联络处，在鲁志浩同志负责下，继续工作到“九·一九”

起义。

四、毛主席关于绥远问题

第二次接见傅作义

我与薄一波同志谈了联络处在归绥被国民党特务枪击的事，一、二日后，薄一波同志告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接见傅先生，今天晚上就去。”也告我说令阎又文和我同去。毛主席、周副主席接见时，毛主席指示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可电知董其武多加注意。”又说：“傅先生借邓宝珊先生可以去绥走一趟，绥远的解放用‘绥远方式’是不变的。绥远省将不用军管，由傅先生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待起义通电发出后，即进行组织。”并面令薄一波同志对傅先生去绥远准备一下。

五、对傅去绥远前的准备

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第二天，薄一波同志通知我和阎又文到华北局去。我们到了华北局，聂荣臻司令员已先我们而到。在座的还有张友渔、李哲仁同志。由薄一波同志主持，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及我们所得到的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主要研究的是绥远各部队的政治态度，并分析了当时的绥远形势。因为傅先生前几天除派张濯清、王克俊前去外，认为还应该与董部在绥远的主力第七师直接联系。当即秘密地派冯梓假借到绥远北山开矿去，携带了几个电务人员前赴绥远。冯到绥远与第七师张世珍师长接上了头，由第七师的电台与北平通了电报。我们就根据这些情况安排傅先生到绥远的驻地问题。

总司令员说：“傅到绥远可驻到归绥、包头中间。”因为当时包头已由蒋介石的特务张庆恩和孙兰峰左右的坏人，闹得乱腾腾的了。归绥的情况，虽然刘万春经张濯清说服，不再与董其武为难了；但对刘的部下和鄂友三、乔汉魁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所以傅到了绥远，归绥、包头都不使驻留。我们研究傅先生回绥远去，可以驻到归绥与包头的中间，选定一个风景幽美、原明朝末年土默特旗顺义王的王府所在地——美岱村。并电令第七师开一个团绕道大青山后，前往担任警卫。傅先生到了那里，可召集归绥、包头的高级将领，进行起义的商谈。毛主席指示傅去时，由国家银行拨给现大洋十万元，作为傅到了绥远犒赏他的原属部队使用。

这里有个小插曲：傅到了美岱后，被国民党中统头子张庆恩知道了，张就从包头坐了个压道车，到了美岱。傅的随从正在车站往村里搬运行李，张庆恩认识傅的随从副官主任张锦涛。张副官主任不了解情况，便用搬行李的吉普车，把张庆恩捎到傅的住处——美岱中学。阎又文他们几个人在院里看见，一面告卫士说：“张处长来了，你们去报告总司令。”便请张先到他们的屋子里，同时并布置对张的监视。张与傅谈了一个来小时便出来。据阎又文说，看见张庆恩很不愉快，张便又返回包头。

六、傅对他旧部的犒赏

傅在路过归绥时，曾在归绥停留一夜，向董其武和刘万春、张濯清等，传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对绥远和平起义的指示。并向董其武、刘万春说：“北平解放时，他向解放军要求留下了几个军需库未交，所以他这次带来一车皮的军服用布，还有

他已向毛主席请示过，在他原来绥远的部队里（奋斗基金社）的积蓄，除大部都移交给国家外，北平还有些现大洋，这次也带来十万元，准备连同人民银行拨给的十万元，一同发给部队（因为自从商谈绥远起义以来，国民党中央已不给董的军队发饷了）。傅与董、刘谈了这些，随后便到美岱，召集了他在归绥、包头两地的高级将领，开了两天会议，就一同去了包头。董其武派了史国玺带一个连加强了傅的警卫。

傅到包头后，本来绥远的和平起义即可顺利地告成。此时蒋介石派徐永昌乘飞机也到了包头。徐永昌持有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蒋欲使徐永昌说服傅作义先生到广州。所以绥远的和平起义通电不能即时发出，傅电令我转告华北局和周副主席。这个时间大约是九月十六、七日。

七、周副主席的关切与指导

九月十八日为日本侵入东北的纪念日。周副主席、李富春、陈毅同志在北京饭店七楼会议厅，召开了个欧美同学座谈会，由李富春同志主持。周副主席看见我也参加这个会，就派阎宝航同志把我叫到别的一个屋子里，详细地问傅作义先生在包头的情况。我将傅走后给我的一切电报所说的情况都向周副主席系统地陈述了。周副主席指示说：“蒋介石派徐永昌到包头是要破坏绥远的起义。”并风趣地说：“傅先生在包头是与徐永昌作拔河赛，你可详细地把党的“绥远方式”电告傅先生，并说全国政协已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开幕，这个会议就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傅要在会议前赶回北平。”并请傅先生把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的名单事前告知。谈话后，嘱咐我立即电告傅先生。

八、起义的签字

周副主席对我指示时，已是下午七时多，我立即到东城史家胡同傅的华北总部办事处，给傅发电报。此时留在这里的秘书人员、都已回家去了，但是电务人员这几天是日夜都有人在，我就起了个约数千字的电稿，督促电务人员立即翻译并拍发出去。夜半傅来了复电，大意说：“徐永昌有意迟延离开包头，徐说他病了。傅已请邓宝珊先生告徐，如果需要治疗，就请董其武给徐找个休养地方（邓与徐原都是冯玉祥国民军时国民二、三军的，有旧交），同时并由邓劝徐留下同回北平。徐感到他的目的不能达到了，也觉察傅有软留他的意思，便表示他准备明天飞回广州。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晨，傅来电说：“徐已决定今天飞回广州。你前电说周副主席说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名单，除你以外再提两个。你就正式告诉周副主席，我的意见是董其武、孙兰峰。”（即傅先生、邓宝珊先生、及董其武、孙兰峰和我，一共五个人。）我接了电文之后就向周副主席报告了。周副主席说：“你电傅先生：此次列名代表的，都必须出席。毛主席说除颜惠庆、萨镇冰外，都不能请假。”傅接电后，又来电说：“董其武怕不能随我到北平，也请假；孙兰峰还是拒不签名起义，可改另一人。”我二十日凌晨一时许到中南海向周副主席报告，副主席回答说：“孙不签名，就四个人吧！”天明三时许，傅又来电说：“孙已签名了，代表名单上还是添上孙兰峰。”电尾并嘱咐无论如何必须立即呈报周副主席。此时已经快天亮了。我只好与薄一波同志电话说明要立即拜见周副主席。一个多小时后回电话说：“已请示周副主席，你可于五时前去向周副主席报告。”我到中南海门口，因为一波同志已事

先联系好了，只在大门口上问了我一下，就一直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周副主席问我，傅先生由包头起身了没有？我说傅电报说，孙兰峰已签名起义，政协代表还是加上孙的名字。起义电文明日即可发出，他也于此电发出后就起程返北平。周副主席问：“孙兰峰是否随傅先生一同来？”我说：“电报没有说明，此时也不能与傅联系了。”周副主席说：“那不行，孙兰峰既是那样情况，他列名全国政协代表，要是没有来，那就很不好。今天下午就要开全国政协筹备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代表名单，这样就不好决定他的代表。”我说：“我判断傅先生一定要偕带孙兰峰同车来。他在起义前闹的那个样子，起义了董其武是必须留下安排善后，孙若留在绥远，傅是不放心的。”周副主席说：“你说的有道理，只是还要再考虑一下，最好是由华北局与绥远人民政府联系一下，令他们于傅先生的车过丰镇时，到车站欢迎傅先生，并看同来的有没有孙兰峰？即来电话报告。那就于今天（九月二十日）下午全国政协开最后一次筹备会通过出席代表人名单时，便可决定。”

九、起义通电

二十日十时许，电台上送来董其武将军的起义通电，电文译出后，我即到华北局去找薄一波同志。薄看了后说：“通电的签名虽然有孙兰峰，只是丰镇到现在还没有来电话。”我们正在谈话中，报告说丰镇来了电话，说傅作义先生的铁甲车已过了丰镇了，车上同坐的有孙兰峰。薄当时就向周副主席打电话。周副主席令薄即到中南海去。薄令我在华北局等他向副主席报告后给我来电话。半小时后，薄一波同志就回来了，说电文毛主席也看了，指示说：“除了把蒋、李、阎下边加上他们

的名字——介石、宗仁、锡山——外，别的就一字不改，全文发表。因为作为历史文件，后人可能把蒋、李、阎误为别人。”我说：“电文上有‘和平告成’，是否可以改为‘解放告成’。”薄说：“主席指示‘全文发表’，你说把‘和平告成’改为‘解放告成’，当然比较好一点。”我说：“可以这样修改一下，我可以电告他们，说电码上这两个字码不明。”于是就这样决定了，由一波同志送交发表。关于电报的日期，我说：“他们是今天早晨发出来的，今天已二十日了，是否提前一日好点？”一波同志说：“可以。”所以，绥远的和平起义就是“九·一九”。

十、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傅作义

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会。傅作义先生、邓宝珊先生、孙兰峰先生和我们都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开国典礼。我们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天安门大会后三、四日，薄一波同志告我说：“毛主席要接见傅作义先生、邓宝珊先生，你和阎又文也去。时间确定后，我再打电话通知你，你先给傅先生打个招呼。”当天晚上薄一波同志就告我说：“今天晚上你就随傅、邓一起去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就接见了我们。在座的并有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同志。毛主席指示说：“绥远的和平解放是全部完成了，绥远不采取军管，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傅先生任主席，姚喆、董其武、孙兰峰任副主席，一波同志任绥远军区政委，高克林同志任副政委。邓宝珊先生回甘肃任省主席。董其武兼任绥远省人民政府的主席，周北峰等部可以到绥远参加

省人民政府工作。傅先生，你再看还有什么人可以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由一波与你筹划一下。绥省的工作今后可以按‘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的原则，由董其武同志领导，大胆地努力工作！”并说：“李德邻（李宗仁的号）于和谈未成后，跑到广州，对人说，他是六亲无靠。象他那样，本来六亲无靠嘛！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了姑舅亲了，你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关于中央的你就找恩来，关于华北局范围的你就找一波同志。你过些时候可以回绥远走一趟。”说着就向薄一波同志说：“傅先生回绥远去的事，你和荣臻同志可以安排一下。”

关于绥远的“九·一九”和平起义，我从侧面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其主要情况，董其武将军将有另文撰述。因为我当时不在绥远，一些具体的详细情况，不是第一手材料，所以就只能写出这一点，以供参考。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光 辉 的 里 程

——回忆绥远光荣起义三十周年

胡景通

今年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也是我们参加绥远光荣起义的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的光辉里程，使我深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救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北伐战争和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放眼未来，前程似锦：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无限美好、无比幸福之中。让我们热烈欢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原任国民党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朝夕渴望的国家和平统一，人民生活安定，得以休养生息的美好憧憬，却被蒋介石反动派凭借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发动了全面反人民的所谓“戡乱”战争，一手撕毁了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和谈协定，把全国人民又拖到了苦难的内战深渊。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充分地认识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民党反动派，其罪责是深重的。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六弟胡景铎不愿再跟随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毅然带领原陕北保安部队及骑六师一部分部队，在横山县波罗堡起义。胞弟胡景铎的起义，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开始考虑，走我六弟投向人民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恰于这时我又遭到了蒋介石、胡宗南等人以督率无方，给以撤职查办的处分。此时此刻，我对个人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处在一个瞻顾、徘徊之中。以后经过邓宝珊将军和原行政院院长张群竭力为我解说，又经原军令部长徐永昌及南京原卫戍司令张耀明等人从中说项（因和我长兄胡景翼在国民二军有旧谊关系），才撤销了军事审判处分。一九四九年三月，原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离开部队后，仍恢复了我原二十二军副军长并兼任八十六师师长的职务。我于五月初由上海经西安到达包头，在董其武将军的领导下，组织驻伊克昭盟原二十二军骑兵团段宝山部，步兵团和协华部，及护送家属到包头的一部分部队，连同军部人员及随邓宝珊将军由北平返回包头的原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以及先期到达包头的原二十二军参谋长姜谦祖等，成立了八十六师。这对于收容当时分散之部队及流离官兵，避免扰乱地方秩序，为以后和平解放绥远，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一月，邓宝珊将军应傅作义将军邀请去了北平，共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并担任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协议，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原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经常与傅作义将军取得联系，他按照毛主席指示精神，成立了“绥远省革新运动委员会”，组织部队官兵进行学习。不断地提高认识，为促进和平解放绥远，打下了思想基础。记得有一次董其武将军还召集驻包头的原邓宝珊部团长以上干部，到归绥市绥远省政府开会学习，帮助大家提高认识。

绥远的和平解放，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按照毛主席所制定的伟大战略方针而实现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主席、周总理委托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来到绥远。起初他们二位分别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时，没有讲明自己的见解，而是听取大家意见，促其认清形势，自觉自愿地投向人民怀抱。在共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才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发出通电，宣布起义。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不断地派人用各种手段，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是，由于董其武将军组织部队官兵，进行了相当时间的学习，又经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的启发、教导，大家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正确，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毅然宣布起义，使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未能得逞。

绥远起义通电，是由董其武将军等三十九人联名发出的。起义通电发出后，于九月二十日即接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全文如下：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复电，给我们全体起义官兵鼓舞很大，今天读起来，还是倍感亲切。回顾我们参加绥远光荣起义，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和争取团结教育的结果；是使我们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新转折点。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我们过去或多或少地都做了些不利于人民的事情，起义后曾产生过一

些疑虑。事实证明，这些疑虑完全是不必要的。党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都表示欢迎。对我们起义部队，一视同仁，团结改造，不咎既往。从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毛主席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十分伟大而正确的。

我们原随邓宝珊将军绥远起义的部队，奉令开到甘肃庆阳，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四师，把我们从一个旧军队改造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随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我们起义部队的官兵，有的留在部队服务，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总之，大家都各得其所，各安其业，那种苦于生活无着的顾虑顿消；相反，都觉得自己为人民的贡献太少，深感惭愧，积极争取为人民服务，另立新功。

我当时被选为陕西省政协驻会常委，参与共商国家大事。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信任和光荣。在学习实践中，深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大公无私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尽管有不少人遭到迫害，我自己也受过这种灾难。但是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进行拨乱反正，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恢复名誉，安排工作。对我的错案，也公开平了反。这种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的精神，再一次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也是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这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立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错误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同志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我们这些人经历的事情多，历史长，是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历史见证人。和我一起从旧社会过来的同事们，朋友们，他们都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国际地位的提高而自豪，都为自

已幸福晚年而欢欣愉快。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在党和国家的培养关怀下，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大学毕业，都投身到各个不同的建设岗位上去，他（她）们中不少人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贡献。那种在旧中国毕业就要失业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青年人为了父辈们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感到无上光荣。我们再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没有出路了。

通过我参加绥远“九·一九”光荣起义的亲身经历，愿寄语在台湾的朋友们，要认清形势、走爱国起义的道路。既是光荣的，也是最切合实际的，万不可再犹豫下去了。今年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了《告全体台湾同胞书》的伟大号召，这是一篇合情合理的忠告。我衷心地希望台湾当局和在台湾与祖国大陆分别三十余年的亲友们，要认清形势，迷途知返，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万万不要成为遗恨终身的千古罪人。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一九四九年绥远省“九·一九” 起义的片断回忆

孟昭第 赵晓峰 王 兴

一、起义前的概略情况

当一九四八年年底，东北野战军在胜利地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任务之后，迅即挥师入关，和华北兵团合力围歼华北的国民党部队。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保安战役，围歼了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三十五军的军部和所属的两个师。十二月二十四日，攻克了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守军第十一兵团的一个军部、七个师。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解放军攻克天津，活捉守军指挥官陈长捷。当时，困守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已进退维谷，陷入绝境。由于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傅作义的深明大义，认清形势，遂使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天津战役结束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剿总”）驻绥远省的部队，由董其武将军率领。当时，董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和绥远省保安司令兼“剿总”驻绥部队的指挥官（国民党发表了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之后，也给董其武加了一个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头衔）。指挥所设在归绥新城，和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合署办公。解放前夕的绥远省保安副司令是孟昭第（孟的前任是刘万春和陈光斗），指挥所参谋长是王兴。所指挥的部队主要有：八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三个保安旅。但是这

些部队当中，除张世珍的独立第七师和赵晓峰的二五八师装备较好兵员也较充实，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平津、新保安、张家口等战役，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的残兵败将，以及一些地方团队和日本投降后改编的伪蒙军。这些部队装备残缺，训练又差，士气十分低落，是些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当时全国形势是：国民党的所有部队正处在土崩瓦解、迅速崩溃之中，尤以平津战役之后，困居绥远省一隅的绥远部队，已失去了靠山和指挥中心，既无险可守，又无路可逃，内外交困，人心惶惶，摆在面前的，只有走投靠人民和平起义的一条光明大道，别无他途可选。而且部队中的上层领导和中坚干部，绝大多数是追随傅作义多年的人员，他们唯傅的“马首是瞻”，拥护傅（作义）、董（其武）的主张，赞助起义。可以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绥远部队和平起义的前导。

在政治方面，绥远地区多年来就形成了两种政治派系。一派是以张钦、阎肃、于存颢为代表的所谓“张派”；一派是以潘秀仁、张遐民为代表的所谓“潘派”。这两派是互相对立互相倾轧的。对起义来说，张派是倾向于起义的，而潘派是坚决反对的。原因是，潘派的政治后台是国民党中央CC，这一派完全掌握了绥远省的党权，上自省党部、下至各县党部的人员，大部分是他们的喽啰。当时潘秀仁又是省建设厅厅长，张遐民是省财政厅厅长，在行政方面有一定的政治实力，所以在当时的潘派对绥远起义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二、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四九年年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紧跟着北平也

宣告和平解放。可是绥远的国民党部队一直拖延到当年的“九·一九”才举行起义，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是由于：

1、平津解放后，潜伏在军政各方面、各阶层的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绝大部分逃到绥远，它们和当地原有的特务、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打入部队和行政方面，造谣惑众，散布流言，甚至张贴反动标语，组织游行示威，指使暴徒袭击共产党和谈代表。总而言之，他们想方设法制造种种事端，以破坏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

2、国民党中央虽然从南京退逃到广州，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暂代总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他们对绥远还是不肯轻易放弃。这时候阎锡山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部长。这两个老奸巨滑反动透顶的家伙，与绥远部队的上中层将领有多年的历史关系。比如，傅（作义）是阎锡山的老部下，徐永昌和傅又是多年的老朋友。而部队中团以上的将领大半是从太原北方军官学校和学兵团毕业的，虽然，从一九三八年傅作义就脱离了阎锡山的系统，率部从晋西北地区的河曲、保德、偏关一带离开了山西，转入前绥远省西部河套地区，投靠了蒋介石，但藕断丝连的旧关系仍然是存在的。因此，他们便利用“旧情难忘”的旧关系，拉拢绥远部队的上层领导。具体办法是：文电往返，危言耸听，陈述利害，企图从思想上打消起义动机；在经济方面，给以一定数量的补给；派遣大员到绥远，进行游说劝阻。如：

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具体时间忘记），董其武派一百一十一军的参谋长樊折桂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汇报情况，并请求补给。当樊回来的时候，从飞机上带回不少金条和现洋，还有几箱美制电镀六轮手枪和大量反动宣传小册子。

一九四九年七月下半月（具体日期忘记）的一个上午，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三人从包头乘飞机到了陕坝，住到“塞上新舍”^①。下午徐永昌偕王叔铭带领随员四人，也乘飞机从广州到了陕坝，和董其武等同住在“塞上新舍”。同时徐永昌又指示绥西警备司令于霖瑞，打电话通知田树梅也来陕坝，一同开会。会议进行三天，内容极端秘密。

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义前夕，徐永昌又飞抵包头。这时傅作义早已从北平到了绥远，住在萨拉齐县^②的美岱召村，分批召集绥远军政首领，商讨起义事宜，而且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但国民党反动派向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徐永昌到了包头，马上约傅到包头和他见面，极尽阻挠破坏之能事，妄图使绥远光荣起义的行动功败垂成。

三、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

一九四九年春节期间（具体日期忘记）平津战役之后，华北形势急转直下，困守绥远一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正当这个时候，驻防陶卜齐^③的第七师的一个团（团长杨镇田），突然和解放军发生了战斗，而且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消息传来，好象晴空霹雳，震动了整个归绥，人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乱成一团。有汽车的人，收拾细软，携带家眷，早已捷足先登，逃之夭夭了。没有运输条件的，则拖儿带女，聚集车站，候车西逃。就在这一天的下午

①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在陕坝修建的贵宾馆，名为“塞上新舍”。

②萨拉齐县——今土默特右旗。

③陶卜齐——村名，在归绥东约七、八十华里。

一点左右，驻绥部队指挥所的张杰民参谋给王兴打来电话说：“参谋长，你快回来吧！有紧急事，越快越好”（当时王在省立医院割治痔疮，手术后尚未出院）。当王兴赶回指挥所的时候，有的人正在收拾行李，有的人整理文件装箱待运，作战科墙上挂的军事地图也都扯了下来。因王兴当时还不了解情况，所以他感到很突然，就问参谋们，“这是干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你还不知道吗？主席办公室来电话指示，让立即准备行动，可能是因为陶卜齐战事吃紧，准备向西转移哩。”王兴当即指示参谋人员说：“你们不要惊慌，各守岗位照常办公，地图还挂起来，我马上见主席去。”当王到了省府东跨院主席公馆的时候，会议室已经挤满了人，潘秀仁、张遐民等主张逃跑的一伙，正包围了董其武，极力劝董马上行动西撤河套。另外，还有张世珍、卫景林、张副元、赵晓峰等几个人在一旁心神不定地交换意见。他们见王兴进来，都说“快来！快来！我们正等着你哩！”坐定以后，王兴就问，“什么事，这样惊慌？”他们说：“陶卜齐的战斗你知道吗？”王说：“我刚才听说。”他们紧接着说：“你看，现在有些人包围了董先生，故意夸张事态，劝董先生和他们一同率部西撤后套。”王又问：“董先生有表示么？”他们说：“看来董先生还没下最后的决心，不过看样子也有点动摇了。”王又问，“你们几位的意见呢？”一致回答说：“我们几个人都不同意撤退”。王说：“好！马上请董先生过来和他谈一谈。”当董过来以后，你一言，我一语，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不能撤退的道理。大意是：①从目前来看，陶卜齐战斗是局部的，因为其他方面并没有发现全面进攻的征候。②绥远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从当地征集起来的，乡土观念十分严重，不撤退还可稳定一时，否则必然引起大量逃亡，我们这些人都会变成光杆司令。③包头以

西的地区更是无险可守。如果还打算继续西撤投靠二马（马鸿逵、马步芳），那就更不可能了。二马之所以和我们信使往来，确取联系，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定的实力，可以做他们的挡风墙。如果我们放弃了绥远去投靠他们，那时他们绝对不会收容我们的。④如果打算将后套地区做为根据地，放弃归绥一带固有地区，上山打游击，那更是“班门弄斧”，自取灭亡。⑤目前陶卜齐的战斗必须马上派遣增援部队坚决顶住，否则便形成了“城下之盟”，谈不上什么和谈起义了。这一席话才使董从一时迷惘中清醒过来，悬崖勒马，拒绝了潘、张等一伙后撤逃跑的错误主张。潘秀仁、张遵民等见劝董西撤无效，只好各自携带家属跑到了后套（在陕坝住了两个月，才逃往台湾）。至于陶卜齐的战斗，因我解放军主动脱离战斗，很快也就停了火，绥远的形势才重新安定下来。

四、光荣起义

绥远起义是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所决定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就早已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到“九·一九”起义，这半年多的时

间里，解放军在军事上是采取“围而不打”，在政治方面，主动派遣和谈代表潘纪文、鲁志浩等同志进行和平谈判。到了后期阶段，毛主席派傅作义亲临绥远，进行说服教育，使绥远所有将领都能认清形势，深明大义，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由董其武、孙兰峰将军领衔，带领原绥远地区军、政及蒙、汉各方面代表人物三十九人签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人民的道路。（电文略）

毛主席、朱总司令接到“九·一九”起义的通电，次日即复电说：“……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时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也复电说：“要把绥远建设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五、整顿部队、抗美援朝

“九·一九”起义后，一九五〇年一月，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主席傅作义，副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等。同时，成立了绥远省军区，由傅作义将军任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高克林、杨业澎、王克俊任副政委；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任副主任；刘华香任参谋长，袁庆荣等任副参谋长。还成立了绥远省人民政府，董其武任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任副主席。

起义部队自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之下进行改编，至四月十日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

计有：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政委康健民，副军长王建业、张惠源，参谋长樊折桂（刘万春于部队东进前因反革命案件被捕，军长由王建业代理）。下辖三个师，即三一九师，师长赵晓峰；三二〇师，师长马逢辰；三二一师，师长王崇仁。三十七军，军长张世珍，政委帅奇，副军长卫景林、冯祥。下辖三个师，即三二二师，师长温汉民；三二三师，师长张副元；三二四师，师长张璞（张璞和刘万春同案被捕）。另外，还有骑兵第四师，师长鄂友三（鄂友三也和刘万春、张璞同案被捕），及张振基、陈秉义、乔汉魁等几个保安旅和独立旅。

一九五一年春，所有的起义部队，都陆续开往河北省的枣强、衡水、景县一带地区，司令部驻在景县的龙华镇。在入朝以前进行积极整顿与严格训练，并进行了民主、镇反、肃反三个大运动。同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入朝时复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司令员董其武将军、副司令员姚喆将军和高克林政委的率领下，渡过鸭绿江，参加了光荣而艰巨的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回忆绥远“九·一九”起义

王雷震

在纪念绥远“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时，自然会联想到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指导下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和平解放北平与绥远起义的关系。与此同时，也联想到傅作义所部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发生过的联系和影响，也终于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傅部起义投向人民。缅怀既往，这都是个人追随傅作义走过的路，曷胜感念系之。

一、北平和平解放对绥远的影响

傅作义先生过去在绥远省主持军政多年，影响很深。北平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在绥远还有过去为他所指挥的旧军队、地方行政人员和多年共同相处的人民群众。这些，在他说来是绝不能置诸脑后毫不顾及的。他积极地、义不容辞地推动和协助绥远举行了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的这股巨大洪流，波及到全中国，当然更是激荡着绥远地区，使绥远军政各界人士在思想领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一是，想着步北平解放方式之后，不用武力，不再流血，使绥远获得解放，走向新生；二是，犹豫观望，看一看全国各地解放战争的进行情况，然后决定何去何从；三是，少数人坚持顽固立场，企图负隅抗拒，继续追

随蒋介石的反动道路走下去。

具有第一类思想的人，大多数是跟傅征战多年的人，以傅先生的“马首是瞻”，都能够聚拢在董其武主席为领导的一边。地方人士中的张钦、于存灏、荣祥、胡风山等，也一直赞助董先生进行一切有关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

具有第二类思想的人，除了一部分老官吏、旧政府工作人员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地方人士。比如：一九四九年过春节（二月间）时，绥东解放军和绥远旧军队在旗下营发生冲突，潘秀仁、张遐民、苏挺等都跑了。后来，傅作义把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张濯清、王克俊派回绥远，协助董推动绥远的和平解放工作，未几，陈炳谦、李居义也来了。从此，具有第二类思想的人，就明显地出现了分化：明智的人都赞同了傅先生的思想，跟随董走向起义；少数人，受着蒋介石特务分子的欺骗和煽动，执迷不悟，如苏寿余、王华灼、郭长青等等，最后得到的只有“灭顶”的下场。

二、傅作义先生积极促进

绥远的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末，傅先生衔毛主席党中央之命赴绥，促使绥远起义。当时，在绥远尚有原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这些都是傅先生的旧部，促使他们起义原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董先生早已有心起义，积极准备多时，做了大量组织动员工作，绥远起义已成为水到渠成之势。但是所顾虑者有二：一是须注意绥远的一些地方部队，倘搞不好，就有可能四分五裂，骚扰地方。

其次是要注意绥蒙盟旗各王公及一些地方人士。这些方面，有的须要进行沟通思想和说服教育工作。总之，许多问题在关键时刻还有待傅先生亲临处理。傅于八月末到达绥远后，电召我由北平来绥，并令驻绥指挥所畀以高参名义，参加了促进绥远和平解放的工作。

傅先生到绥远后，即连续在归绥、美岱召、包头等处，慰问部队，并向官兵发放了慰问金。在各地也传见了军政干部，及盟旗各族各界等地方代表人士，如当时绥远省的参议会会议长副议长，少数民族代表，土默特旗总管，东四旗代表，乌兰察布盟、伊克召盟的代表，以及回族代表等等。

我到了绥远后，董主席派我到包头协助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登记在包头市的国民党特务和电台，均送到归绥。

三、毛主席对和平解放绥远的伟大战略

先是，一九四六年傅先生率领其主力部队东去之后，遗留在绥远的旧部队，虽然还有数万人，惟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弱。时至一九四八年末，东北解放军入关之后，实际上绥远已是处于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下，尽管强为支撑，但已处于孤立境地，不过是强弩之末而已。尤其是绥远地方广大农村多为解放军所控制，城市物资缺乏，补充困难，而反动派兰州兵站分监部对绥远部队早已停发补给。记得那时干部月支二十元，士兵两元，战士冬季棉衣絮的是旧套花。绥远旧部队处在这种困境之下，在军队是兵心不安，士气低落；在社会是人心浮动，惊慌失措。此种虚弱情况，实已早为毛主席、周总理所洞悉。如果解放军以武力解放绥远，易如探囊取物。然而，毛主席却命令驻绥解放军，对于绥远旧部队，只可就双方划定的界线对阵

以待，但“不要打”。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对解放绥远的伟大策略，即给以时间，转化矛盾，留待绥远自行起义。

我后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才知道指导平津战役的军事路线，即运用截断敌人部队之间的联系，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的策略。回想起来，很显明，对于绥远问题，就是有待于由傅先生赴绥，传达毛主席、周总理对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使绥远各将领有所醒悟，举起义旗，投向人民怀抱，走上光明道路。必须如此，才可以避免打仗，蹂躏地方，伤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毛主席和平解放绥远的伟大策略，不仅是体恤绥远人民群众免遭苦难，更主要的是要把人民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

为此，傅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和准备赴绥之前，先让张濯清带了许多革命书籍，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论联合政府》等等，使干部阅读后，在思想上受到一定影响，因而对起义更易丁接受。及傅将赴绥时，又让王克俊到绥远传达了毛主席对傅先生讲话的精神，并具体帮助董其武主席进行有关起义工作。

四、热诚欢迎傅作义先生来绥促进起义

傅先生这次衔命来绥，促进起义，在绥远方面绝大多数人是欢迎的。大家把和平解放绥远的愿望，寄托在傅先生身上。董其武主席亦早已筹划起义，当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北平和平解放条款签字之后（二十一日傅先生召集各将领开会，宣布了和谈条款，二十二日见于北平各报），即匆忙乘飞机到北平见傅，傅向他谈了当时形势，使他对绥远的起义在思想上有了

准备。董先生返回绥远，即着手集训军政干部，使大家重视和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还亲自到各部队讲话，宣讲北平起义情况，以及其它一系列有意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已决意要跟着傅先生继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进行绥远起义。当时，在绥远对时局有影响的，还有孙兰峰先生。尽管孙兰峰先生的第九兵团司令官，是蒋介石为在绥远搞分化瓦解，于北平起义后委派的，到最后他还是跟着傅先生走起义道路，使蒋的阴谋与毒计没有得逞。

五、绥远起义过程中战胜了重重困难

傅作义先生到绥远促进起义，尽管干部中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就此之前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还是战胜了不少困难。

和谈初期，共产党曾派代表到归绥。工作组的王士鑫同志，系集宁铁路局工会秘书，在归绥新旧城之间纯一善社附近马路旁，竟被特务煽动士兵用手榴弹炸伤，并因伤重牺牲。这个情况给当时和谈造成很坏的影响。继而双方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又被张家口解放后流窜到绥远的原察哈尔省某专员兼旅长李维业股匪有意破坏，竟越界滋扰，甚而活埋了共产党一位地方工作的同志。尽管董主席下令镇压了李维业，但对和谈却造成了困难。尤以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庆恩在包头多方破坏起义，气势嚣张，企图阻挠和破坏起义。当时，傅先生到达包头，为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尽了很大努力。这里应提及的是：不论是绥远起义、还是北平起义，邓宝珊先生都亟为关注，热情奔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虽然，那时绥远起义已是人心所向，但对于干部还须作艰巨的思想工作。即如地方部队中的干部，甚至在傅先生到绥远

后，起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同他们谈及起义，还是有人当面表示反对。有的认为“起义就是投降”，是“不义气”，决不干等等。我们只能耐心地向他们分析对比，在过去替军阀卖命，虐害人民，是与人民为敌；如今能幡然悔悟，就象晋朝的周处^①那样改恶从善，回到人民群众自己的队伍中来。这正是深明大义，怎么能说起义是投降、是不义气呢？

也有些人问我，你看能打么？我向他们分析说明，不打有出路，打没有好结果。因为当时有些干部由于受特务的蛊惑宣传，他们在思想上是比较混乱的。有的说，“可以打游击”，

“可以把队伍拉到西边去嘛！”我对他们说，绥远中部虽有大青山，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只是从山外补给，为游击队利用作游击活动之山区。现在与人民为敌，带着大部队进大青山活动行吗？我问鄂友三，你带着一个骑兵师，在大青山内，不靠山外的供应粮食物资，能呆得住吗？即使能把队伍拉到后套去，虽说是回到“老营”，能有吃的，又有西山嘴、乌不浪口两处可以作为防守的要隘，但在解放大军优势兵力的歼击下，也很难得到保全的，同时也是不堪一击的。更不能设想出后套去宁夏。应认清部队中的士兵，原来多数是从后套抓的壮丁。后套有个歌谣说：“三石糜子两丈布，老婆交给保队副。”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一旦打起仗来，纷纷回家去了，谁还肯再跟着国民党军队去打内战呢？势必各自走散。因此说，起义是民心所向的光明之路，有良心的人早该悔悟了。——从这些干部和我的谈话中，暴露出他们的内心活动：大多数人，在董主席的工作下，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但也有一部分人，在抉择两

^①周处：西晋，今江苏宜兴人，字子隐，少时横行乡里，父老们把他和蛟、虎合称为“三害”。后斩蛟射虎，发愤改过。

条道路的关键时刻，是有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到最后他们还是在傅先生的感召下，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至于地方人士，如教育厅厅长苏挺、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等，是坚决反对起义的。财政厅厅长张遐民也是反对起义的，在和潘秀仁一起跑了之后又跑回来，最后还是和张庆恩等一同逃离了绥远。这些人把持了绥远的国民党党部，利用蒋介石派驻绥远的军统和中统，网罗党羽，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抗战期间他们一直与绥远省军政当局唱对台戏，施展种种卑鄙手段，要官要权。

六、最后的时刻，徐永昌飞绥

九月中旬，蒋介石得知傅作义到绥远，遂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飞包头和傅见面，妄想阻止绥远起义，怂恿继续反动。傅对此则断然拒绝。徐永昌于九月十九日由包头回南京，临走前向别人说：“我是来说服傅宜生（傅作义的号）来啦，不但没有说服了他，反倒被他把我说服了。”在临上飞机时却对送他的人说：“三年后再见吧！”

在徐永昌离绥后，绥远起义的电报发出了。傅作义先生及在他领导下的董其武将军等起义的领导者，由于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决策，果断的行动与坚定的立场，终于促使绥远起义工作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这也证明绥远起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正义的行动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或阻挠的。

七、起义后的新绥远

起义通电发出后，很快地奉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指示：“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了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绥远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接着，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军区，相继成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的工作。不论城市、农村和牧区，到处呈现一派新的气象。

傅作义先生完成了所负的任务，他当时对干部讲了话，主要说到：“我过去把你们领错了道路，今天才把你们引导到光明道路上了。我也对得起大家，愿你们今后跟着中国共产党，各自努力前进吧！……”他的这次讲话使干部们都颇为感动。每一个起义干部也都感到是走上了一条新路、光明的前途。

新绥远当局，遵照毛主席指示，为贯彻党的革命传统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使干部有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造个人世界观，乃成立了学习团和政干校。我也和曹善初等参与了政干校的筹备工作。这是按照“对新绥远现职军政人员进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施行集训的。同时，为了贯彻党的起义政策，还成立了绥远省无职军政干部招待所。招待所设在归绥乌苏图召（我担任该所主任，周钧为副主任），负责收容在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省张家口、绥远省等处回来的人。凡是曾经跟随过傅作义先生作过事的无职军政干部都接收。同时在包头（由张进修负责）、五原（由李作栋、郁传义负责）、陕坝（由杨维垣负责）各处，也都设了招待所，收容当地的无职军政干部。

随着招待所的成立，在审查收容了约有六七百人时，傅先生曾到乌苏图召召集已收容的干部讲话，说明党的政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为人民服务，劝导备至（后来，绥远省军区司令部调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头军分区司令员，

周钧亦调任专员，招待所主任职务由王赞臣接替）。无职军政干部招待所前后共收容了两千余人，其中有部分不适于工作的，即遣回原籍；大部分送到学习团学习，俾接受党的教育、改造，以备录用。所有收容的干部，参加了学习团学习结业^的，不论安置工作与否，一律发给证明，以起义人员待遇，不咎既往。这是党的“给予出路”的政策的具体体现，也表明了党和毛主席对傅作义部属的关怀和照顾。当时，凡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以及被收容的人员，无不深感党的恩情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绥远之光

——纪念绥远起义三十周年

卫景林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在傅作义先生的影响和诱导下，在以董其武先生为领导的原国民党绥远省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绥远的起义成功，使绥远地区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变化。但在起义过程中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我曾参预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回忆往事，不胜感慨。

一、傅作义命我来绥， 帮助进行起义工作

董其武先生于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从绥远到北平与傅作义先生面谈后，就决心进行起义并着手起义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将近十二点钟，我接到了董先生的电话，说他明天就回绥远，让我跟他一起回去。当时我爱人刚刚生下小孩三天，一时难以脱身。我说：“我已接到王子襄（傅部人事处长王赞臣）的电话，说傅先生要我担任三十五军副军长、或十七师师长，并考虑是否随董主席回绥远帮做起义工作。依我看，

既然绥远也准备走北平的道路，我去不去用处不大”。董先生说：“正是要走起义道路，所以事情才更多，需要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定会有复杂的斗争。……这也是立功的机会”。董先生的话启发了我。第二天清早，董先生派车开到我家，路上我到东华医院匆匆告别了爱人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到东单临时机场上了飞机，随董主席回绥远。

当时的绥远，正如董主席所料，情况十分复杂。为了阻止绥远也走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国民党政府曾命令绥远部队西撤，与宁夏马鸿逵部靠拢，但未能得逞。他们曾先后派要员到绥，直接插手进行破坏和捣乱，并利用潜伏在军政各界的特务，勾结地方顽固势力，收罗从东北、华北逃窜到绥远的反动分子，以高官厚禄拉拢，诱骗了一些动摇分子，拼凑了反革命帮派，造谣惑众，破坏起义。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公然组织了反共反人民反对傅、董的示威游行，呼喊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砸毁报馆等等。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拦路杀害了党派去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士鑫。反动气焰嚣张一时。

为起义进行工作

二、在董其武领导下成立督训处，

针对这种情况，董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果断行动。具体指派我（此时我任第九兵团代理副司令官兼整编骑兵第五旅旅长）组织校级以上从北平回到绥远的干部三十多人，成立了督训处，由我担任处长，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了策动起义的工作。督训处的组成人员，一般都是跟随傅、董多年，对傅、董比较相信，而且在绥远部队中有较大影响，其中大部分人的家属都在解放了的北京，走起义的道路比较坚定。

董主席还向我明确布置了督训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宣传爱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宣传只有跟傅先生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讲清形势，认清形势，揭露敌人散布的谣言；帮助督训部队，整顿纪律，加强团结，牢牢掌握部队，从而达到所期望的完整的起义。

根据董主席的指示，我们利用督训人员与部队干部的各种关系，通过谈心劝导等方式，分头进行工作。当然，主要还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促使绝大部分人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到起义势在必行，从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独立第七师是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师长张世珍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首先进行访晤，交流意见，沟通认识。我们一致认为，只有跟着傅、董两先生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才是对的，也是绥远部队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同时形势逼人，犹豫不得。在谈论中，我们分析了国民党濒临崩溃瓦解，以及共产党即将获得成功的事实。如我在一九四七年去南京受训，曾亲眼看到国民党的一团糟，政治上腐败无能，派系之间，各立门户，尔虞我诈，互相排斥；经济上更是一塌糊涂，贪污腐化，金融紊乱，市场萧条；军队纪律废弛，士无斗志。当时贺浩若秘书长讲话说：军官总队有一千多将官（抗战胜利后受排挤被编余下来的），因为生活困难，并且反对派他们去打内战，集体到中山陵上“哭灵”。国防部刘斐次长讲话说：李仙洲在山东指挥几十万人，只四个钟头就全部被击溃缴枪啦。这真是军事上少有的奇闻。还有总参一个作战厅长（名字忘记）讲作战计划：我们今后通过三个会战，便可以解决全国的军事问题。第一是沂蒙山区，以五十万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利用东面临海的三角地带，把共军消灭在沂蒙山区。这一仗是有把握的。接下去就是华北地区，乘沂蒙山区胜利的余威，一鼓作气，也不

成问题。最后剩下东北地区，问题就不大啦。他们的设想到是不错，结果呢？第一仗就以惨败而告终，乘着这个“余威”，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一败到家。目前败局已定，这是任何人都扭转不了的。有些人仍然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这主要是认不清形势。……我们就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沟通串连，从而对起义的促进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持各种看法的人是会有的。开始有些人，对起义采取怀疑态度，考虑共产党将来对他们信不信，用不用，感到前途渺茫。有的人脱离职守，另谋生计。我去找一个当过多年团长的范××（同学），他说：“我看，军队这碗饭吃不成啦，我已经改行搞织布啦！”我说：“上级考虑到大家生活有困难，只要肯出来工作的干部，每人发给二十元，这不比你织布强吗？再说，只要能为起义做些工作，做些好事，将来一定会有出路。”也有极少数人，甚至某些高层人物，仇视起义，反对起义。我去找他们谈话，话不投机，拍桌子瞪眼睛，闹得不欢而散。如第九兵团骑兵旅长宝贵廷，我去找他谈。他说：“我姓宝的宁死不投降共产党，我准备把部队撤到西藏去。”我对他说：“你的部队本地人很多，家属也不少，恐怕到不了宁夏部队就散啦，不如留在绥远……。”他当时翻脸，说我拉他下水。后来听说，西撤不成，又把部队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撤，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俘虏，解放后送回我国，被政府正法。

三、针对特务的破坏、捣乱，进行分化瓦解

针对特务分子的破坏和捣乱，董先生指示我设法掌握特务的一些活动情况，并进行分化瓦解，以利起义。我通过关系，

讲明政策，策动一个姓贺的特务，交代了特务的活动情况，他还提供了一份特务的名单，有一百多人。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我根据董主席的指示，并以董的名义，对照名单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向各机关各部队，以及警备司令部等单位，分别下达了逮捕特务的命令。又考虑到各单位负责人，可能有的与名单上的特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者本人就在其中，可能会产生顾虑，发生障碍。我便亲自起稿，以董的名义，写了补充意见书，主要是对他们讲明道理，排除顾虑，说明集中起来，主要还是让他们进行学习，仍然可以立功赎罪，等等。由于行动迅速，特务当中，凡是具有职位的（也有的没有固定地位，四处流窜活动的），各单位大都将他们送来。在革新学院，单成一个队，进行学习。我让在三十五军当过多年团长的鲁乐山当队长，开始他顾虑很大，说：“我曾经当过县长，共产党最恨的就是象我这样的人。我能有好结果吗？”我根据董的说法对他讲：“你能跑到外国去吗？能跑到台湾去吗？”他说：“这都不可能。”我说：“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认清形势，如能做出些成绩来，立了功就一定会有出路。”他被我说服接受了任务。

这样一来，不仅我们控制了敌人一部分力量，而且使特务们，摸不清动向，互相猜疑起来，从而起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

在集中特务这项工作中，当然会有人对我怀恨。我有个老同学姜文华，原来是傅部的处长，出于关心他对我说：“有人跟我讲，卫石樵（卫景林的号）这样下去是要倒霉的……”。我回答说：“跟傅走，跟董走，这条路我认定啦。谁倒霉谁不倒霉，咱们走着瞧吧！”同时我也提高警惕，白天黑夜带着手枪，准备应付随时发生的意外。

为了破坏起义，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采取种种手段均未

得逞，最后竟断绝粮饷，停止一切补给，妄图把部队困倒、困散、困死。但所有这些都，并未把绥远部队广大官兵吓倒，反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认清了国民党政府虚伪凶残的本性。在这困难的情况下，董主席千方百计，除保证每个人的口粮供给外，各级干部，每人发生活费二十元，士兵每人发生活费二元，进一步稳定了人心。并且指示我，加强督训处的各项工作，整顿纪律，防止敌人乘机捣乱，维持现状，并抓紧进行起义工作。

四、傅作义先生回绥远促进起义

八月初的一天晚上，董主席把我叫到他屋里，高兴地轻声对我说：“接到北平通知，毛主席准备派傅先生亲自来绥，并且还给全体官兵带来了大量的慰问款，真是雪里送炭呵！”我听了十分高兴，连忙追问：“几时来？”董先生说：“很快，我们要马上做好迎接傅先生的准备，注意保密，保卫工作一定要跟上去。”次日董先生对我说：“我已经与北平联系，并征得傅先生同意，决定让你代表我，到旗下营车站（这是当时停战划界协议中的交界处，在古力板乌素村以东，由解放军驻守）迎接。见到傅先生向他汇报这里的情况，告诉他，绥远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跟他走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反对的人是极少数。你带史国玺那个营乘铁甲车去。史国玺这个营纪律性较强，又是你的老部下，各方面比较可靠”。停了一下，董先生又叮嘱说：“傅先生是咱们的老首长，又是毛主席派来的，这件事不同寻常，所以我才同傅先生商定派你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沉着，一定要对傅先生的安全负责……，我们在归绥车站迎候。”我说：“请您放心吧。”告辞董主席，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去找史国玺，传达了董的指示。我对他说：“傅先生这个时候

来，将对我们的起义，起很大的推动作用，说明起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保卫傅先生的安全，就是保卫起义。带你这个营是董主席点名，报请傅先生同意的，绝不能有半点马虎。队伍要马上准备好，队伍要挑选一下，不可靠的人不要让去”。史国玺回答说：“上级这么信得过我和我们这个营，老师长（我曾在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当过副师长），你就下命令吧！”史当时很激动，几乎掉下泪来。

次日清晨，我到达车站，队伍已经集合待命。我首先看了部队，然后上车检查，见过司机后，命令出发。又告史国玺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听从指挥，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乱动。”

一列挂有十几节车厢的装甲车高速向东驶去。车到白塔车站以东，接近旗下营的地方，发现远处铁轨上有障碍物，只得停车，果然有带铁丝网的木架拦住。这时发现铁路两旁有大量解放军（估计有一个团）进入阵地，架起了机关枪。我虽然感到突然，但也知道不能打，而且也打不起来。命令部队不许乱动，并与解放军进行交涉，说明我们的来意。停了一个多小时，解放军致意说：“对不起，刚才我们的电话坏了。没有接到铁甲车通过的通知，请原谅！”然后帮助清除了障碍，列车继续向东，很快就到旗下营车站。当时车站附近和站台上站满了解放军。我们的车刚一进站，解放军就过来热情欢迎我们，而且把事先准备好的开水和馒头送上我们的车厢（当时我们没有下车）。解放军战士，面带笑容，诚恳热情，毫无敌对之意，使我们很受感动。半小时后，一列崭新的装甲列车，从东方开来，车站又沸腾起来。我知道是傅先生来了，就下车向傅先生的车厢走去。傅先生的车厢很整洁，桌上还摆着鲜花。我向傅先生行军礼，傅先生见到我热情问好，但脸上带有询问之意。

我根据董主席指示精神，向傅先生报告：“您回来很好。绥远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走和平起义道路，团结到我们这方面的人，越来越多，顽固分子，只占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同情我们的人将受到鼓舞；特务和反对起义的分子，会更加孤立。董主席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看来他们不会轻举妄动。”这时傅先生点头微笑。我们很快就把傅先生乘坐的车厢和另一节装有慰问品的车厢，转挂在我们的列车上，调头往回开。车到白塔车站，我命令部队下车，列队整齐，然后请傅先生下车，我和史国玺陪同检阅了部队。傅先生向部队招手致意：“战友们辛苦了！”傅先生看到部队整齐精神，表现出对他的欢迎和尊敬，脸上露出笑容，十分欣慰，于是决定在归绥下车。傅先生平安到达了归绥，亲切慰问部队，亲自向战士颁发了慰问金，和董主席一起召集各族各界代表，开了会，讲了话。起义的时机完全成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通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宣布绥远起义。从此，绥远解放啦！

五、三十年后忆当年，矢为四化献余生

绥远起义后，督训处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我被派去担任了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军副军长，幸福地接到了毛主席亲自签名的任职令。其他起义人员也都得到妥善安排，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绥远起义三十年啦。在这三十年峥嵘岁月里，我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七军副军长的身份，光荣地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回国后，又随军部带两个师转业到建筑工程部，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

回顾三十年的历史，我深深体会到，我对祖国对人民所做

的事太少，而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却很多。喜看祖国当前的大好革命形势，展望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前途，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现在我虽然年过古稀，精力犹存，愿意和老同事、新同事一道，和全国人民一起，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于北京

参加绥远起义的前前后后

樊折桂

一

在华北形势十分紧张，北平解放前夕的某一天下午，傅作义先生派他的副官长温国梁到我家说：“总司令请你去中南海见他”，我当即驱车前往晋见。

到总部后，见傅先生面色苍白，精神颓丧，神色不安，不时长吁短叹。约十分钟后摒退左右人员，才开口对我说：“我想派你回绥远，帮助其武整顿整顿队伍。其武多次来电要你回去，最近又来电催促，你看看电报（从桌上手示电报）”。我看完电报，以低沉的口吻探询绥远怎么办，他毫不隐瞒地说：

“和北平一个样。”我说：“既然和北平一样，那我何必回去？”他说：“绥远不简单，需要做很多工作。这里情况你大概了解，回绥以后，向其武说明真相，并转告我在这里很好。至于交通问题，我派飞机送你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我搭乘傅的专机从北平东单临时小机场起飞。同机返绥的有总部副官处副处长王景泰和电台人员数人，并载有一些通讯器材及现金等。约一个多小时飞抵归绥（即今呼市）。因起飞前有电报通知，故到机场迎接的人较多，除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孟昭弟、呼市警备司令张潜等以外，还有不少政界人士

及地方士绅。

抵绥后，我下榻在旧绥远省政府东院大厅内一个侧室。在这里每日与董同饮共餐，接触频繁，日夜闲谈密议。我首先谈了当时北平的形势，并把傅作义当时在北平的具体处境和傅的意图向董作了汇报；同时董也谈了当时绥远的情况和困难处境。我们进一步广泛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彼此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除了向中共求和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至于绥远究竟怎么办，那就只好适应形势听从傅的安排。

来绥不久，我被派到一一一军担任参谋长。军长刘万春，过去不认识，听说思想比较顽固，人地两生，环境艰苦，思想上确实不想去。但又想，我是奉傅命奔董来的，董既安排我去，总是有用意的。“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勉为其难，匆匆报到就职。我虽在军内任职，但董先生经常把我找到指挥所闲谈密议，共谋绥远大计。

二

一一一军是南京给的一个新的番号，当时成立不久，编制人事均未就绪，工作繁忙，而我就职伊始，情况又不太熟悉，就更显得忙乱。就在这个时候（大约四九年三月间），有一天傍晚，董先生突然找我，要派我以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名义，到南京代表他去述职。听后我大为惊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的？难道变卦了？有什么新的变化了？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晚间，董留我在指挥所便餐，饭后密谈到凌晨。他说：“述职是幌子。抓住南京意图，借机要点东西，解决困难，待机应变。”这是董找我谈话的中心意思。

又说：“目前咱们处境十分困难，维持生活已成问题，走向和平还需等待时间。现在南京迭电催我去述职，显然是让我表明态度，阻止绥远走北平的道路。现又派来飞机接我，我再三考虑不能拒绝不去，傅先生同意让我去敷衍应付一下。但我反复考虑，我不便亲自前往。你的陆大同学在南京的较多，派你代表我去比较合适。表面上代我述职，请求在物资经济上接济我们。实际上是应付局面，拖延时间，等待机会，使我们对未来的变化有精神上的准备。”他又说：“估计南京不会那么痛快地答应我们的要求，同样，会以敷衍应付的态度对付我们。要尽力争取时间，快速解决，给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争执。如果拒绝接济，那也好，我们下一步行动就会更多地得到人们的同情与谅解，我们也心安理得。”董最后告诉我说，这件事请示过傅先生，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默许。董先生说完以后，我深感文章不好做，任务难以完成。因为形势的发展和绥远的动向，南京不会一无所闻。我在南京倒有几个熟识的陆大同学，可能给予协助，但他们也不会私自给解决问题，满足我们的要求。至于个人安危，可能担点风险，估计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于是我答应尽力而为，准备南下。

次日，乘“天雄号”专机飞南京。同机随行人员有：绥远省田粮处处长王映荣，察哈尔省孙兰峰的代表张庆恩和请假回籍探亲的归绥市电报局长张传德等人。携带了给孙科、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朱家骅、徐堪、邓文仪、薛笃弼等人的若干封介绍信，内容都是以反共拥蒋、保卫西北为借口，说明绥远当时困难处境，请示帮助解决困难。飞经大同上空，还为守备大同的于镇河旅空投了两箱国民党纸币，补给该旅军饷。约飞四个多小时安全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下机后，绥远驻南京办事处把我和王映荣接到南京交通宾馆住下，同张庆

恩、张传德分道扬镳。

当时南京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市面混乱，一切都不正常。国民党中央各机关正在向广州疏散，找人办事十分困难。第二天，徐永昌领我到国防部与总参谋长顾祝同会见。一进门只见室内暗淡无光，家具东倒西歪，满地纸屑，充分表现出蒋家王朝末日来临的凄凉景象。顾祝同面带愁容，勉强寒暄后，我报告了绥远情况和目前具体困难。顾详细询问了“敌情、防务、军心斗志，以及董先生的心情和意向，我作了或夸大、或掩饰的回答。他反复告诫我：局势即使严重，也必须坚定立场，确保西北。并说：“绥远、宁夏联合在一起，大有可为。绥、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大青山、贺兰山的有利地形，进可战退可守；国际形势必将变化，对我有利的机会一定会到来。至于军队补给问题，也不必顾虑，有中央负责。只要你们坚定反共立场，总是有办法的。”最后强调提出，火速电告董主席亲自来京商讨，解决问题。就这样空话应付，没解决实际问题。我以绝望的心情，离开了国防部。

随后，我向国民党总后勤部走去。该部总司令郭谦不在，由参谋长吕文贞代见。吕是我在陆大学习时的老师，对我很客气。但当我提出实际问题，要求解决时，则吞吞吐吐，也是一味敷衍应付，强调让董主席亲来解决。我看到希望不大，没有坚持，遂告别。临走时，该部副参谋长杨振兴（陆大同学）为我派了一部吉普车，提供了走访各处的便利。

在这一过程中，我还被邀参加过李宗仁代总统的一次宴会，由总参议主持，白崇禧参加。

经各方奔走呼号，沿门乞讨，总算多少要下点东西，但收获很有限，远远没有满足要求。形势越来越吃紧，南京已面临解放前夕，蒋家王朝眼看就要垮台了，徐永昌还想让我去奉化。

面谈蒋介石，我哪里还有心思前去。于是同绥远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杨慎五商议，乘火车转上海，以高价租用美国陈纳德飞机一架，载运讨来的那点军饷弹药飞返绥远。飞抵归绥上空时，因与地勤人员没联系上，于是转飞宁夏降落，然后由董先生派汽车接返归绥。

三

去南京时间不长，绥远变化很大。一一一军移防包头，部队调动频繁。南京方面为了阻止绥远和平解放，蓄意制造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企图架空董其武。平津解放后，返绥军政人员既多且杂，思想混乱，众说纷纭，谣言流传，形成严重的复杂局面。当时董其武驻在归绥，孙兰峰、刘万春驻在包头，各有各的想法，对局势与前途的看法有着严重的分歧。

刘万春为人圆滑多变，善于投机钻空，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说董其武是他的救命恩人，傅作义是他的老长官，都很尊重；实际上则是野心勃勃，同床异梦，在关键时刻很难能患难与共。他想利用时机，借水养鱼，积蓄力量，大干一场。他认为只要有实力，就有资本，何患没有奔头。为此，他背着董其武，在一一一军人事安排上，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并积极收罗旧部和拉拢地方势力。他擅自在军内成立了一个随营军政训练队，积极培养爪牙，扩充实力。他是一个回教徒，因饮食关系，在住所办公（包头马王庙街西公旗办事处院内），并利用请客吃饭机会，拉拢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流露他的真实思想。他说：“咱们要利用和谈拖延时间，随机应变，不得已时可以向宁夏靠拢。那个地方是塞外江南，资源丰富，有贺兰山天险，进

可攻，退可守。就是打了游击，南京也不会忘记我们。问题是我們有没有实力，有没有决心。”他对于孙兰峰先生，表面上也很尊重，⁶但他很清楚当时孙没有什么实力，在傅的部属中也没有多大号召力，所以实际上对孙也看不在眼里。

当时，傅、董在绥远有点战斗力的部队，只有张世珍、赵晓峰两个师和鄂友三、安恩达两个旅。这些部队都是听从董其武指挥的。至于地方部队象乔汉魁、高理亭等，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力量，对孙、刘也不是一致拥戴的。在内部矛盾重重、认识不一、互不信任的情况下，绥远能否顺利地走向和平解放的道路，人们均甚忧虑。

当时解放军大举渡江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土崩瓦解，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支持傅作义先生亲自来绥，促进和平起义。

起义前夕，傅乘专车由平来绥。鉴于绥远的实际情况，在归绥仅住一宿，即赴包头，暂住包头以东的美岱召站何家圪圙。傅先生为摸清人们的思想情况，开始以试探方式进行个别谈话。我也被召见了。见面时先问我军队情况，社会舆论情况，以及对形势的看法。我如实地作了反映和汇报。最后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总司令总揽全局，看得远，想得周到。总司令看该怎么办好，我们听总司令的。”但他始终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临别一再吩咐我要好好掌握部队，认清局势，多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为深入了解情况，他由美岱召转移包头，住在南门外皮革厂内，继续召见旧属，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全国解放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残余势力不甘心覆灭，陆续飞来大员徐永昌、王叔铭和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人，⁷进行离间分化，威胁利诱，妄图劝说傅作义放弃初衷，阻止绥远起义。然而大势所趋，促进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未变，几个苍蝇碰

壁而去，阴谋终未得逞。

起义酝酿成熟，绝大多数人没有问题。孙兰峰先生开始有些思想不通，经傅先生耐心说服仍不能愉快接受，临到签字还犹豫不决。在最后时刻，傅诚恳地告诫他要正视现实，很严肃地对他说：“立场转变不能勉强，我不强加于人。你我多年患难相处，好离好散。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谁愿意跟你去，你把谁带去。今后你我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子。”孙先生最后深明大义，慎重考虑了自己的前途，接受了傅先生的忠告，愿走起义的光明大道，局面豁然开朗，人人握手言欢，喜形于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通过了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起义电文。这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的绥远起义。

起义电文签字后的当晚，在包头平市官钱局热烈举行了庆祝起义的宴会，并在省银行包头分行举行了由傅作义主持、邓宝珊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傅、邓谆谆勉励，今后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改造，努力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

起义后不久，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派来大批工作干部，帮助我们尽速实现解放区化和解放军化。起义部队扩编为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每军辖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包括军师直属部队，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十三兵团指挥。所有干部都按照党的政策及个人能力、表现，作了适当安置。尽管按照既往不咎的起义政策，对各级干部作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但还有那么几个顽固分子贼心不死。他们造谣惑众，破坏整训，污蔑觉悟较早和靠近组织的同志是“水萝卜外面红、里面黑”；是出卖团体（指原傅作义集团）的奸细；在部

队集体参加包头中滩打坝劳动过程中，暗中挑拨战士不满情绪，甚至指使暗杀党的政工干部，煽动哗变。

起义部队在绥远整训受到种种阻难。以后移驻河北老解放区继续整训，使部队逐渐走向正轨。在移防过程中，这一小撮坏人继续进行破坏，煽动战士开小差，阴谋搞集体哗变，妄图瓦解部队。但是“泥鳅掀不起大浪”，这一小撮坏蛋，终于在部队民主运动中被揭露出来。他们妄想倒转历史车轮，却被历史车轮轧得粉碎，没有逃脱覆灭的下场。

起义部队经过整训，经过伟大的民主运动，两次补充，逐渐走向解放军化。一九五一年全军响应党的号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也随军参战，在战争中受到了一次实际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锻炼。

以上仅就个人回忆，草草写出，如有欠妥或错误之处，请知情同志予以改正补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冲破重重险阻 踏上革命征途

——忆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

安思达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我参加了绥远和平起义，回忆所走过的道路，感到欣慰、兴奋和自豪。我过去所带的旧部队，经过改编、学习，成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我受祖国人民的委托，率与原旅合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〇九师赴朝作战，我任副师长。祖国人民称赞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五五年，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部队集体转业，我先后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二工程局副局长、公司经理等职务。我们参加了在荒原草地上，建设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包头新区的伟大工程。

回想我的一生，今天所以能够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一点贡献，就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参加了“九·一九”光荣起义。

一、和平起义的签字

我是军人出身。在“九·一九”和平起义以前，曾先后任过国民党部队骑兵第六师少将副师长、十二战区骑兵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骑兵第五旅少将旅长。原由傅作义先生直接指挥，后因驻防绥南凉城一带，由董其武先生指挥。我参加签名

起义时，驻防包头麻池一带，归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先生指挥。

在旧社会，自己觉悟很低，不大懂政治。但是，历史事实就是很好的政治教员。有精良武器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越打越弱，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部队却越打越强。国民党兵既多，枪弹又足，为什么打不过解放军呢？我当时想，这可能就是古语所说：“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何去何从，已经摆在面前。一九四九年元月，傅先生与共产党代表谈判，和平解放了北平。四月间，董其武先生传达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讲话，为我们指出了光明前途。我和大家一样，认为大势所趋，只能走和平起义这一条光明大道。但是，许多人心里还是想：共产党要不要我们这些反动军官？起义后怎么安排？共产党的政策能不能兑现呢？由于对党的政策不摸底，还是顾虑重重。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已到旗下营，接近呼和浩特。九月初，傅作义先生关心驻绥远部队的起义，就亲自来绥，经归绥到美岱召车站下车，住在天主教堂，召见了步骑兵少将师旅长以上的将领。然后就来包头住在皮革厂小楼上，分别召见了少将以上带队的师旅长。我去晋见时，傅先生同我谈了国民党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种种情况，指出共产党是人心所向，所以才和平解放北平。让我考虑何去何从，写份自己的心愿交来。我当即表示同意起义。回去后我写了材料，大意说，共产党、毛主席，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服务。共产党得人心，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我决心参加起义，并拥护北平的和平解放。在傅作义来包前后，我在骑兵旅也先后分别召见各团长、

连长，同他们谈形势，谈出路。大家一致认为，大势所趋，只有起义，别无他路。这时，我已经完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傅作义先生在包头十余天，个别召见谈话，十分辛苦。当时，虽然多数将领同意起义，仍然有人对起义后安排不摸底，有顾虑。起初，孙兰峰先生就因对党的起义政策还没有想通，表示不签字。张副元师长等人和我都对他进行过劝导，但他不听。最后傅先生对他进行了严肃而忠恳的谈话，孙兰峰先生才同意签字。为此事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

正准备于九月十七日上午，签名通电起义之际，突然收到国民党中央电报，说十七日上午，徐永昌（该人曾任军令部部长）乘飞机来包头。当天，由董其武先生召集我们一齐去飞机场迎接。徐在包头住了一天两夜。他拿蒋介石手谕来说服傅作义先生去广州，而傅作义先生则留他投共产党。谈的结果是，傅不去，徐也不留。十九日早，有几个长期住绥远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也跟徐乘飞机回了广州。

傅先生、董先生率领我们到机场送走徐永昌后，便于当天（十九日）上午，在包头银行正式签名通电起义，声明拥护共产党，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从此我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走上了光明的革命大道，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解除顾虑，一心革命

历史事实证明，光是签字起义，并不能立即把旧部队变为人民的军队。旧部队成份复杂，思想混乱，都要求有一段改造的过程。在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政策。起义后不久，便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刘万春军改编为三十六军，刘仍任军长。张世珍师扩编为三十七军，张充任军长。我带的骑兵

五旅編为三十七军骑兵旅。十二月底，我骑兵旅调去三十七军驻地，在五原西邬家地一带驻扎。

签字起义加入了革命队伍之后，许多思想顾虑并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怕算旧账。我们思想彻底转变是在绥远军区军政学习团期间解决的。一九五〇年元月二日，军区电令调师、旅长和军长去军区学习。我于元月三日去军区，二月八日结业，共学习一个多月。在这期间，不仅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党的政策，体会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最使我难忘的是，绥远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副政委高克林和军区副司令员姚喆两位首长的召见和个别谈话。我把我在旧军队二十多年的历史 and 危害人民的罪恶，罄其所有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两位首长听完后笑着对我说：“老安同志，那是社会问题，那个社会你们谁也做不出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党的政策是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你参加起义就是参加革命了，只要今后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好工作就好了。”我听到两位首长说出既往不咎，我高兴至极，立刻放下了心，解除了一切顾虑。虽然思想改造是长期任务，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便下定了决心，改造思想，跟共产党走，加倍努力工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学习结业时，高克林副政委作报告，要求起义部队加强学习，搞好团结，加速部队解放军化。并明确提出五〇年三大任务：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大搞生产。

但是，和平起义并不是绝对的和平，既有和平的改造，也有流血的斗争。

三、平息庞茂卿叛变

二月十日我们离开军区，张世珍军长和我们陪同七十多名政工人员返回五原。其中有三十七军师政委，政治部主任张逊之，一〇九师政委曾威，师政治部主任白涛等人，二月十二日晚八点，我们到达五原。一〇九师在饭馆准备欢迎宴会。我在另一房间正吃饭时，张军长派警卫员找我去军部。军长告诉我，一一一师副师长庞茂卿率领一个团离开驻地叛变了，现正盘踞在同义隆，让我调两个团在拂晓前将其包围，步兵随后出发。我当即叫通我旅电话，告知景副旅长，命令九团张团长于夜间十二点至一点，率领该团到十团驻地待命。命令十团曹团长也于同时准备全团出发。同时通知警卫连整装待命。打完电话，张军长派汽车送我回旅。我把一个月的学习情况和首长讲话向景、谷二位副旅长和崔参谋长等同志作了传达。同志们听到既往不咎的政策时，都很高兴。

约夜间十二点，我带警卫连奔十团驻地（离旅部十余里），于十三日早一点，率九、十两团向正北同义隆进发（距离四、五十里）。九团为前卫，我在九团后尾，十团在后。行进了一个小时，在乌家河南，九团尖兵连遭到叛军重机枪连扫射阻击。我九团立即将其包围，下马徒步，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即将该连全部缴械。紧接着我又率部过河，行至河中间，该叛团的一名副团长来见我。他向我报告说，他们全团都不愿意叛逃，是庞茂卿副师长命令拉出来的。到同义隆后，重机枪连也是庞茂卿副师长派到乌家河南的。听到河南面一阵激烈枪声，知道是来的队伍围剿，该团的孙得胜排长用枪将庞击毙。现在全团正向原驻地狼山县返回，要求别再过河围剿。我答应，如

果情况属实，可以不再过河。我遂派九团一个排，随该副团长去同义隆一带搜索调查，证实该团确实向原驻防地行军。当即命令九团，将被缴械的全部人马武器交该副团长带回。这时天还未亮，步兵尚未出动。十几个小时的紧急行动，叛变团问题顺利解决。早九点，将详情电报军首长。我九、十两团休息后，各回原地。

四、整编部队，建立政治机构

部队整编，经请示军部，张军长说，他没有带过骑兵。他知道我带的骑兵很复杂，拨出、调入和新收编等情况很多，让我自己考虑，编制完了报军部即可。我召集副旅长、参谋长开会研究，提出的初步安排是：原第九团和张凌云团合并为第一团，张子太仍任团长，赵福顺、张凌云二人任副团长；第十团和十一团为第二团，曹辅臣仍任团长，孔庆升、张风楼、褚云龙三人任副团长；调进来的原保安旅编为第三团，邬青云任副旅长兼第三团团团长，施玉静、郑利丰二人任副团长。会上景副旅长、谷副旅长、崔参谋长均表同意。然后又召开各团长和副团长会议，经讨论决定，每团下辖四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旅直编制有警卫、通讯、机炮三个连。编余无马的五百人，交军部编为警卫营。全旅共四千多人，于三月底将名册呈报军部。

五〇年三月底四月初，由军政治部张逊之主任派来政治工作干部苗德茂科长（山东人）。不久，绥远省军区派来廖鼎琳为旅政委和五十多名政工干部，分别担任团政委、团政治部主任、连教导员等职务，在全旅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派政工干部来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是改造部队的重要组织措施。但是在廖政委来旅以前，我们就听说，进驻张朴步兵师的政工人员，因

有敌特破坏捣乱，政工干部站不住脚，又离开部队的消息。我感到自己的责任很重。在召开连长以上干部和旅部机关、旅直全体人员的会上，我强调指出：政治机构的建立是把我们部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措施。全旅官兵，上至旅首长，包括我在内，下至每个士兵，都要听从政治工作干部的教导。并严肃提出要求：保证政工干部的安全。随后又召开团长会议指出，无论哪个团政工人员出了问题，就要哪个团的团长负完全责任。不久，我们又听说，鄂友三骑兵团叛变了一个团，打死彭政委及其他政工人员的事件。还听说，王崇仁步兵师叛逃了一个营的事情。我又召开各团长会议，要求各团坚决保证政治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考验我们旅是否接受改造，能否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大问题。由于我们不断进行教育，不断提出要求，我们旅始终没有出问题。

傅作义先生兼任绥远军区司令员，曾于五〇年二月初来内蒙看我们。五〇年五月底，又来一次。他还到我们旅驻地看望战士，讲了话，要求部队守纪律，努力学习，加速解放军化。所以说，傅先生对绥远部队是很关心的。

五、解决卢万惠团叛变

约在五〇年四月底、五月初，原西公旗郝游龙部卢万惠团四百多骑兵，在西滩驻地（距包头二百多里，离西山嘴很近），夜间叛变，天亮后开进安北县，打死县长和公安局长（均系革命老干部），抢去武器和马匹，往西逃窜。路上，又打死几名老百姓。绥远军区命令各部队立即出动围剿，但该卢万惠叛团成员多系当地土匪，地理非常熟悉，此剿彼窜，未能剿除。

约五月中旬前后，军首长找到我部，告诉我卢万惠叛变

因现正盘踞在同义隆大山北面一带大山里，命令我带队以剿抚兼施的办法解决该团。如能歼灭更好，招抚进来再解决也好。

我接受命令回旅，第二天就抽调旅直属连四百多骑兵，开进到同义隆，住在一个马车店内。将马撒出放青，就近侦察地形。该地地形确实险要，如果出击，仰山而攻，他们的哨兵在山巅即可瞭见，不仅不能剿捕，恐怕连人也见不到。因此，我首先采取写信劝降的办法。我亲笔给卢万惠写信，说明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们拉出去有什么好处呢？我劝你们回来，我负责收编你们，请考虑答复。我雇老乡走羊肠小道把信送去，两天后带回卢万惠一封信。卢很狡猾，他首先驳我写的信，然后又说：你如欺骗我，我唯有拼命以待。在此期间，我找到了原郝游龙部下骑兵团的沙团长。这人是蒙族，很诚实，驻在同义隆西二十多里。我把沙团长请来以酒肉相待，向其说明卢万惠叛逃是自取灭亡，决无好结果。我请他给卢万惠写封信，劝卢别走绝路。沙团长很同意这样做，于是我写了第二封信，并说明如果同意，回信时写明会面地点，以便详谈。我和沙团长各派一名参谋和副官前去，雇老乡带路去见卢万惠。也是两天后，卢万惠回信，同意在沙团长驻地西一个小村见面，该村距同义隆三十来里。

第二天早七点，我带一个警卫员前往沙团长驻地，临走着副官沽酒买羊，准备饭菜。见到沙团长后，便一同乘马前往卢万惠指定的小村。走出不远，就看见北边漫山坡人马成群，一看便知是卢团的人。进该村后，沙团长将我介绍给卢万惠团长和田振英副团长，还有王参谋长，常连长等四位连长。我们一起进入一家住户，我向他们讲了全国都快解放的形势，并把信上说的话又重新向他们讲说一遍。卢万惠等均无异议，只提问怎样收编。我说明可以保存他们的骑兵团，并邀请他们和沙团长

到同义隆我驻地吃喝一顿（他们见我只带一个警卫员，心里可能有些宽慰）。沙团长首先说：“好！咱们就走吧！”我又催他们把队伍安置一下好走。这时卢才下令队伍分别就地暂驻。

我带他们一起到同义隆，边吃，边喝，边谈。会谈结果，他们一致同意由我收编，但提出要求在同义隆一带驻扎。我当即答应电报军部请示驻地，候回电指示再作决定。一小时后即接到回电：“同意收编卢团，驻地指定在军部西南、旅部东南的××村（村名忘），并令即日开驻该村。我说收编问题既无异议，你们明天就开到指定驻地去。卢团满口答应，明天一定全团开到。第二天，确实执行了命令。为了安抚卢万惠团不起疑心，我曾亲去驻地看望和讲话，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不准骚扰人民，粮秣一定要由兵站拨取。还让卢团接任灯笼村（鄂家地至五原中间的一个小店）的骑哨。我还派王泽甫少校和郭贯一上尉常驻该团，明则协助工作，暗中监视该团的行动。

收编卢万惠团两个来月，他们并未改邪归正。他们在驻地窝藏地主、特务、土匪。经常有三分之一的骑兵不在驻地，四出活动，不知干些什么。七月九日军部叫我去开会，张军长、帅政委和冯、卫两位副军长，同我谈卢万惠团的问题，传达军区命令：一定要解决卢万惠团。军首长笑着说：“还得老安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汇报了卢团的问题，完全拥护解决该团，但我主张由我把卢团带来，然后由步兵解决。军首长还是决定由我解决。于是我提出三条意见：1.由于卢团人马零散四出很多，必须缓十来天再办，并建议七月十九日行动，以便调回外出人马，一网打尽；2.卢万惠是个官迷，为了稳住卢团，由军部下个编制表，将该团编为军直属骑兵团（每团下设三个连，每连一百多，加上团部，正合他现有四百多人），以便调回外出人马，再以清点检查武器为名，全部缴械；3.卢团的陈

永胜连被谷耀武带走剿匪，应由军部给谷副旅长去电报就地解除武装，全连押送回旅。最后，要求严格保密，以免走露消息。军首长完全同意我的打算，除由军司令部电令谷耀武副旅长解决陈永胜连外，我回旅时就带上了将卢团编为直属骑兵团的编制表。

当天下午我回旅部，立即要参谋处给二团、卢团、旅直下通知，于七月十日上午召开团长紧急会议。会上，我首先传达了军部转发军区检查武器的文件，决定七月十九日上午六点集合检查枪支，随后将改编卢团的编制表交卢万惠，要求他在十九日前，一定把外出的官兵连同枪支、马匹，如数找回来。卢万惠很高兴地答应照办。

解决卢万惠叛变团的计划，我除秘密告知廖政委外，其他人包括副旅长、参谋长均一概不知。十八日晚我很早就休息了，可是心中有事放不下心，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反复思考着明天解决卢团的计划。大约在晚十一时许，听到大门外汽车声音，刘副官报告说，由军部来了一汽车步兵（这件事，军部没有事先通知）。我一听马上告诉刘副官，把汽车和步兵送到村东头路南大店里。军部的汽车在路过灯笼村时，被卢团骑哨发现，报告了卢万惠，使卢万惠产生了疑心。卢把我派驻该团的王泽甫、郭贯一找去，一再追问，旅里有什么事，为什么有一连步兵往邹家地去了？王、郭二同志说：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什么事也没有。王、郭二同志确实不知道，他们也惊慌了一夜。

十九日早五时我已起床，派警卫员把景副旅长、崔参谋长、李参谋、刘副官找来。这时我才告诉他们，今天集合队伍，检验枪支是为了解决卢万惠团缴械下马。由于事先没有告诉他们，景副旅长、崔参谋长都有些不高兴。我即向他们讲说卢

万惠团叛变时，打死安北县长和公安局长等罪行，指出这是军区命令，任何人不能违背，不准打一点折扣，同志们必须干脆、彻底地保证完成任务。这时他们才表示同意，并开始具体布置：首先，验枪时的队形排列是：直属连在排头，紧接是二团，卢团在排尾。队形站好后，架枪听候检验。先派卢团出警戒，检验完警卫连由警卫连换回。这一切指定李参谋负责。再令刘副官转告军部派来的带队官，保证全队在大店院内隐蔽，不准外出。又嘱咐我的警卫人员，在缴卢团枪械时，防止叛兵动枪。我自己身上的手枪也上了顶门火。我又把廖政委请来，告诉他卢团大部分是土匪，缴械时，让他带着政工人员站在西边，万一开枪就到墙外去。布置方完，各团和直属连已陆续到达集合场地。我正要去现场，卢团的田振英副团长来找我，说他的手枪未带来，要借支手枪，我答应他，检查时说一声就可以了。实际上，田振英是来观察动向的。

军部派来的管军械的同志和旅后勤部军械科二、三十人开始检验枪械，先检查直属连，再检查二团，他们检查很认真。最后检查人员到卢团的枪架前，每人抱起十余支枪便把枪拿走了。这时，卢团官兵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我站在队列前高声大喊：“坐下，坐下，我有话讲。”我说军部有信，等会儿给大家念。我首先说：“你们是我亲自收编，经三十七军批准的。可是，你们进来只两个多月，远近人民群众舆论纷纷。群众说卢万惠团的驻地是第二个台湾，窝藏大地主、土匪、特务，许多人乘马带枪，无处不去，甚至十天八天不归队，不知去干啥。所以，军首长命令我将你们团的枪械暂时收缴起来，马匹集中起来，均暂代保管。你们团、连以上的官员集中到军司令部军训队学习，排长以下官兵集中旅司令部集训队训练。计划时间三个月，三个月后官复原职，枪马归还。希望你们要好好

学习，改邪归正。”最后，我念了军首长的信。卢万惠团全体官兵坐地低头听我讲话，哑口无声。随后，将卢团全体送西边学校大院内，中午派人送饭。

我为了稳定连以上官员的情绪，派警卫员给他们送去当时纸币五十万元，让他们买烟抽（这是同廖政委商量，让我看着办的）。这时，我估计他们身上还会有枪。下午三点后，我让警卫员先去向卢说一声，我要去看他们。卢万惠等人说：旅长给我们送钱买烟，还要来看我们，让警卫员代为致谢。等我去时，警卫人员怕不安全，想多去些警卫员。我说：“不行”，只能去一人！过一会儿可以再去人看看。”等我与卢万惠等人见面时，他们都站了起来，笑着向我致谢。我说：“没啥，你们在学习期间，有困难时给我来信，我一定接济你们。”然后，我就问他们谁的身上还有手枪，可留下我给保存，不然带着有些不便。我说完后，他们共交出手枪四支，撸子两支。这时我才放下了心。晚上，用汽车将卢万惠、田振英、王参谋长和三个连长共六人送往军部，到了军部立即给他们上了手铐、脚镣。七月二十日用专车转送绥远军区。三个月后，此六人全部枪决。排长以下官兵经旅培训三个月后，分别编入各团。

卢团缴械后，我们又搜查了卢团驻地，查出了卢团隐藏的晏江县大地主和几支长枪。

六、敌特破坏与反特斗争

肃清隐藏特务是改造部队的重要内容。我骑兵旅成员，有我原来的队伍，有调入的队伍，有收编的游杂骑兵。其中不仅有土匪、特务，也有地主、富农分子。

我旅第一团副团长张凌云，是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我反复

动员他去军区学习，但他不去，后经报告军长找他谈话，苦口婆心地动员，才于五〇年四月送到军区学习。随后，又在张凌云带的队伍中查出一个陕北军统特务主任陈××（名字忘记），送了军部。我又将张凌云的三名亲信送军部教导队学习（审查）。这三人经学习后，重新安排了工作。查出一些特务以后，部队确实有些稳定。但是，隐藏多年的特务谷耀武的破坏活动，却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

五〇年元月，我在军区学习期间，董其武先生派谷耀武来我骑兵旅担任副旅长。五月底，军部命令谷耀武带一、三两团，配合一〇九师出发剿匪。谷耀武副旅长向我提出，要带刚收编的卢万惠团和陈永胜骑兵连跟他去。我的意见是：“这些部队刚被收编进来，还是以不带他们为好。”谷耀武强调陈永胜连长熟悉当地情况，对剿匪有利，一再要求要带。我当时认为，谷耀武是董其武派来的，可能没有问题，便答应陈永胜连四十多人随谷去剿匪。但我又想到，无线电台台长曾和我说：谷耀武经常在夜间到电台去听敌台。因此，我又派高参谋也随谷去剿匪，暗中监视谷的行动。

七月十九日在我解决卢团时，军部发电报给谷耀武，要谷立即解除陈永胜连的全体武器，并派队伍把全连武器人马一并押送回旅。谷耀武违抗军令，首先让陈永胜连长带一名警卫员潜逃，然后将已缴械的四十多人，连同马和武器，只派两名干部往旅部押送，有意识地放走他们。

被缴械的四十多人，行至天桥梁（在临河和郭家地中间）便很顺利地抢去武器和马匹逃跑了。负责押送的两名干部徒步回到旅部。我气愤之极，责问这两人，怎么敢于接受押送四十多人的任务？他俩说谷副旅长讲没有问题。我一气之下将他俩关了禁闭。立即命令二团派一个连奔同义隆一带寻踪追击。他

们跟踪到同义隆东北山上，相距二、三里处，叛兵开了枪，击伤我战士二人后，逃过北山去了。杨教导员打电话请示是否还要追剿，我以该叛兵均是当地土匪，地形熟悉，又越过山北，就命令回防，停止追击。

陈永胜带了警卫员逃走後，不仅自己上山为匪，而且还乘别人不知道他们连已被缴械的情况，跑到三团二连拐走刘德胜一个排去当了土匪。九月，被拐走的排长刘德胜，因剿匪部队增多，形势紧张，又带全排回团来。郭青云团长亲自将他送到旅部，并建议收下就算了。我当着廖政委的面指出，刘德胜叛变为匪两个多月，肯定干了些坏事。当令警卫员给刘德胜上了手铐、脚镣，押送军部法办。

这几件事的发生，使我加深了对谷耀武的怀疑。八月初，我接到高参谋来信汇报，发现谷有通匪事情。每逢指挥部队到某地剿匪时，谷都找老乡给土匪送信，致使剿匪各部队都扑了空。这样剿匪两个多月，一无所获。为此，我亲向军首长汇报情况，要求将谷耀武调回旅部。在此期间，陕坝军分区副政委张文卿同志曾来，告诉我关于谷耀武通匪的情况，与高参谋来信相同。于是我据实汇报上级，听候裁夺。

几天后，军部下命令让谷耀武带一、三团回旅，到驻地後，卫副军长通知谷耀武去军部。谷到了军部就被扣捕，当天用汽车转送绥远军区依法处理。这个隐藏的军统特务，由于发觉较晚，给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後，军区召开各师旅长以上干部会，省主席董其武在总结工作时，讲了这个教训。董主席说：“我办了一个大错事，给安恩达旅派去的副旅长是个特务，给安恩达旅造成了损失。”

谷耀武的破坏活动，使我进一步提高了警惕。我旅第二团团团长曹辅臣（原名曹凯）原系察北一带大土匪头子，后来当保

安大队长。五〇年夏季在邬家地南挖大渠时，分给张朴师的挖渠任务也在这里，为此张朴不断来看他的部队和检查进度。张朴每次路过邬家地我的驻地时，他一次也没有见我，但是他却经常去找曹辅臣，勾勾搭搭。五〇年七月底八月初，我把曹列入去军区学习班的名单，命该团政工干部动员他去学习，曹辅臣推推托托不想去。二团政治部主任宋玉文汇报了曹不想去学习的情况，并建议我亲自去动员。于是我去二团，问曹：“要你去学习，为啥还不走？”“你的副团长都学习回来了，你不去学习，团长怎么当？”我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他有病，我说有病去绥远省看病有医院更方便，他又说经济有困难。我立即问他需要多少？他提出要二百万元（折合新币贰百元）。我马上给他写了条子叫后勤部给他二百万元。这时他无话可说，拿了钱将他送走了。曹这一去就没回来。民主运动时，揭发出他的罪恶很多，又和反革命张朴有联系，经军法处查证后处以死刑。

七、改造部队的小结

五〇年十月中旬前后，绥远军区召开会议，总结一年来部队的改造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军、师、旅长和政委。军区首长指出，一九五〇年整编部队、剿匪肃特、大搞生产三大任务基本完成，作了不少工作，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

政委们在开完政治会议后就返回部队了。我们军、师、旅长们继续深入讨论，各自检讨工作，揭发问题。例如：鄂友三骑兵旅叛变一个团，同时打死彭政委和政工干部好几人；王崇仁步兵师叛变一个营；其他各部队零星逃跑的也不少；有些部队思想情绪还很混乱，等等。会议期间，军区军法处将卢万惠、田振英等六人的名单和罪状发给大家，已判处死刑准备执

行，征求大家意见。小组讨论时，各组表面上都说应该枪毙，没有一人反对，但实际上是有人不满的。鄂友三旅长见到我就说风凉话：“老安，现在你唱一二么了！”（吃香，出风头的意思）。我生气地回答说：“狗屁！咱们都是一样的旧军人。”他再没说啥。

会议开到十一月中旬，军区首长说，华北军区命令，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一齐去北京参加另一个会议。由高副政委带领我们乘火车到华北军区报到，住北京西单北路东的一个饭店。

第二天，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华北局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两位首长在军区召见我们。首先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作了详细指示。要求我们加强思想工作，要用新旧部队作对比的方法引导部队官兵提高认识。并指出部队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只要想着人民群众，做到为人民服务，部队是一定能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薄政委还讲了他在阎锡山新军做工作拉出几十个团来的例子。他还笑着说：“傅作义将军和我们对抗正高潮时，他的大女儿傅冬被我们拉过来了，早就成了我们的同志。”这时，我看了看傅先生，他微低着头，边听边笑。

其次，两位首长又说，美帝国主义派海陆空军帮助南朝鲜侵略北朝鲜。北朝鲜是我们友好的邻邦，与我们唇齿相依，存亡与共。为此，我国已出兵抗美援朝，不久，还要派你们部队出国抗美援朝，希望你们讨论一下，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打法，提出些战略方针和意见（我回忆大致是这样指示的）。

接着，我们讨论了十来天，议论纷纷，其说不一。有的说正面反击，有的说迂回包围，还有的说划几道抵抗线。我记得鄂友三就荒谬地提出，要在鸭绿江划道抵抗线，还要在山海关划道抵抗线。这时，我们好几个人就说：“那不是把东北给人

家了吗？”当时不仅意见不一致，而且有的人对党对人民还是三心二意，不是一条心。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

一天晚上，华北军区在东交民巷原日本领事馆招待我们宴会，宴会后又去华北军区礼堂看文艺节目。在看文艺节目期间，华北军区一个一个地将刘万春（三十六军军长）、鄂友三（骑兵旅长）、张朴（步兵师长）三人叫出扣捕了。随后由高副政委带我们乘车到东四傅作义先生家。高副政委向我们说明，扣捕刘万春等是因为他派了一个营长偷着去香港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蒋介石给刘万春等人的委任状。高副政委说明后，征求我们对扣捕刘、鄂、张三人的意见和看法。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也是签名起义的，还这么干！这是死路一条，自取灭亡，应当扣捕，依法惩办。”我记得傅先生还说了句笑话，他指着董先生说：“其武，你的主席有人接了。”大家都笑着散了会。

八、周总理亲切接见

大约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副政委通知说，周总理将要接见我们。第二天早八点集合，高副政委、傅先生、董先生带领我们去国务院总理会客厅，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也来了。不一会儿，周总理来了。大家都站了起来。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问我们都是山西人吧（绥远部队许多人是山西的）？董先生忙着说，我们安旅长是东北人。总理坐下后说，你们开会很辛苦吧！我们都说不辛苦。总理又和傅先生、高副政委、董先生说了几句话。然后，大家一同进入饭厅，分坐两桌，开始宴会。我和唐延杰参谋长，华北局罗秘书共十位同志坐一桌。敬爱的周总理站起来举杯劝酒，我们

高兴地干杯。我们这桌的同志提出让我代表全桌去给周总理敬酒，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总理忙举起杯，和我碰杯，一饮而尽。二十几年来，我每每回想起给周总理敬酒，和周总理碰杯的情景，心情无比激动！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感到浑身是力量！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不仅是人民给我的光荣，而且是党和人民对我们起义部队的信任。

宴会后，在会客厅，总理当面向我们发布了出国抗美援朝的命令。决定将绥远省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任兵团政委。兵团下辖三十六军、三十七军两个军。要求在五一年元月前后，从绥远省开赴河北省隆华镇一带，补充整顿后，准备出国。

一九五一年元月二、三日，我们离京回到绥远。董主席、高副政委面示，要遵照周总理命令，立即做好开拔的动员工作，我们都分头回到了原防地。

一九七九年七月于包头

对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 情况的一些回忆

潘瑞征

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后，董其武听到广播即飞来北平。傅作义同董面谈了北平和谈情况和不能再打下去、要走向和平的道理，应于回绥后逐步进行工作，请董考虑。董对傅一向是很尊重和服从的，回绥后基本上也是按这一方向逐步进行的。曾把悬挂在大街上蒋介石的像扯去，换挂孙中山的像。当傅与邓宝珊同南方先来的一个和谈代表团由北平到石家庄谒见毛主席，谈及绥远可以等待起义，傅对策动解放绥远就更积极了，曾先后与中共华北局的负责同志薄一波、张友渔、平杰三及绥蒙区方面李井泉、潘纪文等有过商谈。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曾代理原察哈尔省主席），由张家口突围败退到绥远后驻在包头。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与孙系山东滕县小同乡，当时对孙拉拢得很紧，致孙与董难以协调。绥远保安副司令刘万春（原为上官云相旧部，抗战初期由山西马延寿旅的参谋长归编到傅部的。），调升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一一一军军长，当时兵权在握，并极力拉拢鄂友三、乔汉魁、张朴、陈秉义等非其直属的师旅长要均听他的，挟制董其武。董在此时对绥远局面已难自主。张世珍时任独立第七师师长，受董的指挥，驻在归绥市。在此期间，傅曾先派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长）回绥了解情况。王在归绥与张密谈，张与傅建立了电台，后张师

移驻绥西后套西山嘴一带，暗中防范刘万春等西窜，此时绥东解放军已奉命停止西进，局势暂趋缓和。但绥远内部情况复杂。傅在接王电报后，曾据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决定让傅回绥处理。傅遂作了亲自回绥策动早日起义的打算，曾着张濯清（原傅的总参议、回族）先回绥着重对刘万春（也是回族）进行工作，并调处董、孙之间的问题；接着二次又派王克俊等与绥东解放区代表同去（闻有一人曾遭暗杀）。我与茹麟阁（原傅的经委会副主任）在北平还找到冯粹、张惠源（均为傅的师长），由王克俊安排去绥找张世珍师长，调他的一个团到包头与察素齐间的美岱召，为傅回绥的安全警卫作布置。

邓宝珊在北平和谈时是傅的全权代表，此时尚有一个曾归他直接指挥的师在绥远。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傅与邓宝珊带了在北平的随员一同回绥。行前中共华北局由北平银行拨给犒劳费现银洋十五万元，连同我们余存的五万元共二十万元，另还发给我们随行人员的费用一万元。由北平起程是乘的山华北军区准备好的一列专车，聂荣臻司令员等亲到火车站送行。原定到绥东、绥中接界处旗下营车站更换车辆，后未更换即直开归绥，绥东方面有潘纪文陪同（自丰镇至归绥换为鲁志浩陪同），归绥方面有董其武等人迎接。我曾见到其中有刘万春，他并且向我们随行的人说，我们这是唱的一台戏，他是唱了花脸的，你们能回来就好了。因当时董、孙尚各有打算，为了避免偏袒哪一方，与免遭劫持，原曾预定先不到归绥，而先到归包之间的察素齐下车，临时改变计划，我们到归绥就一同下车了。在归绥未多呆，傅与邓即去美岱召传见各军师旅长们。几天后到包头，住在城外皮革厂。以上两处均是由调来张世珍师的一个团担任警卫。因全国政协首次会议九月二十一日要在北平开幕，宁夏省城也已被解放军包围，旦夕可下。集合到包头的各

军、师、旅长及绥远地方各界代表，经过傅邓的开导，咸表明了愿意摆脱国民党，跟共产党走，故即于九月十九日集会决定，经过亲自签名方式通电起义。当时我们按照傅意，送给在场的军、师、旅长们每人三、四百元。随后傅在送走广州代表，即召集大家讲了话，说明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当前全国的形势，中共能允许绥远起义，这是最好的政治条件。宁夏派来马鸿宾（抗日战争中归傅指挥过，关系很好），是想按绥远方式解放宁夏，托我给说话，中共不答应，已请他速回去照应，以减少军事解放中的损失。傅并说到方才送走了的广州代表（据说，来的是徐永昌和李宗仁的一个亲信，姓名忘记了，并同机送来一批黄金军费，是想继续笼络董、孙），并向他们说：我认定我们走的新路是走对了。如国民党将来还能胜利，我甘愿由你们捕杀而无怨。傅在起义通电发出后，对高级干部讲话，并看了在包头集合起的起义部队后（由我们经手发了慰劳费，大概是官十至五元，士兵一元），即与邓宝珊、孙兰峰一起赶回北平，参加全国政协首次会议与“十·一”开国大典。我即随袁庆荣、于纯斋代表傅慰问驻绥西后套起义部队。到百川堡，屯垦督办处负责人田树梅曾特意设宴欢迎我们（闻田后因私藏电台、武器被镇压）。按当时发慰劳费的官兵人数统计，参加绥远起义的官兵总人数共约五万人。

绥东老解放区与在归绥起义的军政领导机关，是在五〇年元月正式合并的。在合并前，董因我是傅的随员，并系傅部老人，曾让我先到驻绥部队指挥所经理委员会负责工作。合并后新成立的绥远军区供给部（后与卫生部合并为后勤部），是由原绥蒙军区供给部和起义的兵站分监部（分监王度），与指挥所经委会三部分合并而成的。我和王度均充任副部长。各项交接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在早先兵站分监部曾按董的指示在后套

秘密保存有一批弹药，机构合并时，经王度和我请示董的处理意见。董说原来是准备应付不测事变而存储的，现应一并移交军区供给部统管起来，王度照办了。我在军区后勤部曾听到有人反映，刘万春手里密存有十万发子弹，在绥远军区正式成立后，政工人员也到了部队，刘在怕隐瞒不住的情况下，就擅自秘密分发给他要拉拢的几个师、旅。当我到他军检查后勤工作时问及此事，他看隐瞒不住，着军后勤部交给我一张分发出的数字单。但到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时，我因准备在大会上汇报去各部队检查后勤工作的情况，因此向领取子弹的各师旅长查对数字时，出入甚大。当我在大会上讲到数字不符时，而刘及有关师旅长听后，有些神情不安。有的还问我傅先生为何不来开会，他的近况怎样？就是这次开会前，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已查出刘在美帝于南朝鲜仁川登陆时，即派出一个军直营长某过香港到台湾，已与蒋方取得联系，待时机到来即可在大陆后方作内应。对此，经华北军区领导与傅商定，说傅因临时有事不能回绥参加开会了，让各政委于会后先回部队照应，各军师旅长可来京一趟有事面谈。闻当他们到京在招待所住下时，即把刘、鄂、张、乔四人扣捕了。事后傅曾有一次提到，说鄂友三在绥远起义时曾奉蒋密令要杀他，鄂基于与他的个人感情未肯下手。因此，他曾向毛主席请求保留鄂的性命。毛主席说他们几个人因都参加过绥远起义，可以全不杀^①。

参加绥远起义的部队，多属原驻绥远及由察哈尔、晋北各地败逃回来的一部分正规军，以及游杂部队和地方保安团，成份复杂，军纪也差。有些原即是土匪，起义后仍不断有向西

^①刘万春已于一九七五年释放，现为北京市政协委员，鄂友三于狱中病故。

北、蒙古地带流窜的；也有的窝藏特务；对由解放军抽派去进行解放军化的政工干部，貌合神离，疑神疑鬼，公开抵制。加之，刘万春等人并无改邪归正、投向人民的真心实意，而是伺机兴风作浪，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对华北军区发给起义部队的服装，借故拖延，迟迟运不到部队驻地，使驻在包头滩上搞生产的部队不能及时换季，以致在部队中散布着“一样儿子两样看待”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流言蜚语，严重地影响着部队的加速解放军化。为了使绥远能够早日实现解放区化，起义部队能够早日解放军化，经中央领导商得傅作义先生同意，在扣捕刘等的同时，给了绥远起义部队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董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我蒙调任为兵团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末部队开离绥远，先集中到河北景县一带进行整顿。在此期间，部队开展了一次全军性的民主运动，从而分清了敌我，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接着进行了紧张的军事练兵。在出国时，中央和华北军区领导，对部队的装备补充都很关心。华北军区曾派一部长来兵团进行了解，当听到我代表兵团后勤部汇报中提及部队运输力不够时，即向政务院作了反映，曾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给迅速解决了。兵团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间开赴朝鲜，担任了战场中部泰川、龟城线上三个大机场的修建任务，在敌机轮番轰炸的情况下按期完成了任务，全体官兵也得到政治与军事上的考验与锻炼。时因入朝的志愿军多了，前方补给运输困难，随即奉调回国，驻在河北定县一带，开始了现代化的建军，整编为陆军六十九军。另有两个师（师长赵晓峰、温汉民）改编为工程师，归国家建筑工程部领导。曾参加绥远“九·一九”起义与抗美援朝后转到山西地方工作的同志也不少。任副厅长职务的计有孟昭第、张惠源、赵晓峰、于霖瑞、高云山和我，任副局

长的有王兴、王步云；任省参事室参事的有李志舆、温永栋、茹润生、魏以荃、韩天春、滕德钦、王烈仁、奇子礼、行定远、宋清廉；分派到各业务部门担任中层干部工作的约有二十多人。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我所知道的绥远和平解放的一些情况

李 竭 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绥远方式”，为当年绥远和平解放制定了指导方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四月间，傅作义先生与华北局的首长，在北平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的草案，征得了原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先生的同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华北局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华北局方面有董必武主席、薄一波政委和张友渔、杨秀峰等同志；傅方有：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在协议上签字的是董必武主席和董其武主席。后者由绥远专程赴北平的康保安先生代表签字。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双方部队实际控制地区，由北向南，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原归绥市（即现在呼市）以东的界线在古力板乌素（位于现在郊区榆林公社境内）。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均不得越境；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立即恢复通车；通邮、通电；绥东解放区与绥西地区的人民可以自由往来；恢复两地区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规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绥西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使使军队逐步解放军化，地区逐步解放区化。为了执行这个协议，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市，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有关事项。

六月三日，傅作义先生派我随王克俊先生启程，来绥远协助董其武先生执行协议。康保安先生同车返绥。五日火车抵丰

镇，我们三人进城受到高克林政委、杨植霖主席等党政首长的亲切会见，并设宴款待。领导同志们热情，诚恳，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们在丰镇住了一宿，和省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还有鲁志浩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交换执行协议的意见。第四日的下午，火车到达终点站——旗下营，当地政府安排了住宿。翌日晨，乘坐马车继续向归绥进发。心想，绥远军民一定在盼望我们早传喜讯，迅速获得和平解放。

当天下午五时左右，马车到达归绥城东南店附近，远远望见刘万春军长已乘一辆卡车，带着警卫员早在等候我们。见面后，即索看协议文件，接着说：“绥远有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否则就要出乱子。今天你们来啦，白天不要进城，怕对你们不利，以后白天也不要上街，以免发生意外”。

黄昏时我们进了归绥城，见到了董其武主席，受到欢迎，安排住在德王府。消息很快传播出去，许多老朋友来德王府看望我们，探听消息。我们也有意识地出去访友，藉以宣传“协议”内容，了解绥西局势和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得知大多数的军政人员，地方上层人士，及各族各界，包括从河北来绥的傅系干部，都是欢迎和平协议的。董其武主席是这个主流的代表。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坐镇包头，直接指挥特务捣乱，形成一股逆流，使绥远局势复杂化。

我们来绥远的第三天，新旧城出现了反对我们的标语：“立即将出卖了北平官兵，又来出卖绥远官兵的王克俊、李竭诚驱逐出境！”“王克俊、李竭诚滚出绥远去！”在姓名旁侧还加上“狗”字。一一一军暂二师的政工室主任赵元德，更是十分嚣张、狂妄，指着我们骂道：“古人说的好，‘不成功便

成仁’，你们无耻地投降了共产党，不在北平一头栽死，还有什么脸面回绥远来？”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想要限制我们的活动。

又过了两天，王克俊派我单独去丰镇，通过潘纪文同志向省委汇报绥西地区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处境，并带去几张街头揭下的标语，说明工作阻力很大，局势复杂，取得省委的谅解，把原定七月十五日联络处来归绥的日期向后推迟。

在这些日子里，我根据了解到的情况，针对在中、下级干部中带有普遍性的错误认识，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要和平？》。内容主要阐述了傅作义先生在北平起义后，受到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礼遇，身体自由，心情舒畅。对待过去的历史，我们要做具体分析，参加抗日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但最后三年卷进了所谓“戡乱”战争，却是走上了错误的反人民的道路。北平起义是光荣的革命的行动，它保护了北平古都的历史文物，拯救了二百万人民免遭战火，保全了五十万军队官兵的生命安全，并引导脱离反动阵营，走向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是“投降”，那是向人民投降，由过去反对人民变成人民的军队。关于我们的军队性质，在三年内战期间，正如傅作义先生自己说的：“在农村系为大地主看家，在城市为豪门保镖。”也就是说，我们是为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过去所说的“为人民”，实际上是在摧残和压迫人民。而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所以处处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客观事实，必须老实承认而不能回避。傅作义先生关心绥远军民的安危和光明出路，亲自和共产党中央首长商谈，达成《绥远和平协议》。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大家千万不可辜负傅先生的殷切期望。

对共产党要有正确的认识，绝不可再继续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与蒙蔽。共产党真正是为国为民，目标远大，以解放全国人民为己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绝不计较个人恩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坚决主张释放蒋介石，就是历史的见证。正因为有了北平起义，共产党才对绥远解放的条件特别宽厚。事实证明，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信得过的，是可以长远共事的。“先甜后苦”是反动派的诬蔑谰言，切不可听信。

文章全文约四、五千字。限于当时我的认识水平，并考虑到官兵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思想状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后来以绥远省革新学院的名义铅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供军、政干部宣传学习。对统一思想认识，打击反动分子的造谣破坏，推动绥远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月下旬，董其武主席、王克俊先生派我去丰镇商谈省委派联络人员的问题。我和潘纪文部长商定了联络人员来绥日期、人数，即提前返绥，向董其武、王克俊先生汇报。董说找寿山（即刘万春）来一道听听。刘万春很快来了。我扼要汇报商谈结果，绥东方面决定来四十人，由潘纪文部长亲自率领，三日后到达，我们要做好接待工作。刘万春听完提了两点意见：第一，绥东来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我保管，不许随便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任；第二，《奋斗日报》太不象话了，尽登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有人要砸报社。我们三人一听就楞住了，空气显得特别紧张，沉默了一阵，董先生才慢慢地说：“我们不能那样对待人家，一定要保证来人的安全。”刘听后忿然离去。当夜《奋斗日报》社被砸了，还打伤了人。次日报纸停刊，大换班子，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

第二天，根据董其武主席的指示，交际处抓紧时间，修缮位于西落凤街的一幢房院，搬运家具，积极做好接待准备。

三天过后，接来绥东的同志，由潘纪文、鲁志浩同志率领，除联络处的干部外，还有人民银行、铁路两个工作组。董其武主席、王克俊先生、交际处康保安、叶国林、王景泰及全体工作人员，均亲自出面会见，安排食宿。次日，绥东来的同志分头出去，找同行业的接头。归绥市新旧城街头，出现了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人民群众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说明解放的日子指日可待，人们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可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动起了杀机，竟然指使暴徒向联络处人员袭击。有一天下午，绥东的几个同志从旧城返回车站途中，事先埋伏的暴徒，突然投掷手榴弹，将铁路工作组的干部王士鑫同志炸伤，当经送往省立医院抢救，不幸伤重牺牲，为绥远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王士鑫同志的牺牲震动很大，说明对绥东同志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工作也难以开展。潘纪文同志要率领联络处的全体同志返回丰镇。临行前，董其武、王克俊和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向王士鑫烈士的灵柩举行公祭仪式。由于董其武先生的恳切挽留，经过组织决定，联络处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三位同志继续工作。为确保安全起见，搬往德王府居住。王克俊先生则随联络处的同志们一道离归绥，迳返北平，临行嘱我继续陪同鲁志浩等三位同志。

就在这两天里，绥远局势逆转，共产党的干部王士鑫同志被打死了，联络处的同志们回丰镇啦，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遭到了破坏。这些不幸的消息，很快地传播开来，顿时引起人心惶惑不安，预感到解放大军很快就会打进来，战争的恐怖气氛又笼罩全城，有些人已开始向后方转移。后来群众看到还有三

位共产党代表留在新城，总算没有完全破裂，心里才踏实一些。蒋帮特务分子所以抢杀共产党派来的干部，目的是要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由于党坚持“绥远方式”的方针不变，绥远和平解放才没有受到干扰和破坏。这时北平又在继续寻求和平解放的新办法，省委潘纪文同志参加了谈判。

八月底，我护送鲁志浩同志回丰镇，次日我转车赴北平，分别向傅先生、王克俊和潘纪文部长汇报了绥远的最新情况。王对我说：“中央已同意傅先生亲自去绥远做工作，三天后出发，你也一道回去。”出发的那一天，中央派了一列专车，停在前门西站，有解放军护送。车上装有不少银元，系中央给绥远官兵的慰问金。随同傅先生来绥远的除我和王克俊、阎又文及其他随员外，还有邓宝珊、李世杰、秦丰川等人。潘纪文同志由北平专程护送傅先生到丰镇。列车一路安全行驶，到达丰镇，绥远党政领导均到站迎送，会见傅先生，甚为热情亲切。并派鲁志浩同志由丰镇护送傅先生到归绥。车到集宁，受到姚喆司令员为首的军政人员的热烈欢迎；董其武主席派康保安先生专程到集宁迎候。列车到达旗下营，董主席派卫景林率领的铁甲车及一个营的部队，早已等候，和解放军交接了警卫任务。列车到归绥站，以董其武为首的军政人员，地方上层人士，均到站热烈欢迎。傅先生在归绥稍事停留，轮番接见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知名人士，还分批传见部队营以上军官，并由董其武主席陪同，检阅了驻归绥的部队，发放了慰问金。傅先生以其在军政各界享有的威望，用亲身的体验，着重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发展前途，说明起义是光明的、正确的道路，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并阐明了党的统战政策，排除了某些人对起义的种种疑虑，引导参加起义，走革命的道路。他的话最能打动人心，也最有说服力。凡受到傅

先生接见的人，在思想上莫不豁然开朗，欣然同意起义。傅先生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与重托，前来解决绥远起义问题，那些捏造傅先生在北平被软禁的谣言，不攻自破。那些蓄意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人，已无法施展其欺骗的伎俩，阻挡不住滚滚的革命洪流，只得无可奈何地销声匿迹，向隅而泣。

我下车以后，王克俊还是让我继续留在归绥，陪同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同志。

傅先生在归绥工作告一段落，专车开往美岱召，继续传见附近部队军官。后来又开往包头，下榻于包头皮革厂，继续分批传见部队军官与地方人士，劝导军政人员起义，跟共产党干革命。

反动派一向以主观唯心论的观点错误地估计形势。当傅先生到绥远的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以为有机可乘，积极进行拉拢，选派了与傅先生友谊较深的徐永昌，专机飞往包头，带着反动派头面人物们的信件，面请傅先生回广州，继续为反动派卖命。傅先生坚决拒绝，并劝徐背弃广州政府，同他一路回北平，参加全国政协。徐只好托辞返回广州。在此以前，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抱着幻想由包头赶往美岱召面见傅先生，适绥包对开的火车在美岱召站会车。傅见了张庆恩，收下他带来的几封电报，拒绝交谈，撵他上车。后来，“九·一九”那天，张庆恩只得搭乘徐永昌的专机，狼狈逃往广州。

九月十五日，包头来电话通知地方上层人士张钦、荣祥等前往包头，协商参加起义签名。十七日，电话通知我立即去包头。十八日，傅先生派我带上起义电文草稿，和傅先生来绥远后与华北军区薄一波政委、聂荣臻司令员的来往电报，让我当日赶到丰镇向省委汇报。我中午乘火车回到归绥，向鲁志浩同

志转达了傅先生的意见，我随同鲁志浩同志乘铁路电压车直赴丰镇。十八日晚向省委汇报了起义工作进展情况。九月十九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三十九人，联合签名举行光荣起义，宣告绥远部队官兵四万余人，正式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革命，走到人民方面来。同时庄严地发出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向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发出起义通电。这是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绥远省党、政、军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巨大成就；也是傅、董先生及其他爱国人士坚决走革命道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和毛主席复电祝贺，勉以“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这就是以后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接到聂司令员，薄政委的贺电，勉励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九·一九”起义的通电发出后，傅先生召集干部讲话。大意是：“我过去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由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引到光明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由自己负责……。”下午四时，傅先生同邓宝珊、孙兰峰、王克俊等，从包头乘专车返回北平。当日晚车过丰镇，省委领导高克林、杨植霖、苏谦益、奎璧、潘纪文、鲁志浩等同志，均赴车站迎送，并赠送许多西瓜，象征着胜利果实，傅先生感谢省委在促成绥远军政人员起义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在一片欢庆起义声中，汽笛长

鸣，专车徐徐离开丰镇向北平进发。傅先生、邓宝珊和孙兰峰先生，要星夜赶回首都，参加即将开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政协会议。

我在丰镇车站送别了傅先生、王克俊等人以后，第二天又偕同何树声同志返回归绥。

为庆祝光荣的“九·一九”起义，绥远军民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举行庆祝大会。在归绥市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薄政委的电文，全场热烈鼓掌拥护！董其武主席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的幸福和光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予的，我们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新中国而奋斗！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

我在“九·一九”起义过程中

梁子材

我是从四八年六月，因充任国民党监察院委员前赴南京，于四九年春季飞返绥远的。去南京前，我任原绥远省政府的《奋斗日报》社社长。在南京期间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无恶不作，政治经济彻底破产，军事处处失败，奄奄一息，死亡在即。觉得自己和南京反动派素无关系，犯不上跟他们走死亡道路，到穷途末路时，只能被他们抛在一边，陷于绝地，倒不如回绥远去。绥远虽然也要解放，宁愿回去和家人团聚，听候命运安排，也比跟南京政府反动派好。陈志仁委员想法和我一样。不几天淮海战役结束，蒋军一败涂地，全部被歼。解放军以破竹之势，接连攻克苏、皖大部地区，占领长江北岸，已与南京隔岸相望。南京政府摇摇欲坠。我和陈志仁前往航空站登记返平客票，但北平飞机已宣布停飞，欲回不得。过了些天，傅先生放下武器，北平和平解放。南京政府既迫于长江北岸解放大军云集，时刻有过江之虑；同时又震于北平解放，革命势力更能并力南下，打过长江，慌做一团。所有伪政府机关和人员纷纷逃往台湾，偌大个南京城竟空空如也，沉寂地象死去一般。我想北平既然和平解放，绥远将来也或许如此，觉得更有回的必要，但欲飞无翼，徒唤奈何！好容易王景泰赴南京公干，我和陈志仁就搭上王的回程飞机，相偕返绥。

但返绥后，耳听目睹，都是一片凄凉景象和愁苦情绪。大多数人是苦于经济萧条，生活困难，迫切希望局势好转。有些

人是终日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势；有些人灰心丧气，感到无路可走，各有各的痛苦。表明现状是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变革。而一小撮反动派和特务，则仍然执迷不悟，疯狂叫嚣，妄图继续反抗，辱骂傅先生是投降、变节、叛徒。绥远军政当局，董先生则深居保安司令部，默不作声。这种情形，和我在南京时对于绥远前途的想象，竟大相逖庭，内心很苦闷。

当时我的思想是渴望和平的。因为形势很明显，国民党反动派灭亡在即，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和平解放才是生路。因而我很希望和平解放，切盼董先生迅速起来走和平道路，我好和大家一起，跟着他走。如果情势许可，我能为和平尽点力的话，我就为和平作些工作。但等来等去，董先生还是不表态，局势很沉闷。

在绥远局势紧张中（大约四月间），《奋斗日报》就开始逐渐地为和谈作工作，陈湘屏、李西桥、芦宾、于志乾、任寅、王希贤、李秉彝诸人，就收听到新华社和香港等方面的消息，改头换面，不标明来源，择要转载，向读者作了报道。这样就对反动派造谣宣传，给予反击，使读者对当前形势的实况有所了解。因此也深为反动派尤其是特务分子们所嫉恨。我对他们的勇气和作法完全赞同，并对他们的处境困难关怀，表示到了必要时候，我就出来尽力支撑。

没有几天，归绥局势万分紧张。解放军就要进攻的消息，传遍全城。不少人惊慌万状，军方物资准备西移，有些人纷纷西走。在这严重关头，觉得自己的行止，需要有所决定了。起来争取和平呢？自己不够格；如果呆下去，一旦军事解放了，又怕军管、斗争；只有暂避一时，西走兰州，等待最后解放，或者要好些。但想来想去，还是应看董先生的态度再来决定。想要见董，探询真意，但又想董主席正在沉默不语之际，自己

既非他的亲近，又非他的重要人员，肯定不会对我表态。也许我把要走的意思告给他，或者可能多多少少地得到些暗示，使自己有所遵循。于是我求见董，明白表示要离开绥远，前往兰州，但董主席却毫无表示，只是送给我一百银元。我这时觉得十分徬徨，不知该怎样才好，想了一夜，就决心毅然前赴蒙古花园（保安司令部，今中共内蒙古党委所在地），见有些兵士正在装车。我要车采凤（董主席的秘书）通知董我来见他。车说：“董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不能转达，你去见吧！”我便前往见董，他欣然接见。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傅先生在北平，绥远局势这样紧张混乱，主席究竟怎么办？”董很爽快地说：“跟傅先生走。”我说：“对了。我们只有这样，才是正路，既然如此，我就不走了。”经过这一席谈话，我才知道他默不表态，是由于当前环境使然，他只有坐在那里，故作镇静，等待时机。于是我心里便有了底。觉得董既是这样，自己跟着走就好多了，或者还能多多少少为和平尽点力量。便把他给我的一百元银洋，托奋斗报社刘文潜君送还省银行。接连见了董先生几面，才晓得他正考虑争取和平解放的入手之道，须要消除干部顾虑，统一思想认识，以便逐步走向和平。为了便于顺利进行，减少内部阻力，口号是革新，不能马上提和平解放，因而需要有个纲领式的方案作为号召之资。因此，他命我拟稿，我就毅然承担了起草革新方案的任务，就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措施，作为陪衬，重点是在帮助干部认识形势，顺应民意，求取生存。董先生看了认为很符合他的意思。后来在革新委员会开会时，便把这个方案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为酝酿讨论的材料。

过些天解放军不进攻，绥远局势又渐和缓。董先生就从保安司令部走出来，到省府亲自和张立范、韩伯琴、赵国鼎、张

国林、寿耀南、张戒之（董的机要秘书）和我等一些人员，举行小型漫谈，就当前形势、解放区土改情况、绥远现状等展开漫谈。董先生一再表示他争取和平解放的决心，并郑重地表示了他争取和平解放的主旨所在。他说：“……不是大家的过，是我和傅先生带错了路，弄得大家走到这个地步。我有责任挽救大家。”又说：“我在道义上必须跟傅先生走。”又说：“不是因为傅先生和大家，我想走的话就走了。”有的人感到干部中个别人想不通，很失望。董先生说：“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多年的国民党，我们并不是进步人士，只是刚刚认识到，原先和他们一样。这不能怪他们，需要耐心帮助。”他坚决表示要帮助全体干部共同走和平起义道路，不愿遗弃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对我们认识不足的地方尽力帮助。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们，为了拚命挣扎，顽抗到底，大肆喧嚷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的谰言，企图以此恐吓群众，使人不敢争取和平。有些人本来有顾虑，听到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更为害怕。董先生为此曾邀集张钦、荣祥、阎肃、于存灏、胡凤山诸人，让我就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可能发生的问题，陈述我的见解。我就自己所见，从政治、经济、战备等方面，论述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会后，我感到反动派的这一无耻谰言，到处散播，迷惑大众，光对少数人谈还不够，还得对多数人进行工作，予以驳斥。虽然自己对国际政治缺乏研究，也写了一篇稿子，力言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的不可能，发表在《奋斗日报》上。

一次，在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上（是个小型的会，召集了王映荣等七八个人），董先生当时要我说几句话。我就依照董主席消除顾虑、统一认识的主旨，谈了谈当前时代是人民时代，要顺应时代要求，服从人民愿望，才能生存，否则就要为时

代、潮流所淘汰。我当时是仓促发言，说的很是简单，觉得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于是就写了一篇关于时代认识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奋斗日报》上。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奋斗日报》由于择登新华社和国外消息，为促进和平而努力，这就深为反动派特务们所仇恨。不久董先生从保安司令部到了省政府，为了缓和反动派特务们，尤其是部队方面刘万春等的反对，曾叫我回社主持社务，意在把报纸内容有所改变。我坚决不去，说他们办得很好，不需要我回去，婉言谢绝。事情很明白，如果回去把报纸往后拉，我是坚决不干的；如果继续前进，为和平效力，反动派特务更要猖狂进攻。董先生为了缓和那些人，很可能还是要将报纸往后拉，我有什么办法来抵挡。况且现在还未到重要关头，不如延缓些时候，看董先生态度再说。过了些天，董为反动派所迫，决定改组《奋斗日报》社。我为了在报社处境困难之下和同仁们一道工作，而且使报纸和当时的革新联系起来，便由车采风向董先生转达了我愿返报社工作之意，董先生让我负报社工作之责。在我到报社工作之后，直到报社被砸之前，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群众渴望《奋斗日报》内容更为先进，再前进一步，显得更为突出。

这时，绥远局势趋向缓和，董先生又在内部酝酿和平，尽管部队中的死硬派分子刘万春等企图顽抗，破坏和平，但国内形势越来越好。《奋斗日报》在诸同仁的努力下，报道内容较前突出了，新华社和国外消息较前更多了，甚至富于革命性的论谈也转载了，并且后来还有时候标明消息来源（新华社），向读者作真实报道。同时，报纸的副刊除本社人员执笔外，并联系外界知识分子写稿，内容也比较充实，敢于刊登一些揭发现状、富于刺激性的文章。报社还先后召开了几次座谈会，邀

集一些人漫谈时事，最后二、三次就明显地以缓远前途为题，开展讨论。此时外界有些人关心时局，也纷纷到报社探询消息，并征求对时局的看法。还有些知识分子，也因与报社观点相同，有了联系。当时《奋斗日报》确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同情的，因而也更为反动派、特务们所反对。在这一阶段，我本来想着到报社只是个暂局，不几天就会被迫离社了，《奋斗日报》不几天就会改组人事、变更报纸面目了。但事实不然，董先生反而不再动作了（除苗平章向我说要调陈、李外）。我内心是这样想，或者主席现在想通了，不为反动派的攻击所动摇，不然的话，也许是要等些时候再说吧！

在这一阶段中，反动派和特务们对报社更加愤恨了，接二连三地以恐吓信、恐吓电话相恫吓。我们坚决不理他，照常继续为和平工作。

省政府小型漫谈阶段过去后，就过渡到大型讨论了。缓远省革新委员会至此正式成立，下设数组，我担任的是时代认识组。参加大会讨论的人数，较前大大增加，省政府所属各机关重要人员大都参加。缓远省军政干部训练团也改名为革新学院。大会散发了革新方案（又叫革新纲领）。首先展开小组酝酿，当时有不少人是愿意及早和平解放的，有些人本来愿意和平解放，只是对反动派、特务们有顾虑，怕出头疮先烂；也有些人愿意和平，但要看一看再说，怕人指责是变节、投机；有些人认为问题不在自己，是在拿枪杆的人要反对；有的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和平解放了，也难免于斗争，抱着观望态度。总之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都希望和平解放，只要进行酝酿，互相帮助，是容易沟通思想，取得一致认识的。经过小组酝酿，开始大会讨论，董先生让我讲话。我就革新的旨趣和时代认识作了发言，以便推动大家讨论。本来不论革新方案，不

论发言内容，都很一般，既没有什么刺激性，更没有提出和平解放的意愿和要求，都是些极平常的道理，毫不足奇。只是要求大家共同改变认识，从事革新。但就是这个平凡道理，反动派、特务们也决不允许。他们不等别人发言，苏寿余、赵元德就站起来，气焰万丈，大肆咆哮，辱骂我是投降、变节、投机……。赵元德后来蹲在地上，气喘呼呼地叫骂。这样，直弄得与会人员面面相觑，没人敢吭声，空气很紧张。第二、三天，大会并召集了一批中学校教职员参加，但他们看到会场气氛紧张，苏寿余、赵元德跋扈之状，有一、两个人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多数人只是静观苏、赵二人的疯狂叫嚣。当时董先生只是笑着说：“我们的干部就是有气节，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就是凭了干部有气节”（记不清是头天说的，还是第二天说的）。这时会场里呈现着一片黯淡之色，眼看着是开不成了。

这时反动派、特务们，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尽力破坏革新委员会；一方面对《奋斗日报》社加紧了围攻。恐吓信和电话纷至沓来，辱骂的标语和丑化报社人员的漫画，也张贴在报社门前，口口声声要砸烂报社人员的脑袋。我和同仁们，都觉着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心坚持到底，不为所动。

七月二十日，共产党的代表潘纪文、鲁志浩诸同志到达归绥。反动派、特务们为了破坏和平商谈，在当晚戏院散戏后动手了，以赵元德为首的一伙军人先是向编辑部楼门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接着便蜂拥而入，到处找人乱打，藏躲不密的人都挨了打（李西桥、崔祥等人），我和李养高等一些同仁躲藏在墙洞内，没被发现。他们打完了便扬长而去。同仁们就着手编辑新闻。这时警察分局长董玉喜到社说：“你们编报，他们就要打，我们不能保护你们，现在后面城墙上还有人对准你们楼房站着。”大家意识到反动派和特务们是决不允许我们编报了，

是我们退出报社的时候了。这时我和李西桥、陈湘屏、芦宾、于志乾、王希贤、李秉彝、李养高，还有校对姓郭的（忘记名字），在深夜中一齐走出社门，从此脱离了《奋斗日报》社。在此同时，革新委员会的讨论会也停开了，无声无息地归于消沉了。董先生统一干部认识、争取和平解放工作，就被刘万春等破坏无余了。

但反动派、特务们是决不就此罢手的，他们是要把和平解放道路彻底破坏的。接着他们竟肆无忌惮地把共产党的代表王士鑫同志杀害。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隔了些日子，傅先生从北平莅临归绥，把反动派的妖风邪气一下子镇压下去了，他们的鬼蜮伎俩就无法施展了。因而广大干部得以抬头，一致起来跟傅先生坚决走和平解放的道路，遂于“九·一九”这一天，举行了绥远和平起义，发出了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

从“九·一九”起义的一天起，我和全体军政人员一样，脱离了反动泥淖，走向新生。迄今三十年来，备受党的恩遇，使我既有工作，受到实际锻炼；又参加学习，逐步提高思想认识；并给我以很好的政治地位，优厚的生活待遇，真是无微不至。党对我的恩德，真是天高地厚，使我永远铭刻在心，时时刻刻不能忘怀。

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

绥远《奋斗日报》社被砸前后

李西桥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军政人员起义前，绥远《奋斗日报》社曾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捣毁。当时我在这个报社做编辑工作，曾亲历其事，并遭暴徒殴打，但至今已时隔三十年，有些情节早已淡忘，现在仅就记忆所及，简述如下。

绥远《奋斗日报》是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我是一九四五年底到这个报社工作的。“九·一九”起义前夕，社长是梁子材。

一九四九年春季，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在迅猛发展，为了实现绥远的解放，中共与绥远当局的谈判也在酝酿进行。报社中从社长以下，每个人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平解放绥远的号召，积极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从自己的岗位上设法促进绥远早日获得解放。但是当时绥远的情势颇为复杂，这主要是在军政人员内部，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对形势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极不一致。少数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与中共进行和谈，妄图顽抗到底。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和当时任省保安副司令的刘万春之流，沆瀣一气，竭力阻挠和破坏谈判的进行；也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情势的变化上，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战争中寻找出路。大部分人虽然认识到和平解放是唯一出路，但思想上顾虑重重，加之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反动宣传，人们对解放战争的形势讳莫如深。处在这样情况下，作为官方的《奋斗日

报》，如果以评论形式公开表示对时局的态度，是不被允许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指责，为了使部分读者主要是对当时形势持不同态度的军政人员在认识上迅速转变，这就不得不采用隐晦曲折的办法来进行宣传。我还记得一九四九年春，前社长阎又文还特地由北平通过私人捎来一信，要编辑部在工作中“注意分寸，逐步转变”。由一九四九年春季开始，首先对解放战争的报道，改变了以往全部登载中央社电讯的办法。起初时抄收一些外国电台的有关对中国解放战争的广播新闻，将这些新闻编排在中央社同类电讯的后面。这在当时被严厉禁止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情况下，上述的外国电台新闻广播，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观点，但较之以造谣欺骗为能事的中央社报道，还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样做，既使国民党的检查人员无可指责，而读者在阅读这些报道时，又不难从中看到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一些真象。与此同时，发表论述国际形势的社论，通过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指出世界两大阵营虽然在进行剧烈的冷战，但在可能预见的时期内，不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使那些对国际局势抱有幻想的人，暗示他们的“以拖待变”的幻想是不可恃的。进入五月份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如疾风之扫落叶，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华北地区太原、大同、新乡和安阳等孤城相继宣告解放。在绥远方面中共与绥远当局的谈判也在进行。报纸除了继续抄收登载外国广播新闻之外，逐渐增加抄收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新闻。为了不使有些读者感到突然，开始时进行了一番改头换面的重写，将“新华社××电”去掉，在不失原意的原则下，换去消息中的某些词语。接着不久，就将抄收到的新华社电讯原文登载。这时在第一版的要闻版面上，中央社的电讯逐渐减少，新华社的电讯不断增加。到五月下旬，甚至新闻的标

题，也干脆用新华社电讯原文标出。记得五月二十日收到解放军解放南昌的消息，在二十一日的报纸上，就以头号黑体字标出“南昌宣告解放”，全文登载了新华社的电讯。

现在还清楚记得：一九四九年六月，有一次我在康保安家中看到一份在北平出版的《人民日报》，上面登载着一篇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写的《致胡适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公开信大意是，胡适为了研究《水经注》一书，不惜求各种版本，互相参照，辨别真伪；但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却只根据蒋介石的一种版本。作者质问胡适，为什么不研究共产党的版本？最后作者表明自己的见解，只有按照共产党的主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由于作者陈垣是国内知名的历史学家，而文章又深入浅出地触及到当时读者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把报纸带回，经研究后全文加以转载。发表以后，在读者特别是公教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们曾接到读者反映，认为陈垣“说的是实话”，“读后对自己的认识有帮助”。但同时，也更加引起了反对绥远和平解放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对报纸的仇视和愤恨。

报纸除了报道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以外，每星期日的“驼峰”副刊，也一改过去刊登消闲文字的情况，有意识地组织一些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以及对读者思想有针对性的稿件发表。这在当时，都得到读者的注意和欢迎。

由于报纸有了上述的转变，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销行份数迅速增长，仅在归绥市内就由原来两千份左右，一度上升到三千份。为了适应读者需要，还增印了零售，每当出报时间，就有读者到报社营业部购报，在报社门口的阅报栏前，经常有读者围立读报。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个时期，为了扩大宣传，增进人们对和平解放的认识，

使更多的人在思想上趋向一致，报社先后召开过两次座谈会，邀请文化教育界以及社会上各方面倾向于和平解放的人士，座谈形势和绥远的去向问题。座谈会后，编辑部将发言记录进行整理在报纸发表，这在当时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报社编辑部曾经常有读者来访，有的是探听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讯息，有的是了解绥远当局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的情况。在当时消息闭塞、空气沉闷的情况下，不少的读者把《奋斗日报》看做是消息灵通，能给自己思想上以鼓舞的知心友人。

报纸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但同时，那些反对绥远和平解放的特务分子，也更增加了对它的仇恨。他们看到绥远的形势，一天天走向和缓，内心极为恐慌，因而把登载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奋斗日报》，视为眼中钉。这些人，首先在报纸的发行方面，进行了种种刁难和限制。当时绥远军政当局尽管控制着归、包二市和绥西地区，但各地政治气候却大不相同。就以包头来说，距归绥不到三百华里，而且交通畅通，但由于大特务张庆恩当时住在包头，华北各地大大小小的特务分子象蛆虫一样猬集在他的周围，这一帮亡命之徒在包头市内猖狂活动，非常嚣张。据当时在包头负责推销报纸的人反映，推销工作遇到重重困难，报差经常受到漫骂和侮辱，甚至有被殴打的。至于绥西地区，政治形势不比包头好。特务头子潘秀仁以绥西行署主任的名义盘踞在陕坝，他对人们看《奋斗日报》大为恼火，气急败坏地下令禁止报纸在绥西发行。归绥的形势虽较和缓，报差在送报时遭受辱骂的情况也时有所闻。特务们在限制和刁难报纸发行的同时，以更加卑鄙和无耻的手段，对报社进行恐吓和威胁。早在报纸开始登载解放军进军的消息不久，在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当编辑人员进行工作时，他们

就在报社的后院投掷一颗炸弹。随着形势日趋缓和报纸大量刊载全国解放的胜利消息，特务们更使出种种手段对报社人员进行恐吓和迫害。这帮家伙趁着黑夜，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辱骂报社负责人是“投降，变节分子”，叫嚣“没有好下场”，等等。有一天早起，在报社门口的阅报栏内，发现一张画有手留弹的漫画，旁边写着“如再替共产党宣传小心脑袋”。社长梁子材的住家门口，也被贴上了辱骂的标语。特别更加无赖的是，当编辑部夜间工作时，竟利用电话对报社负责人，指名道姓地进行侮辱。我和经理部主任陈湘屏，当时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种情况。

六月下旬以后，绥远形势已逼近明朗化阶段。七月十一日，国民党特务带着一群暴徒，先用炸弹和机枪，继之以侮辱和殴打，捣毁了这个报社。

《奋斗日报》的地址，在归绥旧城北门里路东的一座二层楼内。楼上是编辑部、楼下是经理部和营业部，印刷厂房就在院内南北房中。七月十一日晚间约十时前后，正是“大观剧场”和“新生堂”电影院散场的时候，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这时编辑人员刚开始工作，外勤记者已将当天采访的新闻稿件写毕尚未离开，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研究当天的稿件时，蓦然在正对办公桌外面的房檐处，接连两声巨响，刹时电灯全熄，房上泥土受震纷纷跌落，楼内硝烟弥漫。接着楼下院内响起一梭机枪声音，枪声过后，大约有几秒钟的静寂，喊打声和呼叫声在院中顿时响成一片。黑暗中我由办公室走进楼梯口的社长室，我还没有坐下，就听见有人上楼。这时我想与其被他们搜出殴打，不如上前和他们辩理。当我正要开门，一个暴徒已经破门撞入，我还未来得及开口，这家伙就劈头盖脸朝我打将过来。我转身退到楼梯口，被暴徒顺势一推，将我从楼梯推了

下去。这时我发现经理部主任陈湘屏，正被一群暴徒包围殴打。接着校对崔祥也由楼上被推下。特务们一边打人，一边叫着寻找梁子材、陈湘屏和我三个人。这时大约有数十个人，在院中气势汹汹地搜索打人，他们出进厂房，上楼下楼，无论工人、编辑和记者，逢人便打。其中特别是有一个哑巴工人，因耳聋躲避不及，被打惨重。这时报社门里门外，围观的人蜂拥而集，水泄不通，大约有半小时之久，暴徒们才呼啸散去。一阵骚乱之后，编辑记者陆续返回，才知道有的被打伤，有的跳楼摔伤，办公室中的家具七倒八歪，稿件散落满地。大家表示极大的愤慨，一致主张坚持出报，把特务们制造的暴行通过报纸暴露在广大读者面前。这时忽然有一个身着军服的人闯入，他和梁子材打过招呼之后，转过身来自称名叫赵元德，说什么在附近住，听说报社被炸特来看望，并装模作样地说：“这时候办报最难呀”等话。直至一九五〇年，这个赵元德以反革命罪被处决时，才真相大白，原来他就是暂编第二师的政工处长，特务分子，就是他带着一群暴徒把报社砸毁的。

赵元德离去之后，又接到归绥市警察局电话，要报社人员立即离开报社，并说如继续出报，有再次被砸的可能。大家商量之后，相偕前往附近的归绥市政府暂避，直到东方破晓。

报社被捣毁后，绥远当局置若罔闻，并未给肇事人以应有的惩处。据了解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苏寿余，竟然疯狂叫嚷把编辑人员“统统开除”！接着报社编辑部强制改组，原编辑部人员与社长梁子材被迫离开了报社。

报社被砸之后，归绥市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时特务分子气焰嚣张，整个市区气氛紧张。大约在数日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发生了中共代表团成员王士鑫同志在马路上被公开以手榴弹炸伤致死的事件。由于国民党特务和军政人员中的顽

固分子的破坏，使中共与绥远当局的谈判，几乎濒临到破裂的边缘。

不管反动分子如何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历史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绥远的和平解放就是这样。尽管刘万春之流和特务们，用尽了一切办法阻挠绥远解放，广大军政人员在全国胜利的影响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平解放绥远方针的感召下，终于排除了重重阻挠，击败了顽固分子们的破坏，于九月十九日宣布了起义，结束了国民党在绥远的反动统治。从此，绥远省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

“九·一九”起义至今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包括我自己在内，原在《奋斗日报》的同事们，由于党的起义政策，不但获得了为人民效力的机会，而且生活也有了确实保障，更为重要地是，政治觉悟也都有所提高。回首往事，林彪、“四人帮”逞凶的时期，象噩梦一样已成过去；现在，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始了新的长征。我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四化建设，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

绥远省“九·一九”起义前片断回忆

张 鸿 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绥远省“九·一九”起义，转瞬已三十年了。在毛主席的光辉政策照耀下，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每个起义人员除了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从事革命工作外，不少年老体弱的干部都过着幸福的晚年。在此“九·一九”光荣起义三十周年将要来临之际，我怀着十分欣慰的心情，把当年起义时的片断史实，回忆如下，以表纪念之意。

一、传达“绥远方式”，敦促早日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前，我任傅作义先生部队三十五军军政工处处长。北平解放后，部队开赴城南芦沟桥一带，经过一个时期整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转变官兵认识，于一九四九年三月，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第七招待所主任，主要是安置部队改编时编余的排以上军官参加学习、工作和回家的有关工作。四月上旬，工作将要结束，王平团长与我谈话征求意见，要在工作结束后，送我到石家庄军大学习。对于参加学习，我有些顾虑，认为我在旧军队搞政工，与共产党针锋相对，罪恶严重。虽说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发有证明，既往不咎，但思想上的疑虑，一时也难以消除。我考虑到新领导跟我谈了，虽有自己的想法，但

也不好直说不去，只好作去学习的准备。临行时，我与崔维岳（原傅部一〇一军政工处长）一同去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向王克俊先生汇报部队改编后干部安置情况和我要去石家庄学习，并请代问傅先生好。说完，王让我俩等了一会，他向傅先生转达我俩去意。片刻后他回来说，傅先生让你俩去绥远，向董其武传达毛主席对绥远的和平解放政策，敦促董早日起义。王克俊要我们向董说的大意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傅先生到石家庄见了毛主席，主席热情地赞扬了他对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询问了部队改编情况，如有困难可以提出，并勉励继续努力工作，为人民多作贡献。关于解放绥远问题，毛主席说，党中央已决定用和平方式解放绥远，因为有北平的和平，我们对绥远一切照顾，那里的所有干部，我们一律给予妥善安置。现正在研究和平解放绥远的方案，过些时候研究妥后，再派人送去。你们到绥远后，先向董主席传达这个意思，就说傅先生已给他多次去电报，催他起义，未见表态。傅先生意见，这是难得机会，他们如果不起义，今后一切后果由他们自己负责，傅先生就不再管了。

我们听到这个指示后，心情十分高兴，回到招待所，向组织上说明不去军大学习，即准备回绥远，同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沧、周树钧等友好。我们于四月十五日由北平动身，二十日来到归绥市。次日晚，我俩到指挥所（现内蒙党委院内）见董，把傅先生意见一一向董作了转达，并着重传达了傅先生对他早日起义的期望。董听完后，以十分赤诚的态度，向我俩说：“傅先生几次电报，我均收到，未能复电。主要是刘万春军长不主张起义，而且部队团长以上干部，通过刘的策动，大部分还不同意起义，不相信共产党。认为现在说的，答应这个安置、那个照顾，枪交了什么都不执行。其次，他们看见西南、

西北大片河山还没解放，这里不能守还可向西北转进，如其让共产党那样搞掉，还不如打一下。总之，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其三，对傅先生在北平处境也不相信，认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不一定是傅的真实意思。傅先生电报是在共产党软禁下，被迫提出来的，怕起义上当。再即是，地方上潘秀仁、张遵民等伪中央党团骨干和一些地方士绅，更反对起义。认为咱们随蒋介石多年，北平是在被包围、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了投降道路，咱们现在可守可走，如果起义投降，对不起党国，对不起绥远人民。因此，我如果当即主张起义，地方干部好说，军队一时搞不通，那样咱们内部就要乱了，甚至流血，后果不堪设想。你们来了，就不要走了，帮助我搞起义活动吧！”

我们转达了傅先生的意见后，就把我们在北平解放前后的见闻，反复地向董先生说明，傅先生让他起义完全是傅的真实意思，是对咱们这些跟随他多年人的一种爱护，是当时的国内形势最有利的途径。傅在北平并非软禁，仍住在他自己的家里。王克俊先生等正在办理移交手续，而且还给傅留有警卫团保护他的安全，另有电台让他对外联系。最后董先生表示，一定追随傅先生走和平解放的道路。随后又分析了当时绥远的情况，认识到地方干部工作容易作，部队方面因刘万春的阻挠，需要做大量工作，应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促其变化，目下说话还要注意。为了搞起义活动方便起见，董先生让我们俩住在新城元贞永街坐南向北的院内，做为工作地方。为了加强这项工作，董把李忠孚（归绥县县长）调回指挥所，专帮助他搞起义活动。总之，通过与董先生这一段接触，我回忆董先生当时对和平解放绥远是坚决的。原因是他跟随傅先生多年，傅让他起义，他一定跟着傅走。另外，董也看到蒋介石集团大势已去，只有和平解放才有出路。而且每每表示，他和傅先生过去

也是爱国的，曾参加过北伐、长城抗战、百灵庙抗战，七七事变后，又参加了许多抗日战役。董先生还说，咱们过去对共产党人也是有好感的。抗战初期傅先生还请毛主席，派过共产党员潘纪文、王庆贞等同志，作过三十五军的政治工作，帮助改造过咱们部队，只是在解放战争中，跟上蒋介石走了错路。傅先生四月一日通电中说的那些，我完全同意，惟目下咱们处境十分复杂，必须慎重进行，否则内部分裂了，那就更不堪设想，他正日夜考虑这件事。

十天左右后，安春山、刘庸笙二先生来到归绥，带来了解放绥远的和平协议，主要是暂时维持现状，双方军队仍各驻原地，划定停战界线，先通火车、邮政，开设新华书店，文化交流，发展贸易，开办银行等。这个协议由董在指挥所召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安春山先生传达。事后听说有人反对，认为傅出卖北平，又来出卖绥远。虽然如此，这个和平协议草案已在部分人中间传播，但仍未公开宣布。

二、召开省府科长以上干部座谈会

我俩向董先生把傅敦促他早日起义的意思传达后，董分析了当时的军政干部思想状况，认为军队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必须把傅先生的期望向他们说明白，争取听他的话，听傅的话，走北平和平解放道路。他首先从地方干部着手，召开省政府科长以上干部座谈会，在会上向大家简单讲述了当时形势，请大家座谈“我们该怎么办？”参加座谈的人起初有六十人，开始多数人存在着一种关心时局的态度，来得很踊跃，后来逐渐减少到二三十人。虽然如此，董坚持每次都亲自参加，启发大家发言，关于绥远应走什么道路，仍未亮明他的态度。赵励师

说：“董主席，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请倒出来吧，让大家看看！”董只是笑而不答。从全场发言情绪看，听会的人多，发言的人少；有顾虑的人多，畅所欲言的少。只是积极拥护起义的骨干，如梁子材、张国林、寿跃南、王映荣、杜秦川、高映明、常佩三、卢健飞等人，以及从北平来的，能大胆发言，讲形势，谈看法，介绍北平解放前后在解放区的见闻。当时发言观点，多数人主张起义。认为东北解放，北平和平解放，淮海大战国民党又彻底失败，虽说华南、西北大片土地还未解放，但根据蒋介石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情况来看，以及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化、道德败坏、人心涣散、士气不振，国际上美国也靠不住等等，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对绥远前途的看法，多数人认识到，就是那么一点军队，解放军一打，不是投降，就是逃跑。有不少人认为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性强，部队政治工作好，士气旺盛，勇于牺牲，能攻善战；地方政权巩固，能代表穷人利益，为百姓拥护；地方干部艰苦朴素，军政配合很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走北平和平解放道路最为有利。会议上反对的是少数，但也很顽固。表现突出的有省府秘书长苏寿余、刘万春的一个师政工处长赵元德，以及张心坦等人。他们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说我们要的是公平合理的和平，不要屈膝投降的和平等谬论。对在会上发言中说些“人民”、“剥削”、“解放”等字眼也不满意，认为是替共产党宣传。更恶毒地是骂傅作义出卖了北平，为他自己立功，现在又想出卖绥远。在会议期间，董在每天晚上还轮流请科长以上干部谈心，巩固感情，为尔后率领起义创造了条件。

三、革新及革新学院简况

因为有了和平协议，董先生考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在座谈中再喊“剿匪”、“戡乱”，也不适合客观情况的要求；但要按共产党的政策、口号宣传办事，因还没有起义，也不合适。为此，遂想出标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既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有相同的地方，又可以隐晦地揭露蒋介石口头喊实行三民主义而实际不执行的罪行，所以他提出要实行三民主义，要革新，要把绥远变成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模范区。当时喊出这个口号，颇为新鲜，且易为广大干部所拥护。在此基础上，董认为可以逐步推行革新运动，作为走向起义的过渡阶段。于是，相应地成立了革新委员会，董其武自兼主任，由各部门负责人，特别是由积极拥护起义的人为委员。我记得的有：张立范、赵国鼎、常佩三、张淑良、张国林、卢建飞、曹善初、梁子材、王映荣、仇曾武、赵励师、荣祥等。当时正式提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作为行动纲领，编拟革新草案，计分政治经济、土地房产、时代认识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经过讨论铅印成册，颁令推行。为了训练干部，把绥远干部训练团改为革新学院，董自兼院长，刘万春副之（后因军事干部参加受训，刘未到职）。王乾元为教育长（原山西省阎锡山的军长，因不同意起义，未到职），卢建飞、曹善初为副教育长。卢管教育，曹管人事和行政事务，其下设办公室，郭纪梅任主任；辅导处处长张沧，崔维嶽任主任（相当于副处长）；教务处长张鸿恩任处长；总务处令狐登篆任处长；各处配备办事人员三、五人不等。管理学员的有总队，总队长令狐狸理；下设中队，每中队有中队长、中队指导员和分队长；班长

由学员推选。只有省政府各部门及各旗县抽派科长以上行政干部参加学习，先后办过两期，每期五百人，时间一个月。学习内容主要为革新草案，新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董先生的一些讲话等。

辅导处负责管理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学习情况考核，小组会，生活会，领导各队指导员进行工作。教务处负责分配课程，组织教课。我当时担任讲三民主义，主要是讲民生主义，还有董先生的一些讲话及李竭诚同志编写的关于起义好处的小册子等。学员食宿生活由总务处负责，人事由办公室专人负责，学员毕业由人事委员会分配工作，原则是各回原单位，并发给革新毕业证书。在此同时，董先生深感省府机关庞杂，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因而大加精简。只设民、财、建、教四厅和秘书、主计二处，由积极拥护起义、革新的干部担任厅、处、科长。奋斗报社从七月一日起，也只登载新华社消息，配合革新，推动起义工作。

四、蒋介石破坏起义，

傅作义先生来绥促成起义

蒋介石知道绥远在酝酿和平起义，因而百般阻挠，进行破坏。首先，调升董为西北行政长官公署任副主任，意在明升暗调。又成立第九兵团，让当时反对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孙兰峰任司令官，军队统一归孙掌握指挥，企图削弱董的军权，使董无力率领部队起义。但事与愿违，因为董领导的部队干部，就是傅先生多年培养的骨干，虽说部队经过改组，实际上部队还是听董的。当时孙、刘反对起义，以致起义通电迟迟不能发出。傅先生为了说服孙、刘，曾派他的老参谋长陈炳谦来绥说服，但走到张家口因敌又被叫回北平。八月间又派其原秘书

长王克俊来绥进行说服工作，王虽多次劝孙，仍未奏效。只见王每次与孙谈话回来，都表示灰心失望。有一次王给我说：孙今天不仅不顾大局，反而说傅先生过去重用山西人，重用董先生，对不起他，让董当主席，他是代理主席，等等。另一方面孙对傅当时在北京处境有怀疑，要亲自和傅见面。接着傅又派张濯清来绥，利用张与孙多年相好，便于劝孙起义，因张是回族又便于向刘万春（回民）进行工作。通过张、刘交谈，刘口头上答应，实际仍反对起义，孙仍坚持己见。不得已，张又回北平。至此毛主席才派傅来绥进行说服工作。傅来绥后曾在归绥、美岱召和包头市，与军队干部和地方高级士绅谈话，终于说服了孙、刘签字，通电起义。

五、中共联络处进驻归绥开展工作

为了执行解放绥远和平协议，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简称中共联络处）进驻归绥。联络处长潘纪文，主任鲁志浩，下分铁路、邮政、银行、贸易、新华书店等五个组开展工作。当联络处开始与原绥远省政府各有关部门配合开展工作之际，国民党特务们阴谋破坏，在联络处人员外出工作之时，将铁路组的秘书王士鑫同志，在毛织厂附近用手榴弹炸伤，因伤重牺牲。与此同时，还在满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呼喊什么“傅作义出卖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等反动口号，企图破坏绥远和平协议的执行。由于联络处人员感到没有安全保障，处长潘纪文当即向董其武先生提出抗议，并要将联络处人员立即全部撤走。经董再三挽留，只留下鲁志浩、曹文玉、柯树声三位同志，继续进行工作。这时的形势顿形紧张，董当即详电傅作义先生转报党中央毛主席。由于毛主席的指示，人心才安定下来。董

为了与联络处联系工作方便起见，绥远省政府又专设联络处，由康保安任处长，张国林任副处长，李竭忠，王景泰，张鸿恩为秘书。李管宣传，王管食宿生活，张管保卫。董还特从特务营派两个连住德王府，归张鸿恩领导，负责联络处的保卫工作。当董分配我的工作时，对我说：“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时时注意，严防特务破坏，再出问题和平协议就将付之一炬。”我领会了董先生的心情。那时，我虽然还任革新学院教务处长，但主要精力全放在联络处的保卫工作上，直到九·一九起义，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我是怎样由北平来到绥远的

苍 一 平

一、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王克俊先生多次对我说：“尽可能找到林彪系电台活动情况。”宇宙空间解放军无线电波信号很多，如浩瀚大海，何处寻觅（当时我虽然控制了不少解放军电台的信号，主要是根据电台彼此间联络情况和声音大小等判断是聂荣臻、罗荣桓、耿飚、杨得志等系的电台。林彪系电台从未听过）？况且，目前形势处于紧急关头，现有电台还听不出头绪，林彪系的电台更不易找到。但傅作义先生由于华北形势急转直下，平绥沿线被隔断，新保安、张家口处在危在旦夕状态，因而焦虑万分。最担心的是东北解放军入关，而解放军究竟在战略上作什么部署，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各方面的情报真伪难辨，部队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因此，傅先生仍想借助于我这个电台获得些可靠资料。岂不知今非昔比，我这个电台也束手无策了。但当时我也确实听到有大批电台，声音不大，每天上午出现一次，与各台联络之后，就通知对方“我们很忙，明天再见”。根据以往的判断，所谓“很忙”，意即移动。但这究竟是何处电台，向何处移动，就不易判明。当时我暗自思忖：这是否就是林彪系电台向北平方面挺进？因事关重大，又无确切把握，当时的这种情况没有向王报告。时隔半月之久，突然出现了很多声音宏大、联络情况紧张的电台，我等为之十分震惊。王对我没有完成任务非常生气。但已无法挽回了，徒

唤奈何而已。那时，张家口、新保安相继解放，北平西郊吃紧，傅的总部仓皇由西郊撤回北平城里。大势已去，北平已被包围。

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六日，王克俊先生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回去立即准备好收发报机各一部，并挑选技术好的报务员，跟你一同去天坛机场乘飞机到归绥。”我惊奇地问：“去归绥干什么？”王说：“先勿问，去了就知道。”并说：“你们先去，过几天我们也去。我们去归绥的事要守秘，只说派你去有任务。”谈话就此结束，王急匆匆地办别的事去了。当时我很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除抄收新华社电台新闻外，其余工作全部停止，只等待和平谈判的结果。每个人关心的是个人切身利益，对将来的前途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况且家小都在北平，扔下不放心。但是转而又想，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况傅、王先生待我都好，在此紧要关头，不能只顾家私，应服从调配。

元月二十七日我们携带机器去天坛飞机场。一连三天都因没有飞机，走不成。最后的一天上午，天坛机场的朱参谋通知大家说：天坛没飞机了，今后不要再来来了。

元月三十日上午，我到中南海办公室，向王报告走不了的情况。王正在和参谋长李世杰、曾延毅等人议事。此时王回过头来见我在一角坐着，问我：“一平你没走。”我说：“天坛机场朱参谋通知没飞机了，走不成。”王叹了一口气说：“走不了，算啦。你把机器交给通讯科，回去吧。”

当天晚上电台人员来看我，知道我没走，大家很喜欢。张寿轩说“咱们成了一百斤重的老母猪，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死活在一块，活一天玩一天，来吧，打八圈（麻将牌）。”我们玩到半夜，突然有人叩门。开门进来的是总部通讯员，传

达说：“王秘书长请你立即去总部。”我即随车前往。见王神情忧郁，对我说：“你马上去通讯科找周科长领五部好收报机，一部发报机。赶快领，领来再说。”我见王情绪沉闷，不便多问，立即遵照办理。经与无线电修配厂刘怜生领到美式收报机四部，自制收报机一部，十五瓦发报机一部。收集齐备向王交代。王转告他的通讯员说：“给苍台长安排休息。”此时，城内仍枪声乱响。总部整夜灯火通明，人人神色紧张，有的整理文件，有的打捆行装，有的往返走动，有的窃窃议论，几乎整夜没有人睡觉。我见到一个总部机要员，悄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明天解放军进城呀，咱们明早全部移驻西郊。”当时，我以为我也去西郊。

凌晨五时许，我见了王克俊先生。此时，他的办公室还有副官处处长王景泰。王对我说：“你随王处长乘天雄号飞机去归绥。把准备的机器全部带上。你们先去，过几天我们也去。”我说：“我什么也没带，家中也不知道。”王景泰说“去了归绥什么也有。”又说“家中有人转告，你放心走吧。”我只得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听从了分配。遂即乘车驰往天安门机场，匆匆登上了天雄号飞机。此时，天色麻麻亮，马达轰鸣，飞机起飞。王景泰对我说：“注意下边是否打枪。”我说：“听不见”。王说“大概没事了”。同机还有樊折桂。

元月三十一日早八时许，天雄号飞机平安飞抵归绥机场。董其武先生误以为傅作义先生来绥，亲临机场迎接。

从此绥远省政府电台与北京西郊电台联系频繁。约十天之久，王景泰经常与董秘密议事，天雄号司机受到高级款待。不久王景泰去了一次南京，回来，天雄号飞机不再久候就飞走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董其武先生委托我办一个无线电训练

队，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不久，就在归绥新城关帝庙街成立了无线电训练队。由绥干团青训队选拔了六十余人，还有其它部门推荐来十人共七十余人。其中女学员七人。我任队长兼技术教官。省政府电台台长李民选任副队长。原计划学习期六个月，后来由于绥远起义缩短为五个月。

二、绥远“九·一九”起义

安春山六月间已来归绥。他名义上担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实际却在暗中策动起义。八月间，王克俊、刘庸笙等从北平来绥促进起义。王对我说：“绥远情况复杂，起义阻力不小。你适当做些对起义有益的工作，利用无线电训练队架设的电台，收听孙兰峰、刘万春电台与兰州电台的联系情况。”

收听孙兰峰、刘万春电台情况的事，没有郑重其事地进行，也没有抄收往来的电报。只是大致收听了些联络情形，没有写过书面材料。进行过几次口头报告，王催得不紧，我也没有认真收听。

九月初，傅作义先生来绥慰问部队，带着大批银元、布疋。傅来绥后给了我如下几项具体任务：

- 1、抄收中央社广播新闻；
- 2、侦听军统特务张庆恩在包头的电台活动情况（张庆恩是破坏绥远起义的最大策动者）；
- 3、帮助北平回来的电台与北平西郊电台的联络。

九月上旬，我随傅作义先生由美岱召到包头。按照王克俊先生的指示，我对军统特务头目张庆恩在包头的电台进行了彻底清查，并在起义前悉数查封。收听台湾广播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一九五〇年五月份才结束。让我收听台湾电台广播

当时傅先生可能有两个用意：一个，看看国际形势的发展；二来看看对他有什么评论。

九月十七日上午，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飞抵包头，傅先生在包头南门外皮革厂的办公室接见了，时间不长。事后获悉徐携蒋介石亲笔函邀傅同往。傅毅然拒绝。徐乘原机十九日上午飞走。听说张庆恩、魏纯美等同机逃走。傅先生偕孙兰峰先生等同车赴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翌日宣布绥远“九·一九”光荣起义。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绥远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 参加“九·一九”起义经过

尔 萨（整理）

绥远后勤兵站系统，是傅作义、董其武十几万绥远军队的总供给部门。它的任务是保证部队武器、弹药、给养的供给，是一个管钱、管物、管枪炮弹药的重要单位。这个单位有所属工厂（被服）、仓库（弹药、武器）、粮秣以及运输系统，因此地位非常重要。在绥远起义和反起义的斗争中，在这里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是敌我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一九”起义前后绥远地区 后勤兵站机构设置演变情况

第七兵站总监部移至张家口以后，在原绥远地区设置了一个“包头指挥所”，它的任务是指挥绥远地区后勤兵站机构，负责对张家口方面、榆林方面的物资调运。这个包头兵站指挥所，受第七兵站总监部领导，同时受绥远主席兼绥远军队指挥所主任董其武领导和指挥。

当时在归绥设有一个第二十四兵站支部，这个单位负责绥远地区董其武指挥的军队的后勤补给任务。在榆林设有第二十五兵站支部，这个单位负责榆林地区邓宝珊所指挥的军队的后勤补给任务。当时第二十四兵站支部上校支部长江声（此人于一九四八年因贪污案被撤职），第二十五兵站支部上校支部长

田节山（此人于“九·一九”起义后调第二十二兵团后勤部，参加抗美援朝，以后听说转业到山西某地工作）。

第七兵站包头指挥所，在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秋，由王度以参谋处长职务兼任，一九四八年秋，王度奉命接替第二十四兵站支部上校支部长后，该指挥所即由第七兵站总监部少将副监马良弼负责。这时马良弼全权代表第七兵站总监部，对绥远地区后勤兵站机构发号施令。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原绥远军事单位与北平方面联系中断，这时后勤兵站单位则受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部领导。一九四九年四月以第七兵站指挥所为基础，组成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这个单位受董其武直接指挥，归第八补给区领导，负责绥远地区反动军队的后勤供给任务。当时三十二兵站少将分监是马良弼。王度任该部上校参谋长。一九四九年六月，马良弼乘飞机返往兰州，途中飞机失事，坠毁于甘肃会宁毙命。由此王度接替了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职务，直到“九·一九”起义。

二、孙兰峰、刘万春向董其武

争夺后勤兵站的斗争

绥远地区的后勤兵站机构，是归董其武直接领导指挥的。王度和董其武关系也较好。在这一斗争中，王度向董其武亮明了态度，站在和平起义、跟共产党走的一边，所以董其武对王度是信任的。在起义问题上，董其武对这个后勤兵站是有把握的。一九四九年六月，马良弼因飞机失事毙命后，董其武任命王度为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这时有个原北平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少将运转处长王禹廷，他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回到兰州的，曾一度活动想来任这个兵站分监，但董不同意，仍由王度接替

了这个兵站分监职务。这也是董其武为了控制这个后勤兵站所采取的措施，所以让王度当这个兵站分监。

孙兰峰在张家口解放后回到绥远，一面想招兵买马，一面也想控制这个后勤兵站。孙兰峰到归绥后，曾专门找王度谈话，他想向王度了解兵站库存物资的情况。对王说：“你看董其武在搞什么名堂？搞得乌烟瘴气，你不能跟着他跑，以后要跟着我干。”这时王度一面敷衍他，一面把孙兰峰的意旨向董其武汇报了。一九四九年×月，孙兰峰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后，他更进一步想把这个兵站抓到手。他曾经专门请王度到他家便宴，以示亲切，进行拉拢。席间他再次表示，希望王度跟着他干。他对王度说：“咱们已经成立了第九兵团，将来绥远部队都归我指挥，你这个单位也要归我指挥。”王度说：“这要向董请示，如果他下令，才可以。”这事王度及时向董其武作了汇报。这时起义已经很快要实现，王度当然不会跟孙跑了。孙兰峰两次拉王都没有把王度拉过去。

刘万春也想把兵站抓到手，因为这里有钱、有枪、有粮、有弹药，他对于当时的后勤兵站机构则采取压的手段，想让王度屈服于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刘万春就把自己的堂弟刘××安置在第二十四兵站支部任中校交通主任，以控制兵站运输权。王度接任第二十四兵站支部上校支部长后，就感到刘万春的压力，而刘××则仗其兄的势力，飞扬跋扈，不听王的领导。后来董其武就把刘××撤换了，派杨庚德接任交通主任职务。从此王度也就和刘万春有了隔阂。“九·一九”起义前，刘万春就经常在供给问题上找王度的岔子，想要这个兵站屈服于他。但由于董其武对王度的支持，他未能得逞。“九·一九”起义后，刘万春心怀叵测，想要强取后勤兵站库存物资，充实他的部队，伺机反共叛乱。一九四九年十月，起义不久，就要王

度把物资交给他，王不答应，他就派了一个团，包围了陕坝的兵站仓库，要强取物资。当时陕坝兵站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坚守，双方僵持不下。王度请示了董其武，董其武对王度说：“刘万春你是知道的，给他一些服装好了。”结果刘万春强要去几千件皮大衣和军毯。这样刘万春还不满足，又要瓜分归绥地区物资。经请示董其武，董说弹药不能给，可以给些服装，结果又拿去许多被服装具，才算了事。

三、绥远兵站在“九·一九”起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中，选择了走人民的道路

张家口、天津解放以后，北平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时酝酿和平解放的呼声也影响到绥远方面。这时，绥远人心惶惶，在注视着北平的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同时，绥远部队内部逐渐形成起义和反起义的斗争。

以董其武为首的即傅作义嫡系部队，如第七师张世珍部是肯定跟傅作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以刘万春为首的如鄂友三、张朴等极端顽固派，则反对和平解放，妄图继续顽抗，或准备向西逃窜。这个斗争甚为激烈。以潘秀仁为首的一些特务、国民党党棍，则挑拨离间，造谣破坏，极力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这就形成了起义和反起义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绥远的后勤兵站选择了坚持跟董其武将军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亦即跟中国共产党走解放的道路。

当时兵站的头头，从张家口第七兵站总监部工作开始，就直接参加了反共的罪恶战争。这样就有一些机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真实情况。如从被俘释放人员那

里，了解到共产党受到人民拥护和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杀俘虏的一些情况。大部分人开始解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并产生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互相对比、究竟谁是谁非的想法。虽然这种思想现在看来是极其幼稚肤浅的，但对王度等这样一些人来说都是思想转变的一个开端。特别是自一九四七年以来，王度等经常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听到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和对国民党军队的号召，使他们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

王度等并非傅、董嫡系，他原属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人员。但傅、董对其印象较好，尤其是和董其武因工作上的关系，因而在私人关系上也比较接近，因此可以直接公开谈论和平起义的问题。这是当时绥远地区后勤兵站机构能够参加“九·一九”起义的一个条件。

四、除夕撤退时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夕，在旗下营一带，绥远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发生局部战斗。这时绥远省建设厅长、大特务潘秀仁，利用这个机会制造混乱，煽动归绥国民党军政机关西逃，妄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潘秀仁要挟董其武，以绥远省政府名义，通令归绥军政机关立即上火车撤到包头。通令说：“火车已经备好，立即开赴包头，去留听便，请勿自误。”这时归绥军政机关形成一片混乱。

当时，王度是驻归绥的第二十四兵站支部上校支部长。接到这个通令以后，马上召集了紧急会议。会上王度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管好仓库物资，不得乱动。这时兵站站长熊敦乾质问王度说：“你说国民党就要完啦？”王度说：“肯定是完啦。”

交通主任杨庚德质问王度说：“你说没有命令不能走，现在不是有命令了吗？”王度说：“这不是董先生（指董其武）的意思，而且是去留听便嘛，所以我主张留。”王度还说：“日暮途穷，一味西逃，只有死路一条。坐守归绥，还会有出路，如果解放军进城，我王度领你们去欢迎。”经过这一场辩论，大多数人同意王度的意见，坚守岗位决不轻举妄动，并作了万一解放军进城就欢迎的准备。当时汽车修理厂的刘澄，坚决要走。他说：“怕吃小米饭。”那时王度等只好同意他走了。其余人都定下心来，没有什么波动。在这次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王度等亮明了观点，也通过这次事件给群众作了思想工作，同时也就公开表明了后勤兵站在这场斗争中的立场。通过这次事件，也为后来后勤兵站机构能够完整地参加“九·一九”起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内部 对起义问题的斗争

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官兵在起义问题上，一般都认为大势所趋，没有多大阻力。但主要是，当时兵站分监马良弼反对起义，不愿跟共产党走。马良弼自从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开始酝酿起义，即对形势表示不满。这一时期他虽身为兵站分监部的领导人，却不肯留在绥远，经常乘飞机去兰州、上海，每次回来呆不了十天八天，又坐飞机离开。他就是怕绥远起义，把他留下来。三十二兵站分监部成立不久，他就下令将分监部移到了包头。马良弼还下令将家属西迁，以便随时逃跑。王度仍留在归绥，负责归绥方面的工作，不同意马的做法。起义前，王又

将去包头的家属接回，又把兵站分监部迁回归绥。

马良弼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由兰州回绥远。这时绥远起义大局已经十分明显，他向王度表示：“宁跳黄河，也不跟共产党。”王度说：“我宁跟共产党走，也不跳黄河。”这样领导人之间就存在着根本分歧。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马良弼匆匆乘飞机再去兰州，中途飞机失事毙命。马良弼的死，为后勤兵站机构参加“九·一九”起义消除了一个最大障碍。

“九·一九”起义时，绝大多数后勤兵站官兵均顺利地参加了起义，只有少数人不愿参加起义，在起义前后自动离开。离开的人记得有：

参谋科中校科长刘剑萍，浙江人，回浙江原籍去了。

中校运输大队长赵应九，陕西人，去了兰州，听说和王禹廷在一起开面粉厂。

少校运输队长师长庆（又名师宗先），不愿参加起义，并说“你们这样干，太可惜了”。此人回河南原籍，在家不安心，一九五八年盲流来内蒙作临时工，被精简后又去集宁，经劳动部门分配到岱海渔场当工人。

少校副官李亚铭，山东人，起义后自动离开。听说他赶着一辆大车回山东原籍去了。

六、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参加 “九·一九”起义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三十二兵站分监部所属官兵在思想上，已经搞通，愿意参加起义，跟共产党走，当时较有把握地领导所属官兵全部参加起义。

王度对董其武早已表示了态度。傅作义来绥远解决起义问

题，王度去美岱召晋见过一次，表示兵站官兵的意愿，听从傅作义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九·一九”起义时，由王度代表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全体官兵，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后勤系统从此脱离了国民党反动派，走向光明的道路。

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一九五〇年一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供给部，合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供给部。

一九七九年九月

“九·一九”起义在河套

董炎炳

解放战争年代，国民党绥远军政各界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通电起义，到现在已经三十周年了。这一历史事件所以有其重大意义，就是因为它在国内解放战争中，响应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的号召：今后解放全国战争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当时绥远虽然尚未解放，毛主席却根据战争发展条件，英明地确定了和平解放绥远的这一方式。当时只是由于国民党内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致使和平起义的时间推迟了一些。这一起义使原绥远地区祖祖辈辈受压迫被剥削的蒙汉劳动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避免了战争破坏和伤亡，挽救了数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使他们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反革命倒向革命，给尚待解放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走光明大道树立了榜样。回顾我自己的一生中，由于能够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党、毛主席才赋予了我第二次生命。抚今追昔，感到无限荣幸！兹值“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之时，虽然自己当时所处地区偏远闭塞，陋闻寡见，但回忆起当时所在基层有关起义和反起义斗争的情况，也愿笔录史实，以供参考。

一、解放前夕，河套民穷财尽， 劳苦群众渴望早日解放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米仓县原是河套产粮较多的地

方，大体情况和当时河套五个县大同小异。

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曾以河套为根据地，作为原绥远省的军政中心，进行抗日战争。河套人民历尽艰辛，出人、出粮、出款，直至抗日胜利时业已精疲力尽！但由于那是抵抗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人民没有怨言。不料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却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傅作义助纣为虐，继续在河套抓兵要粮，横征暴敛，致使河套民穷财尽，成了人间地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当与民休养生息，而傅作义为了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战争，仅只一次，就把河套全部青壮年男子征集走了。甚至连四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也剃去胡子强迫充当了壮丁。当局为了沽名钓誉，说是为了安置家属，每抓一丁发给家中二石糜子，一丈二尺土布。河套人民为了抒发不满和愤怒，通过歌谣、爬山调的形式来喊冤诉苦。人民对国民党抓兵编唱出：“两石糜子丈二布，老婆交给保队副；保队副，养不住，乡长、干事随便住。”人民对国民党的抢粮唱出了内心的怨谤：“租上牛、种上地，卖了老婆打统计；打的打，吊的吊，临完给个储蓄票，三年五年没人要。”农民所说的“统计”，就是指的国民党征购粮。另外还有征实和征借粮。只有征购粮说是给钱，但不给现金，硬叫储蓄，其实也是白要。不但三年五年没有还，解放前夕，连“法币”、“金元券”也没人要了。

河套虽是富饶之乡，由于抓兵、征粮，而给农民留下的只能是“糠菜半年粮”，他们用爬山调唱着：“二饼子车圪楞楞响，不知吾哥哥来拜望；早知道吾哥哥来拜望，我给吾哥哥蒸糜子窝窝尝”。所称“吾哥哥”指的是知心的亲友，糜子窝窝就是待客友的好食物。农民住的是“一门一窗，人起炕光，地下有个水缸”。穿的是“白天穿，晚上盖，阴天下雨毛朝外”

的破皮衣一身。人民尽管已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仅有五原、临河、陕坝几个小的城镇内尚有些商业和住户还较殷实，但在一九四八年冬，原住包头的国民党邓宝珊和冯钦哉率领的残兵败将，在向西逃窜时，途经河套五原、陕坝、临河等地时，大肆抢劫，给后套人民带来的更是雪上加霜；群众编的顺口溜是：“两个老汉①一百三，把个后套抢了个干；两个老汉一百五，把个后套害了个苦。”劳苦群众实在到了走投无路、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所以在解放军一度解放包头的影响下，在狼山县的石城西一带，曾发生了群众自发地到仓库抢分粮食的事件。人民普遍渴望早日得到解放。

二、“九·一九”起义前后，主张和平起义的革新派和反对起义的顽固派，在河套地区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宣告“引退”。二月一日，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孤立在这遥远的国民党军政残余，是响应共产党毛主席的号召，走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呢？还是顽固到底，跟上国民党反动派走死路呢？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便形成了主张和平起义的革新派和反对和平起义的顽固派。另外当然也有态度不明，等待观望的中间派。中间派人数虽多，而是看风使舵，不是主要阻力。

在一九四九年的二月间，绥远省地方实力派的潘秀仁、张遵民，跑到绥西陕坝，说是奉令要成立绥远省政府绥西行署，由他二人分任正、副主任，任务是要重新经营河套，继续与共

①两个老汉——指邓宝珊、冯钦哉

产党为敌。其实是他们在归绥呆不下去了，跑到河套，观察一时，如形势对他们有利，便妄图卷土重来，否则也便于逃跑罢了。行署成立之后，于三月末，在陕坝召开了绥西行政会议。参加人员主要有各县正副县长，参议会会议长和地方绅士四十余人。会上要统一认识，整理河套，执行省府政令，贯彻反对和平起义的目的。但是他们没有料想到临河县长樊库在会中发言时公开提出：“现在吃得开的人应当是戴草帽的，而不应再是戴礼帽的了。”这就在会上引起了一场论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冲击了顽固派在会上想要达到的目的，激怒了行署潘、张二位主任和地方绅士们。后来张遐民在一次谈话时说：“共产党卖国。如果不卖国，我们还不如投降共产党好。”随即气极败坏地利用还在手中的职权，把临河县长樊库撤职了。当时由于行政上有潘、张两个顽固头子，驻军态度不明，显然反对起义的势力尚占上风。解放军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后，潘秀仁看形势不妙，借口到广州去要经费和军火，逃跑了。张遐民随后借口要到银川去治病，也逃跑了。同时还有从绥远省里来了一个教育厅长苏挺，说是到陕坝来视察学校的，也不知视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此形势大变，舆论哗然，和平起义之风占了上风。但当地驻军态度依然不明，顽固派的余孽和国民党特务及地方士绅，仍在不断破坏，还不能公开宣传和平起义的意义。后来省里虽然派有原民政厅长王则鼎继任绥西行署主任，但因病未到职，行署名存实亡。河套专署也早已不起作用。一时出现混乱现象，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日趋激烈。

解放前夕，在河套地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的情况，除了广大劳动人民渴望早日得到和平解放外，军政权力大体是五原、临河和米仓县掌握在革新派手中；安北、晏江和狼山县大体掌握在顽固派手中；陕坝镇是个混杂地方。根据当时的情况，虽

然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在绥远省军政当局，而地方军政如果不听命和响应，作好思想组织准备工作，在地方上也难免造成一片混乱，各行其是，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一次浩劫。在地方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军队。在河套的武装力量，除各县的保安队外，还驻有一个属于省级的保安师，态度不够明朗，对起义起着不良的影响。这个师保民不足，害民有余，为非作歹，军纪败坏。驻在我所在的米仓县是其所属的一个保安团，团长姓胡，群众叫“胡日鬼”。其所属一个营长的老婆，到梅令庙省立农业中学看学生演戏，因为群众不认识是营长的太太，没有给让坐，太太生了气，就叫来一连军队，持枪向演戏学生冲杀。当场有两名学生受伤，刺刀从臀部刺入二寸多深。学校当局将受伤学生抬到米仓县府。“县官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我哪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呢？正如临河县长樊库谈过，驻临河县的军队曾在“人头上跑过马”，比这个闹得还凶！

迨至六、七月间，绥远省革新委员会召集我们县长一级行政人员，到归绥市麻花板革新学院参加革新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实质就是给和平起义作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其间由康保安等人，私下给我等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到了解放区来的报纸。临回河套时，省革新委员会指由张立范、康保安，还有一个姓南的三个人，在省府主席办公室西边的小房内，召集河套地区我和刘惠之县长，布署和平起义时组织联系和宣传的策略，每人给携带了《为什么要和平》小册子200份。这就在思想和组织上，给我们响应和赞助和平起义准备下条件。我们回县后即着手串联，形成一个领导核心，控制地方武装力量，选送一部分人员到革新学院学习。同时也接来一部分分配到米仓的革新学院毕业生，分配到乡镇工作就叫革新干事。按照上级指示，革新干事每星期

集中学习一、二次，实际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掌握地方基层的动态。因为和平起义是一件重大的变革，来的突然，除了顽固派的破坏以外，一般的思想赶不上，阻力较大，所以就用“革新”与“和平”来作为代词。顽固派说：“和平起义就是‘投降’、‘背叛’，是人生莫大的耻辱”。革新派说：“共产党是代表劳苦人民大众的，向人民投降，背叛反动派国民党，不当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看家狗，正是由黑暗走向光明，是人生莫大的光荣。”

三、“九·一九”起义由黑暗走向光明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先生在包头率领原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四万多人起义了。通电发出之后，毛主席当即回电：“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一声霹雳，消息传到绥远各地，同时也传到我所在的最西边偏远而闭塞的米仓县。首先是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人民大众得到解放了，欢喜若狂。深陷泥淖几乎难以自拔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得救了，一片欢腾。当然那些顽固不化的余孽和国民党特务，为大势所趋，不敢作声，只能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向隅而泣。我和正在米仓的省田粮督导员李世云，联名代表米仓县起义的军政人员，向董其武先生发了通电，表示拥护。同时在米仓县举行了“九·一九”起义的庆祝活动，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激动而感激的心情，第一次在米仓县呼出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的欢呼声、锣鼓声交织成为人民欢乐的最强音！在当时谁会画毛主席的像，谁收藏有《东方红》歌本，就成了最红的人。连夜学习东方红歌曲，学习扭秧歌，准备及早举行庆祝“九·

一九二九年”起义大会。为了使参加的人达到普遍而隆重，从乡间选邀劳动好、单产高的农民代表，到县参加了庆祝大会。原来米仓县就是现在杭锦后旗的三道桥，如同一个较大的村庄，但那次参加庆祝大会的人就达三千多人，真是盛况空前。

一九七九年五月

解放前夕 武川一片混乱

赵淑普

武川县在一九四九年初，由于县政府曾在一九四八年冬一度撤离县城，各区乡的行政系统陷于混乱。加上孙兰峰在张家口解放后率领察北地方团队和部分残余正规军退驻县境，就形成了极其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下，人民遭受了不堪言状痛苦。直到“九·一九”和平解放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秩序。

孙部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左右由察北沿着草地退到武川的。所率察北地方团队有张北、宝昌、新民（即化德）、尚义等县的所谓“清剿团”和以察盟盟长色楞那木济勒为首的蒙旗部队；正规军有在张家口解放战争中受了严重打击、溃不成军的骑五旅、骑十一旅、蒙骑三纵队、暂骑二旅，以及苏和巴图尔率领的据说是在辽沈战役中逃逸西窜的新骑一旅等部的残余部队。原在张家口外围驻守而在解放张家口战役中未受严重打击的骑十二旅——鄂友三部，也随孙退入了武川县境。总计各部骑兵约有八九千人。这些部队大部分原来的纪律就不算好，到了武川表现得更差。所到之处，人吃马喂，毫无限度，翻箱倒篋，开仓掘窖，抢东西、找粮食成了普遍现象。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的事件不断发生。孙虽几次召集各部队官长开会，号召整顿纪律，但只限于口头上说一下，并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也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当时老百姓反映：“孙的部队是官土匪，行为之坏，一般土匪都比不上。”武川老百姓受这些部队的

骚扰，眼看不能生活下去，起初成群结队到县城请愿，要求把这些部队整顿一下，以安定地方秩序。但是事实表明，部队的纪律依然很坏，甚至由于掌握了驻地及其附近各村的情况，更可以有计划有把握地为非作歹，所以纪律之坏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老百姓看到请愿无望，不得已就往四处逃难。县境南部的逃到归绥（现在的土默特旗）沿山一带，县境北部的逃到四子王旗和达尔罕旗（今达茂联合旗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全县范围内纷纷逃难的悲惨景象。幸而在春耕开始后，这些部队逐渐西移，其中属于蒙旗的大部分脱离孙部逃窜阿拉善旗，就这样先后撤离武川，老百姓才得重返家园，从事生产。否则这种悲惨景象尚不知伊于胡底。

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各部队长仍旧千方百计地保存实力，以备东山再起，而对老百姓的疾苦，则都置若罔闻。他们为了把握实力，以作垂死挣扎的资本，不断干着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和利用权势搜括民财的勾当，充分表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恶劣本性。我当时在武川充任县长，对于这些情况略有所知，现在仅把犹能回忆起来的几件事叙述出来，对于撰写和研究解放前内蒙古地方历史时揭露旧社会黑暗面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孙部的军事安排和孙、董之间的矛盾

张家口解放时，孙兰峰以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没有几天就被解放军击败，所辖部队几乎全部溃灭，孙本人只身逃出，途经察北时就把各县的“清剿团”和张垣突围的残余骑兵集合起来，向西撤退，企图重振旗鼓，反抗到底。孙部到达武川以后，就利用他在抗战以

前曾驻防数年，人地均熟的有利条件，决定以武川为基地，整理其所率部队，重建实力。一方面，给伪中央打电报取得联系，要求急速予以补给；一方面，利用新骑一旅、骑五旅、骑十一旅的番号，把所率各部分别编入。原骑五旅旅长卫景林，由孙下令派充十一兵团副司令官，所遗骑五旅旅长缺由骑兵总队总队长安恩达接充。原骑十一旅旅长胡逢泰没有随孙西来，就派暂二旅旅长陈秉义为该旅旅长。苏和巴图尔仍任新骑一旅旅长，把蒙骑三纵队合并于该旅，纵队司令宝贵廷被派为该旅副旅长。兵团司令部的人事也作了新的安排，如将察北专员白震派为政工处长，察哈尔田粮处督导陈宝全派为军需处长，其他处室也多委派新人负责。在安排军事的同时，搭起了察哈尔流亡省政府的架子，派原察省府秘书长曾士先为秘书长，省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也多委派新人担任。为了相机挺进察省，还委派孙最亲信的原察省保安团长李维业等四人，分任察省四个专区的专员。在人事安排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些风波，如卫景林坚决不受副司令官的头衔，原骑五旅团长杨占山因没有当上旅长就愤然径率残部投归了董其武所统率的骑十三旅，兵团参谋长贾瑛坚决不到驻地工作，原察哈尔省府避居归绥等地的委员、厅长都没有到武川与孙共患难。这些情况使孙及其左右幕僚大感不快。孙部正在整编的时候，忽传十一兵团的番号已被国民党中央撤回另给了别人。孙听到这个消息颇为震怒，曾对人表示：“我这兵团司令官是蒋总统委的，别人就能随便取消了吗？”经过很长时间的函电交涉和大特务头子张庆恩的帮助，取得了第十一兵团的番号，以后，他才安了心。

孙部到达武川以后，原希望与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所部享受同样待遇，起码应由兵站发给粮饷，但经向董其武和兵站负责人交涉，始终没有结果。所以孙的部队

在武川各自直接向地方征发给养，很自然地造成混乱局面。孙对自己部队没有得到与董其武所部同样补给，很不满意，认为董其武有意削弱他的实力。但实际上据我所知，董不但没有削弱孙部的意思，相反的对孙部却非常关怀。我记得当孙部到了武川边境时，董即欲亲自前往迎接，只因当时军务旁午，片刻难离，才没有前去。孙到武川县城之后，董即时以电话慰问并恳切邀请暂到归绥休养，同时商讨应付时局的重大问题。孙到了归绥，董赠送很贵重的防寒衣服，在食宿招待方面殷勤备至。对孙部的补给问题，除兵站原来补给单位没有这些部队不能拨发粮饷外，董在其能够直接动用的物资范围内，凡发给自己部队的，也同样发给孙部。董为了表明对孙部和自己部队一视同仁的态度，做到经济和财政公开，为获得孙的谅解起见，曾在指挥所内建立经济委员会，推选孙为主任委员。但是孙的企图不止于此，所以仍不满意，因而对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未置一言，就返回武川。

孙由归绥回到武川以后，仍按照重整旗鼓、建树实力的意图进行工作。这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董其武一面秉承傅作义的意旨维持现状，等待绥远问题的和平解决，一面与国民党中央函电联系，也作必要时向西撤退的准备。孙在这个时候认为，北平和平解放，傅已上当；董其武一味以傅的马首是瞻，更为不智，所以对董的做法很不同意。他常对人表示，在绥远能呆就呆，不能呆就撤退青海，并且曾激愤地说：“我有这些骑兵还怕什么，满可以马踏青海。”听到这种说法的人都有“青海人民何负于孙，竟欲马踏他们”的感叹。孙在驻守武川期间，常发牢骚，总说董其武对他歧视，不给他的部队想办法。兵团司令部的人员，只有白震等少数人谅解董的处境，同情董的做法，认为除了随着等待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外，再无别的出路。

其他人员则均异口同声地埋怨董其武不照顾他们，对不起旧同仁。

十一兵团在武川重建司令部之后，即将部队调集县城附近和以西地区。但骑十二旅仍留驻乌兰花一带。刚过了春节，解放军的骑兵部队对骑十二旅展开攻势，该旅未敢抵抗，乃沿草地向西撤退，解放军跟踪追击，骑十二旅的那银泰连乘机起义。董其武听到这种情况，甚为焦急，用长途电话命令该旅旅长鄂友三赶快集结所部进行抵抗。鄂本无心作战，但为了应付董其武，令其团长李存英率兵两连据守武川西北的二份子，并对李说明其余各团连作为机动部队，随时策应。不料鄂率大部迳退武川西部山地，避开解放军的进路，根本未作策应李部的布置。李部在二份子孤军抵抗，不到半天时间即被击溃，李本人落荒逃出，几乎被俘虏。这个时候，孙兰峰鉴于解放军攻势猛烈，自己的部队没有战斗力，武川县城岌岌可危，经与董其武商定，由董派暂二师——赵晓峰部，乘汽车前往增援。迨赵部到达武川，解放军已攻克二份子回师东返。赵部在县城以北的六合营、召河地区布置截击，部署还未完毕，而解放军已越过防线到了武川和陶林一带（现在的四子王旗南部和察右中旗），赵部即返县城。经过这一战役，孙看到自己的部队纯系乌合之众，欲留暂二师久驻武川，但董其武坚决不允。孙在电话上大发牢骚，最后摔了耳机，大骂董其武不讲道理。暂二师终于遵照董的命令开回了归绥。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董其武逐渐看到，国民党军队彻底被消灭已成定局。就他本人和所领导的军政集团的利害关系来说，长远问题只有听从傅作义的指示，等候和平解决，别的打算都是没有前途的。尤其自傅作义发表了“四·一”声明后，董其武走向和平道路的态度逐渐明朗，孙对董的做法更

不同意了。从那时起，经常表示很难与董同道而行，所以积极布置向察哈尔挺进。当他由武川移驻包头的时候，令其最亲信的原察省保安团长李维业，率部二百余留在武川县城以东接近解放区的地方（当时武东^①绝大部分已属解放区），一面扩充力量，俟机东进，一面破坏解放军暂停向绥西进攻所形成的和平相处局面。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傅、董派代表与解放军方面签订了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南由归绥东部的古力半乌素起，北至乌兰花东北部的阿拉善图止，为双方互不侵越的界线。而李维业部经常在界线两边活动，进行破坏勾当。因为李部的破坏行为，引得解放军几次向武川县政府提出抗议。李维业看到解放军方面严格执行协议，他虽越界活动也引不起双方的重大冲突，乃乘解放军蒙骑四师在阿拉善图附近驻守放马之际，派队深入蒙骑四师的马群，将乘马赶回二百多匹。李维业自以为立了大功，即挑选了四十多匹好马亲自带至包头，一面表功，一面送礼。听说李维业做了这一手，颇受兵团司令部的赞扬。董其武对李维业破坏和平协议的行为，虽曾感到不安，但为避免引起孙对他更多的误解，当时没有进行处理。直到“九·一九”前夕，傅作义来绥主持起义时，才面示董其武将李维业逮捕，结合扰害地方的罪行，经过军法审判，执行枪决。

二、有关军风纪的一些事实

由察北退到武川的反动部队中，有不少的人染有烫大烟，

^①武东——解放战争末期，绥远省人民政府曾设武东县，原属武川县的东面区乡为其辖区，一九五二年撤消，仍归察右中旗统辖。

吸大烟的嗜好，凡是他们住过的地方，就拆毁老百姓的建筑物取出木材，以作烫大烟用的燃料。武川是个不产木材的地方，除人住房屋以外的建筑物原来就不多，几天功夫就被拆除殆尽。他们在驻地感到木材缺乏，每次出去，遇有机会就搜集碎木屑装在背包内，准备随时使用。起初人们看见他们的背包累累，以为装的是干粮和文件，日子久了，才知道里边尽是碎木材。

在那年的阴历年前，这些反动部队已结集到武川县城附近地区。他们在阴历年除夕，不约而同地以鸣枪取乐。起初仅响步枪，后来连机关枪、手榴弹都搬出来，大响特响。城里听到响枪煞象两军开火，而且打得很激烈。兵团司令部以为真发生了战争，忙将仅有的一部汽车装好，并且升了火，准备退却。县城西门外原有壕沟，妨碍汽车通行，当即发动司令部的士兵和城内居民把它填平，同时派出许多人员侦查情况。那些人员不敢到枪响的地方，向附近的老百姓打听，也都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司令部各处室的官兵整装待发，彻夜没有休息，到了天亮以后才侦查明白，系各部队为了祝贺阴历年响了一夜枪。一场虚惊才告平息。

解放军追击骑十二旅战争结束以后，刘万春（当时的一一军军长）、于存灏（当时的绥远高等法院院长）代表董其武前往武川慰问军民。那时武川正在最混乱的时候，各乡群众继续不断地到县城请愿，群情激昂，申诉反动部队的骚扰行为。刘、于到县城的次日，有义丰、义庆两乡的请愿群众五、六百人，拥到县政府院内，要求反动军队撤离该两乡，怎样劝慰也不解散。后由于存灏出面接见，讲了许多安慰的话，群众仍不离场。经于存灏当众建议，由各村推选代表开会，研究有效办法。各村代表推定后，群众才分别散去。实际上并没有研究出什么有效办法，只答应竭力整顿部队纪律，维持地方秩序而已。请

愿团群众中你一言，我一语，有声有色，指名道姓地揭露了许多妇女被当地驻军奸污的具体实事。请愿人所提出的最重要问题，是军队糟踏粮食。民间粮窖一经他们发现，总要清底，除人吃马喂尽量糟踏外，还要征集车、驼，运至归绥出售。记得当时具体指出，¹⁶仅李维业部一次运到归绥的小麦，就有三十余石。

这些部队借口征集给养，进出武川西南山区骚扰，有一股到了榆树沟村，把几个青年妇女集在一起进行轮奸。适有骑十三旅（当时驻察素齐一带）古存义排在附近活动。古是当地人，听到这种情况，气愤不已，在深夜将该股人包围，击毙数人，缴获了全部武装。出了这事以后，兵团司令部认为武川地方团队惨害了“国军”，诬指武川义庆乡当过兵的陈连生等为凶手，下令缉拿。并且勒令武川县政府，迅速惩凶交案，以维军心。嗣经县政府派员会同兵团司令部到现场彻查两次，确实证明不能把杀害“国军”的罪责推到地方团队和老百姓方面，这个事件才慢慢缓和下去。

前面叙到，兵团司令部移驻包头后，仍留李维业部在武川活动。李部经常到县城以东解放区边沿地带窜扰，为避免解放军的袭击，每到一地，即强迫老百姓为他们放哨。乘马常不卸鞍，让老百姓牵着放牧，村庄附近如无好的草场，就令牵到田地里吃禾苗。李维业本人性喜渔色，每到一村宿营，必须找一个年轻妇女陪着睡觉。有一次住在哈鲁附近的商腮无素村，派兵到附近的某村（村名忘记），找一个他早已看准而还没有染指过的青年妇女。那个妇女当时痛哭不已，准备要自杀。其小姑正住娘家，看到这种情况，恐怕发生意外，就自告奋勇要替她嫂应付这一差事。那个妇女冷静了一下说：“这种丢人丑事，哪能让你去干，就是死也得我去应付……”。姑嫂边哭边谈，最后的结论是“活在这个年月，什么屈辱也得受。”那个妇女迫

不得已，忍痛应付了李维业的兽欲。

有一次李维业部到了东河子以南的一个小村，李本人正在午睡。村民为了换取李部欢心，减少一点损害，宰了一口猪，准备犒劳他们。不想猪吼声惊醒了李维业，他就把宰猪人叫来大骂一顿，并且说：“你既能杀猪，就能杀人。”接着就让随从兵把在前一天抓获的他认为是解放军谍报的一个人绑来，叫那宰猪人当下杀死。宰猪人哀求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请另找别人吧！”李维业怒不可遏，厉声喊斥：“你不杀他，我就杀你！”宰猪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硬着头皮把绑来的那个人砍死。但他本人当时也就吓得精神错乱了，从那以后，竟成了疯疯颠颠的残废人。

三、占山为王的旧梦重温

第九兵团司令部和所辖部队移驻包头以后，盘踞武川境内的除了李维业部以外，还有骑十二旅——鄂友三部。鄂部按当时的系统说，是董其武统率的部队，当然不能随孙西去。鄂部系以武川原有游杂部队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其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武川人。鄂在抗日战争期间，常常活动于武川山区，日寇投降以后，傅作义所领导的军政集团中曾称之为“大青山之王”。所以鄂部这次驻扎武川，他自认为是人地均宜的。其实，武川老百姓遭受这个部队的扰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都已对他们深恶痛绝，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鄂部的旅司令部设在小井村，部队分驻二份子、白彦花、点素不浪、黑沙图、厂汗木太等地。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鄂以拥有三千人马的兵力，颇感自得，以为象在抗日期间一样，又可以依据大青山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了。首先强迫老百姓种

植鸦片，把武川西部划分为若干所谓“保护区”，拨给各团、连加以“保护”。到了鸦片收割的时候，乃以“保护费”的名义征收鸦片。当时的绥远省政府鉴于种植鸦片，既违背禁烟政策，又容易招致匪患，所以在播种以后，派了许多委员下乡查铲，但到处遭到那些部队的抗拒。经过几次交涉，没有效果。省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改变政策，采取了“寓禁于征”的办法。不久，重派委员丈量鸦片地亩，准备征收“禁烟罚款”。所以在鸦片收割期间，部队官兵和政府委员布满了种鸦片的地方。老百姓的鸦片收获，除了缴纳“保护费”和“禁烟罚款”外，已无余存。而且为了招待部队和委员，宰猪杀羊，推米磨面，搞得焦头烂额，受到的痛苦，真是不堪言状了。

其次是安排退伍官兵。鄂部在日寇投降以后，通过土默特旗政府，占到小井村南奶母沟的一段土地，设立了一个名为“友三堂”的经营机构，招佃垦种，到了一九四九年已具相当规模。旅司令部驻扎小井村后，即将“友三堂”大加扩充，作为收容退伍官兵的场所，同时把佃户的租额提高，以增加豢养那些人的费用来源。一般佃户叫苦连天，眼看不能继续耕种，有些佃户被迫放弃了耕地，另找生路。解放时，“友三堂”已发展为拥有办公人员数十人的庞大机构，解放后还在继续发展。我记得有一个人名叫郭殿亮，曾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团长，西安解放时被迫缴械投降，解放军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不甘心供职，听到绥远是和平解放的，鄂部还存在，他就毅然丢掉工作来绥参加鄂部，鄂友三就把他派为“友三堂”的总经理。鄂以这个机构，作为保存实力的外围组织，从人事安排上就看得很清楚。

旅司令部选定小井村为驻地以后，即由归绥运去大批办公用品，原来留驻归绥等地的办公人员，也先后集合到小井村，整

顿了组织，开展了业务，于是形成以小井村为基地、乘机扩张实力的局面。当时绥远的革新运动已经开始，反对革新的人们有许多参加了鄂部。如赵大义、王效模、李任光、郭成孝等，都是那个时候参加的。驻包头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也在后来到了小井村，参与了鄂部的工作。鄂友三为表示重用这些人，把赵大义、王效模、赵思武任命为副旅长，把李任光任命为参谋长。在设置小井基地的同时，在南距小井约十五里的东营子村，开辟了一个秘密聚会的场所。鄂友三与其左右重要人物常在那里商讨重大问题。鄂友三在小井村的时间少，在东营子村的时间多，象赵大义、赵思武等头面人物，也常陪鄂住在东营子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外人不得知其底蕴，但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推断，不外策划如何保存实力，如何应付时局。解放以后，武川老百姓都称东营子为“小台湾”，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前夕，傅作义派李世杰等携带大批银元到武川给鄂部发放，鄂部分别由驻地调集县城周围，稍趋安定的地方秩序，顿时又混乱起来。当时田禾绝大部分已经成熟，大量地割倒莪麦喂马，几天功夫，就把县城周围各村的莪麦糟踏殆尽。老百姓忙于支应军差，不能全力及时从事秋收，所以在农业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解放以后，鄂部被改编为骑兵第四师，经过建立政治工作和整顿纪律，逐步实现了解放军化，才把压在武川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掀掉。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九·一九”起义回忆片断

李国斌

“九·一九”起义，对我们起义部队的每个人来说，只是改恶从善的开始。部队解放军化的过程就是个人思想改造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贯穿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我思想中记忆最深的是一九五〇年二月特务勾结部队阴谋叛变一事。

当时，我任刘万春军赵晓峰师第二团副团长，并暂时代理团长职务。军司令部和我在包头市驻；我师一团在包头城内担任城防；三团驻磴口，距包头市较远，军部、师部和二团均驻包头东门外营房。王崇仁师原在呼市担任城防，五〇年元月原绥东老部队二十六师接替该师防务，该部于春节后奉命西调河套，参加农业大生产，行抵包头东，适逢连日大雪，道路被阻，暂驻包头西脑包附近。西公旗蒙古骑兵团驻河西（距包头约六十华里）。五〇年元月，各团长、营长，均到绥远军区军政学习团与各该级政委、政治教导员一起学习，因此，所有团、营工作，均由各该级副职代理。我当时代理团长工作。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二月（旧历正月初十前后，确切日子记不清了），当时是部队的政治干部刚到我团的第七天黄昏。我团八连连长李福星突然来找我：“副团长，我有事要和你谈。”我说：“有啥事你谈吧！”他接着说：“咱们部队要出事了，你知道不？有人要拉部队（叛变），他们（指特务）在城里丰备仓街已经开了好几次会了。有人叫我去参加，我不

去，那人说：“人可多哩！”我问他有咱们团的没有？他说有。我问他都是些谁，他不告诉我，只说你去了就知道啦！我怕咱团出事，今天也去了。据我所知王崇仁师最多，咱师一团也不少，咱们团的也有，可我没见到人，你多注意四连和六连就对了。这个事你知道了要多加小心。千万谁也不要告诉。”

我听到上述消息后，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向师长赵晓峰作了报告。赵师长指示我：“立即加派岗哨，严格掌握部队，严禁官兵外出进城，严防意外事情发生。明早你叫李福星到我这里来”。我当即亲到各营连巡查，果然发现四连长梁机、六连长黄自忠都不在连内。当时我除把情况扼要告知一营副营长王光耀、三营副营长屈隆章，命令他们加派岗哨，加强军官值班外，每营准备一个排全副武装待命。二营副营长韩承荣因病在包头城里家中养病，营里无人负责，由于发现四、六连不稳，特分别命令四连副连长李云亭、六连副连长关子雨对自己连负完全责任，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调动部队，特别是在夜间。同时命警卫排长王兴发立即加派岗哨，特别是我和政委住的楼道，不经我许可任何人不准进入，尤其在夜间。并命他准备一班人全副武装待命。

第二天早操时，我通知李福星到赵师长那去后，我对部队讲了话：规定任何人不得随便外出进城，有事外出时，军官必须向我请假，士兵必须向营里请假。早操后赵师长通知我，他派李福星到城里去继续参加特务们的会议，设法弄清情况。

约在当日十一时左右，李福星从城里回来找我，他说，“副团长，早上师长叫我到城里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我回来到处找不到师长，我向你报告吧……。”“他们今天在城里丁香巷开会，总头子是从北平来的姓王，我没见到人，部队里是由王崇仁师中校参谋叶兆年负责。参加的人很多，王崇仁师有二十多个

连，咱们师一团有六个连，军部辎重营有两个连，咱们团是四连和六连，还有西公旗一个骑兵团。今天把手电筒、红绿布、联络旗、安家费都要发了，他们计划今晚，至迟明晚就要行动。行动时等骑兵团来后，各部队里应外合、连拉带裹地把包头抢劫后，就把队伍拉到大青山去打游击。今天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些”。

我听完李报告后，深感情况严重，时间紧迫，立即粉碎特务阴谋是刻不容缓的事。但从我的职权范围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立即向上报告。在到处反复找不到赵师长的情况下，我决定向军里报告。在我向军长报告后，亲见军长警卫员请军政委康健民同志到军长屋中去，我认为是去研究我报告的情况的。

当天下午赵师长回师部后，我即向他作了补充汇报，并说明在到处找不到他的不得已情况下，我已向军里作了汇报。赵师长说他知道了，军部已把叶兆年扣起来了（叶于五〇年秋在呼市被镇压）。军部命令王崇仁师立即开走，让我回去叫李福星再到他这里来。晚上赵师长告诉我，他叫李福星明天再去城里开会，看情况如何。第三天上午李福星早早地就回来对我报告说：昨天开会的那个地方一个人也没有了，听说王崇仁师也开走了。

由于发现情况较早，及时汇报了上级，采取了措施，特务破坏起义部队的罪恶阴谋才被彻底粉碎，从而保障了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两个步兵师（缺一个团）、一个军直属部队、一个骑兵团和包头十万党政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同一天中午赵师长召集我和一团副团长吴士元开会，研究如何掌握部队，严防意外事情发生。我曾请示赵师长：“师长，这个事（指特务勾结部队叛变）是不是和李新同志（我团政治

主任)说一说?”赵师长沉思了一下说：“唉！本来人家对我们有看法，这事要叫人家知道了，多丢人！对我们更会有看法了，以后再说吧！”由于当时我认为赵师长说得对，所以也没和李新同志谈。在当天下午我团政治主任李新同志来我屋问我：“李副团长，前天晚上咱们这里有事吧？”我说：“有哇！你怎么知道的？一定是师首长对你说的吧！”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看出来的。”我又说：“他妈那个×，我们的人混蛋，你放心吧！没事……。”至此李新同志也再没往下问，我也没有细说。

我对“九·一九”起义是非常拥护的。当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因为考虑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为它卖命不会有好结果。我跟随傅、董将军多年，对他们有一种信念，认为他们比我高明，他们不会把我们领进火坑去。我当时对党、对人民还没有正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部队发生问题时，只知道向军事首长报告，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向党派来的亲人——政委，汇报请示，解决问题。这正是当时我不相信党的表现。我决心努力改造世界观，誓把我有生之年，绵薄之力，全心全意贡献给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事业，以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从“河曲会议”到“绥远起义”

——邓宝珊与傅作义的认识和共事始末

杨令德

(一)

邓宝珊（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名瑜，以字行。他与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在抗日战争开始时认识，一直共事到最后。可以说，邓、傅二人的后半生是同呼吸、共命运到底的。——他们在前半生已是叱咤风云的两位将军了。现在先作邓的前半生、即抗日战争以前的片断简记。

邓为甘肃省天水人，幼时家贫，弱冠在兰州学徒，因不甘忍受老板娘之辱骂，愤而从军。时在清末，有从兰州招兵赴新疆者，邓以能书写勉强被录为司书，随军出玉门而直达伊犁。途中多步行，往往有乘车冻死者，邓以少年坚撑、能吃苦耐劳，为同行者所称许护卫。邓在新疆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邓以一小军官而参加了伊犁起义，其后为驻地一部队之参谋。民初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邓在伊犁被围困，与同事数人据室抵抗，嗣经俄驻伊犁领事调解，时邓已婚，即挈眷与一同事经俄国沿西伯利亚铁路辗转返国，暂居西安。不久邓妻病死，邓即登华山。时陕西学人郭希仁在华山讲学。一批从事反对袁世凯斗争的人士，集结于华山。他们不一定是郭希仁的门徒，也不是讲道论学，读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是研究

《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一类书籍，总之是搞“兵要地理”，借讲学而蓄积力量，策划起义。邓于此时结识了孙岳（禹行）、续桐溪（西峰）、胡景翼（笠僧）、张义成、岳维峻、刘嵩如诸人，共同活动。他们当中孙岳年最长，邓年最小。其后一九二六年冬，国民军失败，冯玉祥、孙岳等西退至五原。孙在五原新城讲述国民军革命史时，犹对邓大加赞誉，谓邓当时即刻苦好学，青年有为，意志坚定，勇于任事，由山下负重背运食物等登山，往往由邓担当。此一时期，邓潜心读书，见闻日广，其后有儒将之称，即奠基于此。一九一六年邓即在陕西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和胡景翼等在三原创立靖国军，响应护法运动。其时胡为陕督陈树蕃部一营长，张义成、岳维峻、邓宝珊分任连长。他们树起义旗创立靖国军，一时西北群雄并起，关中不少“刀客”绥远卢占魁的“独立队”等，均在靖国军号召下参加战斗。其中杨虎城最为突出，郭坚轶事较多，流传郭坚致胡景翼告急信“陈贼打我，你贼不救；我贼若死，你贼不免”之语，就反映了当时战乱概况。其后冯玉祥到陕，翦灭群雄，郭坚被杀。胡景翼与冯联盟，所部扩大。胡于靖国军时，声望日隆，部众日多，文武人材云集，如于右任、景梅九、井勿幕、杜斌丞、杨明轩、刘守中、张季鸾等西北各省许多知名人士，均出而拥胡。一九二四年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面已于共同推翻曹錕后组成国民军一、二、三军，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军由冯领导，冯部为一军，胡部为二军，孙部为三军。三军较弱小，胡部实力仅次于冯，时胡部张义成早已战死，邓与张均以智勇双全称，胡倚为左右臂。此一时期，孙中山即有亲笔信致邓，极加推许。这封信与三十年代，毛主席致邓之亲笔信同为邓所珍视，对邓一生影响极

深。国民一、二、三军在京津一带时，孙岳一度为天津军事首脑，邓副之。其后邓与胡景翼率部驻河南，不久胡病逝，国民军失败，胡部群龙无首，于由河南撤退时，北上西进，举棋不定，邓主张进军河北，岳维峻主张退回西安，结果在陕豫交界处全军覆没。岳后被阎锡山关押。邓偕刘蔼如经山西、绥远过黄河越伊盟沙漠，徒步至榆林。时井岳秀（井勿幕之弟，井勿幕于靖国军时期被刺而死）已为榆林陕北一带“土皇帝”有年，邓在榆林井处小住后返三原张夫人家中，从此几于一蹶不振。（从此即吸食鸦片，以消愤懑，遂使驰骋疆场之将军，竟为烟榻灯畔之“隐者”。）

邓曾在河北孙岳家中识孙之崔姓妻妹，系新寡文君，孙为撮合，邓亦首肯，但未过门，邓即返西安，在靖国军时期与夫人张玉燕成婚。邓在三原之家室，直至解放后始移动。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冯玉祥、胡景翼部即有共产党人参加。一九二五年冯在五原誓师时，政治部主任即由共产党人刘伯坚担任。刘在冯部威信极高，经常向冯部将士作政治报告，宣传革命思想，冯对刘亦极为倚重。迨冯部到达陕西时，杨虎城守西安被围困已久，冯至解围后，于右任一度任陕西革命军总司令，邓宝珊副之。邓在国民二军中多与共产党人共事，与刘伯坚等同志过从甚密。“四·一二”以后，国民党清党，蒋介石杀戮共产党人，波及西北，冯玉祥对知名之共产党人如刘伯坚等“礼送出境”，其余在冯部之共产党员，多数被囚禁，甚至杀害。此时邓对不少同志，加以回护。刘伯坚同志于离冯部前夕，与邓作竟夜谈，从此诀别。十多年后，邓与笔者谈及犹有“怅惘千秋一洒泪”之慨。北伐以后，国民军完全失败，邓即挈眷流寓上海，从事反蒋活动，常与邓演达等各方面人士过从，同时亦多方掩护救助革命青年。据闻聂荣臻

同志当时被敌探追捕，逃入邓寓，邓予以资助，使安然脱险。邓当时不识聂，亦不复记忆。此系聂帅于解放后语人者。邓在沪为蒋介石所忌，必欲得之。邓寓法租界，一夕南京政府通过法租界巡捕逮邓，拟引渡递解南京。邓与上海滩上“大名鼎鼎”之女律师郑毓秀有旧。郑曾留学法国，与法领事及租界当局有交往，邓夫人连夜求救于郑，经郑设法，邓迅得释，始未遭蒋介石毒手。

邓寓沪期间，新旧交游，接触广泛，三十年代中期，邓在陕甘任职时，景梅九有《欣逢宝珊漫吟志感》五言律诗二首云：

(一)

申江昔别后，
今复过三秦。
握手谈今世，
知心剩几人。
鹏飞志健翮，
蠖屈亦存身。
我亦愿西去，
相期陇上春。

(二)

二十年前事，
一思一黯伤。
暮云观嶽巘，
秋雨话清凉。
古寺俗尘隔，
唐园花木香。
怀人空渭北，
春到更难忘。

景诗正是此一时期邓几番颠蹶起复之反映。

一九三〇年蒋、阎、冯中原大战，邓亦参与其事。樊钟秀守许昌被蒋军空军炸死，邓只身入城统率樊部御蒋军颇久，后几被叛军执送蒋，脱险后随阎、冯失败而又潜居家中。“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不得不联络国民党各派系，搞所谓“共赴国难”。杨虎城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邓应杨之约，于一九三二年回兰州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邵力子

任甘肃省主席（后部由甘调陕）。蒋介石为了安辑西北地方武装力量，又任邓为新一军军长，所部两旅，一旅为鲁大昌，一旅为刘宝堂，均甘肃子弟兵。续范亭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邓也担任过甘肃民政厅长、甘省主席）。此一时期邓、续庇护革命人士不少，有被捕之共产党员，他们也设法为之开脱。

西安事变发生前一年，邓即乘张学良将军亲自驾驶之飞机，由兰州经陕北至西安与杨虎城晤商多次，对时局交换意见，有所擘划。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派飞机专程由兰州接邓至西安。其时孙铭九刚杀死王以哲，何柱国藏于杨夫人谢宝珍卧室得免，西安气氛极紧张。邓到达后，为杨有所擘划，部署一切，局势渐定。后陪同杨往杭州晤蒋介石，时蒋于清华池被捉所受跌伤未愈，起动尚有困难，极为尴尬，邓进言为之缓和。郭增恺在《金陵春梦》中对此有所记述，与事实出入不大，兹不再赘。

“何梅协定”后，日军威胁日甚，华北已无异于沦陷。邓感于国势阽危，亟图挽救，曾漫游晋冀鲁三省，于北京晤宋哲元，太原晤阎锡山，济南晤韩复榘，观察形势，救亡图存。但此行大失所望，知宋附日，愈陷愈深，邓曾警告宋，谓其正坐于火山口上，阎仍老奸巨滑，妄图保境，无意抗日，韩则浑噩无识，举措乖异，只知保全实力，不知祸在眉睫。欲使此辈同仇敌忾，抗御日寇，实属枉然。于是慨然返回兰州，准备出而抗战。“七七事变”后，陕北、伊盟一带，蒋介石嫡系部队，尚无力顾及；地方杂牌军，与邓有渊源；时中共中央已移延安，与邓关系亦好。有此种原因，蒋任邓为二十一军团长，率所部甘肃子弟兵一旅，开赴榆林坐镇。邓的新一军本为两旅，鲁大昌一旅留甘，邓仅带刘宝堂一旅抵陕北。人们不满于蒋介石之排除异己，有意称邓为新“半”军长云。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归绥、包头很快就相继沦陷，伊盟、陕北榆林岌岌可危。在此紧急情况下，邓宝珊任二十一军军团长，驰赴榆林坐镇。二十一军团所辖范围，主力为高双成的八十六师，其余都是地方杂牌军。邓本人只有“新半军”，武器装备差，人数不多，一切依赖高双成的八十六师。高是继承井岳秀（井死去不久）统率这支队伍的，高也就继井成为陕北榆林的“土皇帝”。邓实际上不啻“光杆司令”，他之来无非是以其在西北的威望以及同这些地方实力派千丝万缕的关系，达到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共同抵御外侮的目的罢了。

高双成所部八十六师虽为一师之众，但所属地方团队等等，人数庞杂众多，散布于三边、神（木）、府（谷），北至包头滩上、南至米脂等处，其后即扩编为二十二军，直至抗战终了。

邓是著名的“袍子将军”，一般不穿军服。抵达榆林时似亦不拘军礼，对高双成说的第一句话是：“立卿兄，我来可以给你当一个参谋。”高字立卿，较邓年长，系陕西“刀客”，行伍出身，此时在大动乱中也亟须仰仗这样一位足智多谋谦虚有礼的上司运筹于帷幄之中。高对邓总是以官衔相称，始终未看出对他的没有实力的顶头上司流露轻视或什么的。邓、高二人在榆林共事，直至一九四四年冬高病逝为止，可谓善始善终。抗战八年，邓在种种复杂曲折境况下，能够运用自如，尚无陨越者，大都如此。

一九三七年邓过西安经延安，北上榆林就任二十一军团的军团长的途中在延安停留，第一次见毛主席。此时邓有不少老

友，如南汉宸同志等已在延安。邓与毛主席作竟夜谈数次，也会晤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邓这首次同毛主席的见面和长谈，以及后来几次在延安同毛主席的晤谈，对他后半生的行止，影响极大。

邓在榆林就任二十一军团长后，这一带人心逐渐稳定。此时绥、包沦陷，绥远地方人士以及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官方机构，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初就不断涌到榆林。因为傅虽为绥远省主席，但受阎锡山控制，绥、包沦陷时，傅早已奉阎命率部退雁门关，一度守太原而狼狈溃散，傅亦仅以身免。其后始集合部众转战于晋绥边境，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反攻归绥失败后，一个时期便驻扎于河曲。此时傅部有国民兵李大超部以偏师逃于河套，傅亦难以约束。因此在榆林设立绥远省政府临时办事处，原在绥的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亦移榆林，土默特旗总管荣祥、蒙旗独立旅长白海风亦由伊盟来榆林，其后荣任蒙旗宣慰使，设公署于榆林，白编为新骑三师，驻榆林附近颇久。绥远地方人士逃来榆林者亦不少。邓对以上军政人士均加以安抚，遂使一些人于整个抗战时期留寓榆林。

这时北战场上，即晋绥沿黄河一带边境及伊盟、包头滩上，国民党的军队日多，而战绩日少。正规军有傅作义部，何柱国部，门炳岳部。马占山于绥包沦陷前夕，收编一部伪军及绥远当地散兵游勇，组成挺进军，亦退至伊盟。这些都是外来部队。原有的高双成部，伊盟各旗的保安部队，再加上一些本来就是土匪部队而组成的以抗日为名的地方武装，如“绥远抗日自卫军”之类，真是大军云集，民不聊生，军需粮秣供应之困苦，自不待言。

傅作义部从太原退出，很快就整顿起来，但元气大伤，最初在黄河岸边柳林一带休整，一面派人到西安招募青年学生充

实基于，一面派代表到延安，请求中共中央援助。即在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派法国留学的、与共产党人有联系的、在山西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周北峰为代表，赴延安晋谒毛主席求援。傅派周赴延安，在邓宝珊第一次见毛主席后数月。毛主席几次接见周，对时局如何发展，傅应如何作长期抗战打算，如何集结部队于陕甘宁绥一带，所谈甚详。^①傅当时当然未能接受，^②只是由周向毛主席请准邀约一批在陕北公学学习的中、青年和由解放区拨给壮丁二三千人，以充实傅部。故傅部一九三八年夏到达河曲时已有了一番新气象。因为上面提到的北战场上所谓“将星云集”，却几乎一筹莫展。这时傅奉命为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为副总司令，于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就举行了“河曲会议”。

“河曲会议”是军事会议，邓此时已是全副武装而一改“袍子将军”的常态了。八月二十四日从榆林出发，随行者有总参议、西北哥老会大龙头高志清，保定军官生、亲共的寇子严参议，以及秘书、参谋、文武幕僚多人和一个骑兵卫队，一行浩浩荡荡，且行且止，经神木、府谷、保德于九月三日始抵达河曲。这次笔者以汉口《大公报》特派员身份与汉口《扫荡报》特派员耿坚白两个当时仅有的在榆林的外地记者，由榆林随邓到河曲采访。耿即后来毛主席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的三记者之一。

邓一行于八月三十日到达府谷。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日军一度陷河曲、保德，波及府谷。府谷城关一部被日军纵火焚烧，但驻守之高双成部未退，进行抵抗，敌亦无意渡河西进，故府谷虽遭兵燹，较保德为轻。保德则全城被日寇焚毁，劫后近一年了，惨状仍令人不忍目睹。门炳岳部骑兵驻于保德，邓到府谷

之次日，门即过河与邓会晤。时门与傅作义齟齬，傅于进攻绥、包时失败，门在马其渡口防守，门以傅指挥不当，不应以他的骑兵作阵地防御，傅则以门未能截断日援军交通线相诘。从此直至傅、门都回到绥西，二人始终不睦。门竟以此而失掉兵权，¹¹ 抑郁不得志而病死于重庆。这次“河曲会议”，门执意不去出席。八月三十一日，邓由府谷渡河入保德会晤门，门于断垣残壁、一片瓦砾中接待了邓。邓一向肯作和事佬，曾劝门出席“河曲会议”无效。当晚复渡河返府谷，九月三日到达河曲。

“邓军团”（当时私下以此称邓）一行人马九月二日由府谷动身，次日九月三日午间渡河抵达河曲。傅亲自到河岸迎送。这是傅、邓第一次见面。邓肃立船头郑重向傅行军礼，口称“总司令好！”傅部在河岸上已高悬：“欢迎革命先辈邓副总司令”巨幅标语，不过还没有高呼口号的，但也够戏剧性的了，邓当然感到满意。

马占山、何柱国已先到了河曲。九月五日举行了河曲各界欢迎会，傅、邓、马、何当然是主要人物，无非人人讲了一通抗战到底一类话，也还热闹了一番。所谓河曲军事会议，并未看见这几位将军如何运筹帷幄，密商大计，只是有几日在一个关帝庙院内，轮流大摆酒席。河曲有名酒叫“代酒”，也产上好的鲤鱼，醇酒鲜鲤，杯盘狼藉，正是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此时河曲本来已是前方“吃紧”到敌机来袭，连警报也来不及发出的地步，但还是“紧吃”。这次在河曲唯一有意义的事，¹² 大概只有傅、邓诸人同罗贵波、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的会晤。当时汉口尚未陷落，蒋介石尚未公然再掀起反共高潮，傅、邓与八路军正保持联系，¹³ 所以在晋西北、陕北榆林这一区域，国共双方合作，阻力还不小。邓由寇子严相伴，通过与南汉宸、续范亭在河曲的商谈，彼此当

然有所密契。这与抗战期间邓在榆林的一切举措是有关系的。

九月十二日上午傅部在河曲东门外举行平射炮演习，所谓“河曲会议”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参观这次表演，成为“河曲会议”最后一个项目。是日早，邓率随员牵马由东门出城，尚未上马，忽然三架敌机已飞临河曲城上空，人马隐蔽于树林时，河曲城已烟柱冲天而起，南门内外炸塌房屋不计外，炸死炸伤六、七十人，连上学之小学生，亦有惨遭炸死者，死尸横陈，瓦砾遍地，人人愤恨日寇之残暴。周北峰即于此次在河曲南门负伤，多亏他在城门洞内卧倒，仅中炸弹碎片，附近已有十数人牺牲。这次邓一批人由榆林来河曲时，另有一小批人即尾随于后，为首的是国民党派到高双成军的政治部主任包介山，“军统”人物，沿途与之不即不离，行止总保持一定距离。包来当然是察访傅、邓与八路军的交往，包并且公然向傅提出，要打周北峰的主意。因为周为傅部向延安求援，不少延安来的青年及少数共产党员，已成为傅部政治部的骨干，最初周北峰为政治部主任。包介山此行可以说是奉命“捉拿”周北峰来了。傅当然不能答应，诿称周系阎锡山派来，将送周至阎处处理，不想周竟于此时负伤，经过治疗，仍有一小块碎片始终未能取出。包介山“捉拿”周北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敌机走后，平射炮演习还是举行了。这一天下午敌机又轰炸了府谷、保德，次日轰炸神木。

“河曲会议”一下子炸散了。十三日邓、马、何诸人先后渡河离开河曲。马当时已驻扎于哈拉寨，何部骑兵游弋于十里长滩晋绥伊盟边界，邓一行经神木返回榆林。

不久傅部大队人马经伊盟到了绥西河套。经过明争暗斗，傅从阎锡山手下，几乎是虎口夺食，除他自己的三十五军外，还

带走了山西的一部骑、炮兵。这时傅也比较实力雄厚些了，从此傅即逐渐摆脱阎的控制，而日益靠拢了蒋介石。

傅在绥西恢复了绥远省政府，把绥西原有的两县一设治局改设为六个县。他本人是第八战区副长官、省府主席和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三位一体，直至抗战終了，保持了这残破的绥远半壁河山，总算有了个立足之地。

邓回榆林不久，二十一军团即改组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任总司令，傅部的孙兰峰一度任副总司令。孙曾到榆林一次，也不过挂名而已。

一九四〇年以前，榆林与延安间，人员来往，邮电通讯，尚能保持。从一九三八年初起，先后由延安来榆林与邓联系的有高岗、王震、南汉宸、袁任远诸人；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亦可订阅；《黄河大合唱》曾在榆林公开演奏，广泛传播；应云卫率队来伊盟拍摄《塞外风云》，在榆林由吴茵、舒绣文等演出抗战话剧；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由西安招聘来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画家张仃、绿漪夫妇、姚曾依、沈求我等，还有从别方面来的有王毅然、段复生、孙季白（承佩）、高鲁（董英）等，这些青年活跃了榆林沙城的文化艺术。所有这些都受到邓的热情接待。邓在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榆林城南门外新修的窑洞内，往往与这些文化人谈古论今，直至深夜。

在此期间，李公朴还特意由延安来榆林，此时榆林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加紧，国民党榆林办事处，是专区一级的党部，即原来的“肃反委员会”，不用说是专门反共的，办事处主任荆宪生、徐玉柱都是“CC系”调统人物；高双成任军长后，八十六师师长由蒋介石嫡系黄浦四期的徐之佳担任，当然高对部队掌握极牢；榆林专员傅文等也是蒋之嫡系人物。在此

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邓为榆林地区最高军事首脑，高为这一地区“土皇帝”的权力地位虽仍得以保持，但也够多方应付的了。

蒋介石掀起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先是暗中布置什么防止“异党”、“奸党”办法，后来甚至公开叫嚣，到处挑动“摩擦”。此时不但邓，连同在邓影响下的高也都设法抵制这些勾当。国民党榆林办事处的机关报《陕北日报》，邓两度推荐笔者兼任主编，与荆宪生等约法三章，该报只转载国民党中央公布的稿件，不刊载上述一类诬蔑之词。《陕北日报》还辟专栏副刊，甚至出现过以《斯大林的烟斗》为题而引起风波的短文。另外，在邓的支持下，也出版过《塞风》杂志等书刊。此时老舍也曾一度来过榆林，榆林文化界人士还召开过一次欢迎老舍的座谈晚会。就在这个晚会的终了，突然一个中统特务赵尺子请求发言，大肆攻击共产党，闹了个不欢而散。赵尺子来历不明，“七七事变”前夕，他到绥远组织了一个什么“边疆通讯社”，有几位颇能写作的东北青年在他手下勉强维持生活，到了榆林以后，有的青年已离开了他，他以“边疆通讯社”为招牌，招摇撞骗，专出反共的零星小张刊物。当时榆林有新闻记者协会的组织，赵亦为成员之一。事后因为赵在欢迎老舍晚会上这篇讲话极为恶毒，群情激愤，便登报申明开除赵尺子记者协会会员资格。赵尺子从此在榆林声名狼藉，不久就跑到西安去了。

榆林文化艺术的小小“繁荣”，不过昙花一现。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共势力对榆林控制日严，同延安的来往亦几断绝，有些青年就到延安去了。也有不少外来青年离榆他去。从此榆林直至抗战终了，再未见有什么新的杂志书刊出版。

邓宝珊此时仍设法抵制反共。延安不断派绥德开明士绅刘

绍庭往返榆林，互通声气。邓左右亲共的参事寇子严与中共方面有联系，邓的二女儿幼梅在延安学习了一个时期，亦来榆林伴邓。还有他的一位秘书汤昭武（当时已是地下党员），蒋介石侍从室几次电邓追查，邓始终坚持汤无问题，力保到底。所有这些，引起榆林特务非难不小，而邓硬是顶住了。老共产党员内蒙人杜瑚（如薪）1938年来榆林从事地下工作，后在伊盟策动地方武装，组织抗日力量，特务纷纷电告国民党中央，缉拿杜瑚，蒋介石侍从室也电邓追查，邓不予置理，并告笔者将此情况转达于杜。因为邓、高政治态度比较一致，他们的部队控制了榆林地区，有形无形抵制了蒋党嫡系势力，这就是抗战期间榆林的微妙局势。当王震同志来榆林那次，笔者曾前往访问，事后邓告笔者王寓所招待人员，均系特务化装者，使笔者生平第一次始有“人间到处有陷阱”之感。笔者的甥儿袁烙四十年代初由解放区来榆林一次，因其暴露身份迅速使其离开榆林，中间疑被榆林特务拦捕，曾向邓询问，邓答：“他们捕人，我是知道的，袁烙未被捕，你放心好了。”后知果然如此，袁已安抵米脂。可见国民党军统、调统在榆林的特务，因有邓的控制，尚不至如其他国统区滥肆捕人，偶有此种行为，邓也是知道的。这就是局势“微妙”之所在。

傅作义率部把绥远党政军机构由河曲移往绥西，在陕坝粗具规模，经过五原战役，日寇不再西进，局面逐渐巩固以后，反共高潮起来了。比榆林要凶狠得多。这之前，傅本人亲来榆林一次，与邓、高会晤（中间傅、邓参加过蒋在陕西召开的“武功会议”），这是傅与榆林军政首脑的一般联系，也是傅、邓一次较长时间的接触（“武功会议”他们在一起呆了不少日子）。“武功会议”是蒋介石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的会议，陕坝的情况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军队方面，蒋党派军统人物张

彝鼎为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由调统的张庆恩为书记长，当然他们底下还有不少人，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对于当年在柳林河曲由延安请来的人，比较客气些的是“礼送出境”，叛变的予以高官厚禄，其余不少押送西安集中营，更有当时即暗地杀害的。所以无辜被张庆恩逮捕，火烤掉乳头，酷刑致死致残的，大有人在。

傅的左右，周北峰最先受到特务攻击，在国民党中央是有案可查的，由于傅的力保，周最后总算幸存下来。在欧洲游学、抗战初期与杨虎城同船返国、从延安回到陕坝的秦丰川，也是触目人物，结果是在西安“失踪”多日。

陕坝《奋斗日报》连国民党《中央日报》还没有公然刊过的什么“奸党”字样也出现了，连篇累牍登什么某人脱离“奸党”的声明。经邓同意，笔者直接电傅，指其不当。傅在榆林设有办事处，经常与邓保持联系，笔者也与傅有电报往还，在邓、傅间也发生过一些穿针引线的作用。

榆林遭敌机连续轰炸几次以后，邓的总部由城内迁至城东南角金刚寺窑洞里，荣祥的蒙旗宣慰使署设在附近的南岭庄，阎锡山派来的绥境蒙旗指导长官朱绶光驻于城北的红石峡，马占山也几度来榆林住过，高双成的二十二军部始终设在城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已无力在陕北一带滥肆轰炸了，抗战后期，榆林城内比较安定。

高双成部有一个秦腔戏班子，唱戏是唯一的娱乐。每年邓、高、荣、朱这些大官的生日总要在他们的官邸唱三天戏，算作“与民同乐”吧。马占山、高双成、朱绶光酷嗜打麻将牌，邓不善、也不喜此道，但没有他参加还不行。在这三天三夜当中是昼夜打牌，当然大烟盘子摆在那里，吞云吐雾，便可以抗“战”到底了，摆筵席那自然是免不了的（还好，始终

没有叫过“条子”（妓女）作伴）。

“庆寿”聚会的次数毕竟是有限的，平时每隔十天半月，这样的“聚会”还是要举行的，邓、高、朱三人轮流请客，马占山在当时是最阔气的东道主。城北红石峡朱处，城南金刚寺邓处与城内高处，每逢这种聚会，总是“大干”几昼夜，吃饭、抽大烟、打牌，搞得乌烟瘴气、精疲力竭完事。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榆林的中下级官员也多是抽大烟、打麻将、吃喝玩乐“忙碌”异常。——榆林是个小地方，人也还是“土包子”，比起大后方国统区那种花天酒地、阔气排场来，也不过是“小巫”而已。

“皖南事变”以后，榆林的气氛大为改变，蒋党嫡系在榆林的反共活动日益加紧，邓的处境也就更加“微妙”。邓、高等的酒食征逐，也还有某种政治上的一致性（不公然反共），但专门反共的那些人对之并不满意。榆林专员傅文有一天突然派兵抓了邓的总参议哥老会的老龙头高志清的灯，“抓灯”就是把大烟灯抓了，因为从官方说，抽大烟是犯法的。这分明是对邓的打击，将后还不知要干什么勾当。邓一下子火了，派卫队把这些“抓灯”的兵全部缴械捆绑起来，下令要砍头！人们一面找刀，一面速请荣祥前来劝阻，演了一场“刀下留人”的闹剧。邓与荣在烟榻畔对卧一整夜，邓怒火稍息，立即戒烟，多年的大烟瘾，从这一夜起，经过几个月的苦熬，再未吸一口，终于戒掉，后来身体也好起来。邓当时是想戒掉大烟，同傅文到重庆打官司的。这一天他叫一营甘肃子弟兵全部擦枪待命。邓部驻扎榆林城南门外，他准备半夜派部队进城收拾一下专员公署。但是城门由八十六师把守。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和傅文都是汤恩伯的人，这样兴师动众一定叫不开城门，想来想去，只好作罢。虽然第二天高双成等纷纷出城慰问了邓，傅

文也几次来道歉被拒不见，但邓总是受了一场窝囊气。

邓的戒吸大烟，给他带来了好处，他本来体魄甚健，多年来因为失意而吸大烟糟蹋了身子。戒烟以后，满脸烟容没有了，人也肥胖些了，有什么突然重大的打击，也可以担当住了。果然次年他遭到了不幸，他兰州的家崔夫人与一子一女，一天因防空洞坍塌竟全被压死，噩耗传来，邓一下子就晕了过去，苏醒以后，独居一室，啜泣数日，每天只饮水而不吃饭；一周以后，始略进食，接见左右，有如大病初愈。人们都说，若非戒绝大烟瘾，他这一回是支持不下来的。这时慰问电真是雪片飞来，总部参谋处由一位老夫子执笔一一回电答谢，总是“客气”地称“珊不德”云云。过后多日，邓始见电稿，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明明是防敌机轰炸而死，有何“不德”，旧套文体，真也害人。

邓遭此横祸以后，又因马占山、朱绶光也先后离开榆林，平常多在高双成二十二军军部中抽大烟、打麻将吃喝玩乐的“盛会”也就不再举行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夏，邓已恢复健康，褪尽烟瘾，于是有南下赴重庆述职之行。从榆林经绥德、过延安至邓在三原的张夫人家，一行数十人，乘马作长途奔波。随员有邓的参谋长于建勋（浚都），笔者应邀作为邓的“私人秘书”从行。

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由榆林出发，离榆林出境时，当地高双成部列队迎送，士兵尚穿着棉军装，褴褛不堪，因为国民党中央的夏装尚未发来。十日到绥德，八路军列队迎送，则一律为夏季服装，军容整肃，战士脸色红润，邓登时即不胜感慨。

绥德开了欢迎会，徐向前同志和邓在会上讲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在绥德任职，负责招待邓一行人。绥德开明士

刘绍庭随邓至延安。

六月十七日到了延安，停留一周。邓与毛主席单独略谈数次。此为抗战期间邓第三次来延安，前两次已与毛主席作过晝夜谈多回。邓这次甫抵延安，毛主席即在杨家岭新建之中共中央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及其随员。在座者有朱总司令、贺老总、南汉宸、续范亭、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老、副主席李鼎铭，还有其他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可谓济济一堂的盛会，也是给予邓的殊荣。接着又在交际处一连三个下午举行宴会，分别由毛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同志为东道主。毛主席是第三天下午亲来交际处出席的，宴会前后，同大家围坐院内，漫谈颇久。毛主席平易近人，出语幽默，谈笑风生，真是“雨露阳光在眼前”，满座都有幸福感。

在延安停留期间，邓同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几位老人都见过面，也参加过晚会，观看了几次话剧、京剧的演出。白天街头演出讽刺《蒋独裁》的小戏，对邓触动不小。

贺老总还特意约于浚都、刘绍庭和笔者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那时大生产已取得大成绩，真是人人动手，丰衣足食，欣欣向荣，军队于垦荒种地外，还大量养猪种菜，更为丰足。贺老总不但给我们以佳肴，而且他对我们的真诚坦率的谈话，更使我们受到极大的启发教育，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延安南下，至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处，中间有空白地带，这是胡宗南搞的勾当。到了国统区，是所谓“中央军”防地了，也是到处列队迎送，军衣倒不是榆林边上那种褴褛不堪的棉服了，但士兵一般是面黄肌瘦，比起解放区丰衣足食、精神抖擞的战士来，当然就差多了。榆林闭塞，当时物价还稳定；边区人民生活比之南北国统区来要好。所谓中央军辖区，从陕西到

四川，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

六月末到中部（即黄陵），因雨阻停留数日，当地驻军师长徐保系邓的老友吴勉之的女婿，以父执待邓，招待尤为殷勤。在中部停留这几天，可以看出蒋军师团长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之一斑。因为克扣军饷（当时斥为“喝兵血”）十分严重，所以士兵就连饭也吃不饱，而军官则狂嫖滥赌，不见他们干正事。

七月初从耀县改乘火车至三原邓家中。耀县车站，小麦山积，完全发芽，一片碧绿，使人悲愤。从老百姓手里夺来的大批粮食，竟这样糟踏掉了。

在三原小住，即至西安。一到西安，邓就是拜客会客，吃饭看戏，忙得不可开交。西安地方大，官大官多，更是花天酒地，“后方紧吃”那一套。十日左右，一天上午周总理和林彪来邓处晤谈，当时周总理从重庆北返，即回延安。邓叫笔者马上去，介绍见过周总理、林彪，握手之后，邓才告诉笔者到外边大客厅打发那些来客。原来门外汽车停了不少，客厅里来了不少胡宗南以下的这个长那个长的，也有金融大亨、若干头面人物。既不能明说邓与周总理晤谈，只好含糊支吾，就这样把这帮人打发走了。这一回可替邓得罪了不少人，好在邓也不管这些。

七月十三日邓带着他的长女小燕由宝鸡直飞重庆，于浚都和笔者由宝鸡乘联运汽车后去。

从七月抵渝到九月，在酷热中煎熬了两个多月。邓到重庆，酬酢多，陪都的乌烟瘴气，在大后方当然是首屈一指，不堪言状的了。

这期间，傅作义、胡宗南、马鸿逵等等“要人”都先后到达。同邓在“胜利大厦”住在一起的有杜斌丞、孙蔚如诸人。

邓既然是“赴渝述职”，当然是所谓“晋见蒋委员长”了，这暂不去说。此外他会见的重要人物，先后应宋庆龄、孙科、孔祥熙的宴请，那时王炳南是宋的秘书，到宋处都是由王亲来迎送的。邓也第一次和郭沫若会晤，那是由创造社元老、邓的老友郑伯奇介绍认识的。

在山城郊外邓拜会了一回冯玉祥，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无酒肴，大盘大碗、大块文章，临时能备办这样一顿好饭菜，在当时的重庆说来，也是不多见的。邓对冯毕恭毕敬，呼之曰先生而不名。冯魁梧雄伟，毫无老态，虽仍具“叱咤盖世”的气概，实深有“用武无地”的感触了。其时重庆盛传冯曾白昼提灯笼见蒋，意谓蒋统治下遍地白日亦黑暗如夜。笔者询冯有无此事，冯答外传不实。他曾以“举烛”典故讽蒋，致外间讹传如此。

“举烛”的典故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说。举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冯本意是要蒋“尚明”、“举贤而任之”。蒋哪里能听得进去。所以冯牢骚满腹，郁郁不乐，忧国之心，见于词色。

邓那时虽已戒绝大烟，但纸烟则不离口，在冯处几小时，他也不敢吸烟。告辞后出门不远，邓就向左右索取纸烟，连说这一回可真够呛呵！冯是邓的老上司，也是邓颇敬畏的，故在冯前执礼甚恭，他们共事多年，也同样失意多年。这是冯、邓最后一次见面。

傅、邓都同《大公报》有较密切的关系，其时张季鸾已逝世，傅特至报社张季鸾灵位前致祭，邓还冒雨赴大公报特为举

行的宴会。张季鸾曾为胡景翼国民二军“行人”（即与各方联络之“特使”），傅三十年代前在天津即与《大公报》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了“友谊”。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从前联盟组成的国民军一、二、三军，早已烟消云散。一九四三年邓在重庆会见国民军的领导人冯玉祥外，也同国民三军的徐永昌常相过从，邓和徐是国民二、三军仅存的高级将领。徐自一九二六年孙岳部瓦解后，他只身回到山西，在阎锡山手下担任过晋绥两省主席，抗战期间在重庆为蒋政府的军令部长。与邓私交甚深，此次邓在渝也不过是受徐“殊遇”，到徐处见“藏娇”、吃“家宴”，叙家常而已（徐曾对人说，他生平无他嗜好，唯好色。“金屋藏娇”为张宗昌一美妾，平时绝不下楼见人，也不常设“家宴”）。

最后八月底九月初的几天，邓离渝北返前，特至山洞于右任官邸小住，与于盘桓些时日。那时因为防空，这位大胡子院长在远离重庆比较安全一个叫做山洞的地方渡夏，除过围桌吃饭，总见他不断题字，一束一束纸，堆如山积。几乎满街巷有于书匾额，据说他的亲属侍者也学他的字体，竟可以乱真，所以就到处可见于的题字了。平时闲谈，他也把手指在膝头乱划，竟成了“不治之疾”。灯前饭后，他周围一些年青人（秘书一类小官，有时他的儿子于望德也在内），议论时事，颇显得慷慨激昂，往往甚至咒骂蒋介石。于则默不作声，但亦不加干涉。这种情形，当时在别处也不罕见。“于无声处听惊雷”，蒋家王朝崩溃预兆显现，有心人已是“心照不宣”了。

邓到重庆是“奉命述职”。两个月的勾留，前后受到所谓“蒋委员长接见”六次（前几次是单独接见），最后一次于八月下旬在黄山，蒋催他回榆林。此行邓只从蒋处领到一笔钱，除了开支，所余无多，此外别无所获。不过他同各方面的接触

颇为广泛，同民盟、农工等民主党派人士都接触过。离渝北上，途飞榆林还是循原路经延安而返，一时定不下来。邓执意要循原路而返，就是要到西安经延安返榆林。曾嘱笔者到曾家岩去接洽，迨向《新华日报》打听好去法后，邓说延安已可以通过，不必再接洽了。他也没有进一步细说，就这样决定九月中旬先飞西安。从酷暑煎熬中的重庆飞抵西安，马上感到秋高气爽，凉快宜人。这天过午从重庆起飞，同机有傅作义、胡宗南、高桂滋诸人，随员一批，杂物成堆。于浚都就受南汉宸委托，为边区购了不少药物，当然是得到邓的同意的。北返非经过延安不可，这也是小小原因之一吧。到机场送行的人不多，可能是动身临时决定，事先没有什么人知道。邵力子此次在渝，多次访邓晤谈，这一天由邓寓直送邓至机场。

本来由渝飞西安，日落前可达，但延至满天星斗，始在临时照明下降落（西安彼时无夜航设备）。事后得知，飞机一度迷航，飞往运城，误为西安，好在迷途知返就是了。

头一天半夜到西安，第二天拂晓，就外送傅作义飞兰州返陕坝。傅、邓西安一别，至一九四五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在重庆作了抗战期间最后一次会晤。

邓回西安住了多日，依然无事忙。同胡宗南来往自不用说。邓同胡认识，在抗战开始。坐镇榆林，往返西安，与胡会晤。胡表面上对邓极为推崇，邓当然是虚与委蛇了。七月间在西安未多逗留，只是胡单独宴请邓，晤谈几次。这次回到西安，时间比较充裕，除邓单独与胡会晤外，胡还特意宴请邓、杨明轩、刘澜如、于浚都和笔者诸人一次。刘澜如当时已年过七旬，一生淡泊，擅新老庄哲学，为人朴实无华，这位老夫子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物。抗战初期曾到榆林邓处小住。胡因邓而拉拢刘，后竟于蒋家王朝末日，挽刘一度当了陕西省政府委

员。老人随即悄然逝世。杨明轩较邓年长，而晚于刘，西安事变时为汤虎城委派之红色教育厅长，抗战开始，陪杨由法返国后，曾一度到榆林晤邓。此次邓往返西安，杨曾住邓三原家中。杨在西安得赵寿山保护，住赵军中。胡几次约见为杨所拒，此次由邓挽杨相会，其后杜斌丞遇害，李敷仁几被刺杀，杨知不免，即潜赴延安。

胡宗南这次特意宴请邓及其友好，无非是联络感情，妄图以供其驱使，结果相反，大家背后议论，认为胡装模作样，内轻佻而外矜持，更显得可笑。一句话，是看不起蒋介石手下这员反共大将。邓过延安南来时，毛主席把包围边区的几十万胡军比作以卵击石，谓胡宗南不过挑了一担鸡蛋在“示威”而已。

参加了胡的宴会后，邓即回三原家中，十月间过了他的五十岁生日，原班人马由胡宗南派汽车送至延安。越过无人地带，边区前沿负责人为习仲勋专员，迎邓入过一夜，次日即抵延安。

南下时为炎夏，北返时再来，已入冬寒季节，由南汉宸张罗还为于浚都和笔者制赠了皮大衣，住在交际处，招待十分周到。邓到后便病了。高颧深目、削颊微髭、身体瘦小的米脂开明士绅、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通中医，来为诊脉处方、服药数剂不大见效。毛主席单独接见几次后，邓病始愈。这几天正逢举行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在一个广场举行的大会上，续范亭和邓以来宾身份应邀讲话。邓对他通篇讲话中的一句，特别提高嗓门（那时没有扩音器），一再重复。这一句话是：“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讲得慷慨激昂，痛斥蒋介石不抗日而反共之罪恶，且追述他为主张抗日而在孙中山陵前剖腹明志之壮举。续抗战前夕，任邓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后愤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因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唤醒国人，有人于其

昏迷到血泊中发现，得以抢救。此事发生，南京政府讳莫如深，不使人知。徐永昌等山西要人甚为不平，出为声援，始得在报纸上宣布，抗战开始，续转战晋西北，积劳成疾，此时在延安疗养。他患肺病，已颇严重，而忧国忧民感慨尤深。每日与邓谈至深夜，多推许毛主席而痛斥蒋介石。续刚正不阿，肝胆照人，邓以兄事之。邓左右尊称之为“续圣人”。

旧历年前回到榆林，此后由于国际形势好转，日寇败局已定，包头滩上，伊盟一带，军情缓和，榆林平静。一九四四年冬高双成病逝，左世允（协中）继高为二十二军长。左系保定早期军官生，在井岳秀、高双成部多年，资深望重，老成谦和，但要应付榆林当时越来越复杂的局面，还比不上有魄力、有决断的高双成。高且还有邓宝珊那样一个“上司”来维持门面，左就更须依靠邓收拾这个残局了。邓于抗战末期，即欲离榆林他去，一九四三年的重庆之行，外间即曾盛传邓或调回甘肃，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把他打发回榆林来。高双成逝世，胡宗南即飞榆来吊唁，实际上也是奉蒋命使邓留榆，稳定军心，企图从榆林、伊盟地区加紧包围边区。一九四三年后，所谓“中央军”已加强了在伊盟的部署，何文鼎军进驻伊盟桃力民一带，名义上虽归邓指挥，实则为以后继续增加兵力开辟道路。此时榆林对日军的侵略言，是平静无事，可是内部国民党中央的军事、特别是特务的渗透，则更加紧。而邓则仍不时通过绥德开明士绅刘绍庭之往来，与边区保持一定的联系，处境真也够“微妙”的了。

一九四五年夏，邓飞重庆出席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与傅作义同时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片混乱声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人们就把这个“胜利”叫作“惨胜”，从此蒋介石就更加倒行逆施，傅作义与邓宝珊的关系也

更密切，而且更有一番十分错综复杂的以后经历。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以后，榆林城灯笼火把，爆竹齐鸣，锣鼓喧天，确实也热烈庆祝了一阵，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同全国一样，陷入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困惑之中。这时何文鼎军已从伊盟调赴绥远，归傅作义指挥；原驻中部（黄陵）的徐保升任军长，不久率全军北上进驻榆林，作为反共的主力军。邓宝珊于日本投降后，由重庆返回榆林，深感蒋介石发动内战，迫在眉睫，本欲离开榆林，但亦无法脱身。徐保军进驻榆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遣来的监军。徐虽表面上对邓表示恭顺，而邓的处境则更为困难。

傅作义在陕坝，于日本投降后，即由八战区副长官升任十二战区长官，星夜率部东进，先在包头、归绥收编蒙伪军，收复了这两个地方，留下一部分军政人员，进行“劫收”，傅本人则一直东进到大同。原来傅奉蒋命，不但收复平绥路全线，还要赶到北平去。不想在大同即被阎锡山所派楚溪春部阻止，傅无法与阎对抗，只好折回归绥。于是傅抢占了绥包路的包头、归绥和平绥路上的集宁、丰镇，恢复了一些抗日前的绥远辖境。抗日期间，在绥西的傅部二十多万军政人员，大部返回归绥等处。扩展地盘受阻，就着意进行“劫收”，大烟土、金银财物，浑水摸鱼的人不少（后来傅也因此枪毙过一个小职员）。起初傅部回到绥远，经过日军铁蹄蹂躏了八年的老百姓也颇喜欢，但很快就普遍流传出这样的谚语：“今日盼，明日盼——盼回一伙忘八蛋”。

邓与傅不同，他本来就是“光杆司令”，没有实力，也就

没有地盘，在榆林不愿恋栈，还得硬着头皮呆下去。这时榆林的蒋帮嫡系人员，因为有了所谓“中央军”重兵压境，更是有恃无恐，对邓也有形无形施以压力。邓的次女邓幼梅、参事寇子严、秘书冯昭武等人，大受攻击。当然邓有他自己的甘肃子弟兵“新半军”和左世允（协中）的二十二军，“在榆林还是“坐地虎”，别人也奈何不得。这时邓部旅长刘宝堂已在三边被当地土豪张廷芝杀害，由团长史钊城升任旅长。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师长蒋系的徐之佳，于日军投降后即跑到西安玩小老婆去了，八十六师师长由胡景翼的五弟胡景通（原为高双成部多年的团长）升任，这样二十二军也可由邓控制了。胡景通为高双成部少壮实力派，平时为高部中下级军官之中心人物，胡景翼之六弟胡景铎此时亦升任为二十二军骑兵团长，邓部十一旅中下级军官如原任营长的曹又参等亦有升迁。榆林与解放区接壤，抗日八年，由于邓的苦撑，虽在反共势力包围中，仍能保持与延安方面的接触。如今抗战胜利，蒋介石要大打出手了，榆林的反共力量加强，气氛紧张，邓的处境更为困难。他的二女儿幼梅病故了，亲共的参事寇子严的病已加重了（绥包围城，邓在绥时间，寇病逝榆林），邓于事后总说幼梅是在反共气氛包围中窒息而死的，言下不胜悲愤。邓一向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此时总想脱身。所部将士如胡景通、胡景铎兄弟、曹又参等，亦均在暗中反对内战甚力，胡景通因此一度被蒋介石免职，且几于判刑。后经邓通过于右任、徐永昌等多方设法，始得复职。邓于一九四五年冬由榆林至归绥，会见傅作义，演了一幕“共患难”的喜剧，其后胡景铎、曹又参也于榆林、绥远起义之前，就率所部奔赴了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惨胜”以后一个时期的榆林情形，大致如此。傅作义部回到归绥以后的情况就较榆林“热闹”多

了：送走了留下的日军，收编了伪蒙军，安置了为虎作伥的汉奸，总之是包罗一切，“团结”一致，坚决执行蒋介石反对八路军、抢夺地盘的部署。到了冬季，傅部杂牌军对解放区的蚕食、进攻，不断遭到失败，形势极为紧张，于是有绥包围城之役。绥包铁路未断之前，不少从陕坝“凯旋”归来的官儿们，把“劫收”的战利品带上又返回绥西去了，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在此时，邓宝珊带了少数随员与骑兵卫队，从榆林到达包头，又匆匆乘绥包铁路几乎是最后一列火车赶来归绥。傅作义大喜，把邓迎入归绥新城“德王府”（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疆时之官邸），以贵宾般招待起来。邓抵绥之次日，绥包铁路中断，傅派董其武、何文鼎山归绥飞包头守城。何军已在进攻解放区时受了很大的损失，包头守军主要倚靠所谓“十路军”（由伪蒙军改为此番号的）和一个所谓“交警队”。

“十路军”是日本装备，“交警队”是军统武力，美国装备，二者武器俱较傅部精良。那时在包头还有个无聊的冯钦哉，专讲些阴阳宅、堪舆学一类鬼话，就这样，董、何和帮闲的冯钦哉，在包头折腾了一个时期。归绥与包头交通断绝后，在围困中一筹莫展，邓在此紧急时期来到归绥，可以说是无意中与傅“共患难”了。这样，邓、傅之间也加深了友谊。邓来不久，一夜称：傅有意与延安方面“求和”，嘱笔者草拟电稿，拟由他从榆林与南汉宸联系。过了两三天，邓说那个电稿不用了，傅有顾虑，怕蒋知道，引起麻烦。

邓在围城中无所事事，傅几乎每到深夜即来邓处晤谈，也没有涉及什么重要事项。

在这间期，邓极力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是主张国共和谈，成立联合政府的。屡次同笔者谈及，他不作封建官僚军阀的保镖，他在国外没有存款，也绝不去做“白华”。虽在围城

中一筹莫展，总是乐观而向前看的。他这风度，对傅，特别是傅部一些较高级的干部，不能不有所感染。同时，在傅部个别军官及绥远地方个别人士之间，也起过一些调和作用。如傅起用刘万春等，都是经邓斡旋促成的。还有围城期间与傅“共患难”的绥远地方士绅，如省参议会议长张钦，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前者于抗战期间与邓相识，后者与邓在榆林相处更久，他们都受邓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的思想影响较深。围城期间，绥远新城弹丸之地，邓也没有什么活动地方，只能到相距咫尺的张钦处闲谈（其时荣也移居张处）。在此期间，邓的反蒋发动内战，称许共产党、八路军言论，发挥得更多。后来张、荣等人积极响应酝酿参加“绥远起义”，与此大大有关。

绥包解围已在一九四六年初，邓当即飞赴阔别多年的北平。这时平绥路早已交通断绝，归绥包头一段火车，于这年春节前恢复通车。春节过后，傅部留在陕坝的大部军政人员、眷属又陆续“凯旋而归”，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蒋帮嫡系人物，特务组织，也全班人马搬回来了。乌烟瘴气，有甚于抗日战争以前。

邓在北平住个把月，春节后不久即又飞回归绥，很快就飞返榆林原防了。邓在北平期间，北平军调部已成立，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共中央在北平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折冲樽俎，进行谈判。邓派笔者与徐冰同志约定同叶帅见面的时间、地点。很快叶帅就和邓会见了，可能谈了不止一次，谈话内容不悉。邓在北平故旧甚多，每日宾客盈门，酬酢频繁。重要活动就是和叶帅的晤谈。还有当时在北平的不大公开的民盟负责人士，邓也派笔者先事往约时间、地点而晤谈过。（绥包围城和邓此次在北平期间，笔者又一度当了邓的私人秘书。）

当时的北平，“劫收”大员满天飞，闹得“有条（金条）

有理”，天怒人怨。另外，美国兵取代了日本兵，横冲直撞，酗酒肇事，乱砸跳舞场，强奸女学生，肆无忌惮，无所不为。街头则到处见有啼饥号寒、卖儿卖女之人。惨象不忍卒睹。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春节后飞离北平的。邓由北平经归绥飞返榆林原防后的情形暂且不说，下面略述绥包解围后傅部的情况。

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傅作义将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向蒋介石紧紧靠拢，在从事反共内战中，按照蒋的部署，极为卖力。一九四六年，起先是假和谈，真打仗，边谈边打。在归绥，傅和马占山接待过三人小组的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马歇尔，中共方面的地区和谈代表潘纪文也在归绥驻留过。但这些丝毫改变不了傅紧跟蒋发动反共内战的决心和部署。卒至一面派周北峰为代表偕同潘纪文到绥东表示求和的“诚意”，一面倾巢出动，攻入集宁等地，周北峰被蒙在鼓中，替傅当了一任“来栖大使”^①，在解放区呆了很久。

十月间傅部侵占了集宁、张家口，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内战赤裸裸地揭开，蒋也粉墨登场要当总统了。

傅从绥远把地盘扩展到察哈尔，十一月由董其武任绥远省政府主席，CC系的潘秀仁当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傅的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到张家口（旋即改名为张垣绥靖公署），傅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丰川任张家口市长。傅部为蒋家王朝大卖力气，不但在平绥线上，而且一度曾派安春山（安于集宁战役后升为军长）部远至东北作战。一九四七

①来栖大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进攻珍珠港事件^②，派来栖去美国商谈，在商谈中，日本出兵进攻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

年冬傅又加官晋级，当了“华北剿总”总司令，踌躇满志，愈陷愈深。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两年邓宝珊在榆林也受了煎熬，他和高双成的旧部，无不厌战，有的已经起义（如胡景铎等一九四六年秋在横山），有的想离开榆林向远方移动。可是蒋的嫡系如徐保军进驻榆林，邓也奈何他不得。经过榆林一次围城，邓本来命令他在榆林外围的甘肃子弟兵迅速撤退，不准与八路军接触，但因受到徐保军的牵制，未及时退回，致遭惨重损失。

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侵入延安，一时似乎不可一世。邓由榆林飞延安与胡会晤一次。见胡的“雄材大略”只不过是把西安的“排场”都搬来而已。西安来的西餐厨师，西安来的身着雪白外衣的侍者，西安来的这、来的那，酒食征逐，依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那一套。邓此行是败兴（不是“乘兴”）而来，又败兴而去。南下找胡宗南，一团漆黑，北上找傅作义看看吧，于是邓于十月底飞抵张家口与傅会晤。这时傅在张家口已感到难于应付，傅部各驻地和邓部从榆林不断传来告急电报。有时傅绕室彷徨，邓枯坐凝思，彼此久久不语。一次傅忽咬碎了一枚牙齿，才于叫骂声中打破沉寂。邓在张垣勾留这几天，起先是榆林来电，一再催促其飞返榆林；突然有一天连来数电，称榆林机场已在解放军射程之内，有一架由西安抵榆林的飞机于降落时被击毁，请邓千万不可飞榆。邓只好由张垣飞包头，渡黄河从旱路返回榆林。

邓这次在张家口与傅会晤，满肚子话竟不能对傅说一句。因为傅此时以蒋王朝为正统，决心做孤臣孽子，做着扩充武力、扩充地盘⁴的迷梦。邓则认为蒋的败局已定，现在是考虑他自己出处的时候了。中共已辗转告知要他当西北联军总司令，他对此时是否即奔赴解放区，犹疑未定，同时榆林蒋介石嫡系军队压力甚大，邓也不能贸然有所动作。这些邓此次本想向傅吐露，

一看傅当时的“坚决态度”，当然就不便说出了。另外，邓此时也没有下定决心，似乎还想有一个和局，所以也一面派人到太原围城中去见阎锡山，观望探听一下情况。

在张时期，有一夜，在秦丰川家里约着高双成、高双成幕僚张濯清等少数人谈了一次，分析当时形势，认为蒋介石败局已定，傅部目前保有的实力，支撑不了多久，失败也是肯定的。但这只能是背着傅谈，邓、张这些人此时都不能对傅直说。

邓就是在这种毫无所得的情况下，由张家口飞抵包头，次日即由包头渡河，经东胜返回榆林的。

傅自从侵入张家口也折腾了一阵子，一九四七年入冬傅就成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孙兰峰任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一时傅的势力范围，察绥两省外，还扩展到河北部分地区，北平至包头的铁路也勉强运行过几天。但已是到处挨打，穷于应付的局面。就在一九四七年底，傅到北平不久，涞水一战，傅部军长鲁英馨兵败自杀，师长李铭鼎阵亡，傅本人哭泣一夜，但仍打肿脸充胖子，宣传在涞水打了大胜仗。进入一九四八年，傅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一再挣扎，一直到了这年十二月底，新保安之役，傅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张家口最后解放，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察哈尔省最高军政首脑孙兰峰只身而逃，傅的另一军长安春山也于进援新保安时，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北平。这时董其武困处绥远一隅，傅也只好困处北平城内了。

邓在榆林，经过一九四七年两次围城以后，进入一九四八年更是心灰意冷，急欲脱身。上半年在三原家中呆了一个时期，但榆林的残局还得回去收拾，于是一部分原高双成的部队和邓的残余甘肃子弟兵，逐渐移驻包头滩上，设总部于包头，与董其武部靠拢。这时他已成了傅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原

高又成部留在榆林的部队由左世允率领起义。后来胡景通任开到包头的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一九四八年底，包头一度解放，邓事先率部退至河套地区。董其武在绥远惊慌了一阵子。进入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夕，在归绥的潘秀仁等国民党死硬派和张钦、荣祥等地方人士主和派，在董其武面前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执，潘等主张董立即向河套撤退，张、荣等则挽董坚留绥远，听傅命以定行止。最后董没有走，潘等一伙人则西去，有的后来逃往台湾。

一九四八年底，傅的“本钱”可以说已经输光了。他困处北平城内，几乎要发狂，这时邓也又率残部回到包头，傅派专机把邓接到北平，共商大计。其时飞机只能在北平城内降落。傅亲自迎接邓，同乘一车返回官邸。就在汽车上，傅不断狠狠打自己的耳光，弄得邓也不知所措。原来自从新保安三十五军被歼，张家口解文以来，傅总是这样不断地“自批其颊”，以泄怨恨。在他左右的王克俊、阎又文等人，也急得无可奈何。为了防止其夺枪自杀，亲随卫士都是徒手侍奉。傅的女儿冬菊，当时已是地下党员，从此奉命昼夜陪伴她的父亲，加以宽慰。北平和平起义也于此时逐渐酝酿成熟起来。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李济深即由香港给傅写一亲笔信，派梁漱溟的大弟子张云川秘密携至北平，由梁的另一弟子李渊庭辗转递到傅的手中。李济深的信，劝傅背弃蒋介石，投向解放军，有扩展第三势力之意。傅当时手头尚有“本钱”，对李来信置而未理。现在时移势异，有邓和冬菊的劝说，有北平地下党的各种策动，傅始决定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北平和平起义的号召。

先是，傅作义派一个主办平明日报的崔载之出城与解放军联系，因人微言轻，毫无结果。接着傅便派周北峰偕同张东荪，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出城接洽。周当了

一任“来栖人使”后，已于一九四八年恢复和平谈判中以“周北峰将军”的身份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张东荪此行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一切谈判事项由周进行，周先后见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诸人，商订了北平和平起义条款。周在傅部始终处于客卿地位，此行尚有某种不便之处，于是又由邓宝珊作为傅的“全权代表”出城与聂荣臻元帅等多人见面，作最后决定。本来周第一次出城所商条款，包括天津和平解放在内，而傅竟拖延了时日，邓出城挽回和谈陷于破裂之危局，时天津已解放。傅讨价还价的幻想破灭了，只得由邓负全责完成这件事。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最后邓与周返平复命临行时，有一封由聂帅等高级将领签署的致傅作义将军的公开信，交周转傅，周不敢答应，将原信交邓，邓阅后收起，返回北平后亦未即时交傅。邓认为此信当时傅决不接受，如立即交傅，反会使和平解放发生波折。经过邓与周秘密往返北平城内外的商谈，北平于一月底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进入北平城）。一切就绪之后，定于二月一日出版《人民日报》，第一天就要刊登邓尚未交傅的那封公开信。此时邓始把信交傅，傅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但又不好对邓发作，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追认”了事。但因此《人民日报》推迟一天于二月二日出版。

这期间，傅总是闹情绪，直至借邓飞石家庄附近与毛主席见面后才大有转变。邓在抗日时期与毛主席会晤过多次，傅是首次见毛主席。当时傅着军装，行军礼，庄严肃穆，不苟言笑。嗣与毛主席单独作较长时间谈话一次（傅任水利部长，即于此次决定），此后傅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但“自批其颊”那种发狂似的举动没有了，而心情神态也马上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了。邓事后对人说，不知毛主席是如何以一席话就能把傅宜生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的。邓这次对毛主席说不该打榆林，

毛主席说两次围攻，有一次还是该打的。邓任甘肃省主席的事，不是这次决定的，是毛主席进入北平后提出来的。

傅、邓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是尽了大力的。酝酿起义，极为秘密，稍一不慎，便会出乱子。因为傅本身没有什么实力了，但北平城内外，仍有所谓几十万“中央军”，而且北平城内特务也在破坏和谈。邓与周北峰往返北平城内外，不但在城外遇到过“中央军”的盘查和误入城郊地雷群的危险，就是在城内也是有人欲得而甘心的。傅能把几十万“中央军”稳住，把秘密和谈之事，甚至瞒过他自己的不少高级幕僚和将领，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邓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到达北平，直到九月间偕傅赴绥远促成绥远起义，在北平住的时间是抗日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次。这期间有些事似可谈谈。

解放后不久，傅曾在城外钓鱼台住过一个时期。有一次，傅邀邓出城午餐，邓乘车出城时，为守卫城门之解放军所阻。时邓尚着国民党军装，卫兵不放行，邓便下车进入守卫室，与正在开饭的解放军攀谈。解放军问：“你是反动派吧？”邓答：“是。现在反不动了。”（“反不动了”一语以后传为“佳话”）经过不短的时间，陶铸同志亲自来了，才把邓的汽车放行。

傅、邓特别是邓这半年多在北平比较轻闲。邓是较有文化修养的，对于国画、书法，有一定鉴别能力，也读熟不少古今人的诗词。这时也影响傅欣赏一些文物古迹，对于一些著名老画家也加以照顾，齐白石是邓早已熟识的，以索画为名，使傅予以重酬，对于可与齐白石并列而较清贫的如陈半丁等人，邓也怂恿傅加以礼遇，赠予画金。早在抗日战争以前，邓就以广交游见称，在文艺界也结识了不少人。此时如梅兰芳这样的艺术

大师，已返北平。一次梅访邓时，邓寓所附近围观“梅郎”者渐众，竟使交通堵塞多时。傅对邓的风雅颇为称许，有时亦笑谓：“古画赝品，一经宝珊品评就弄假成真了。”邓亦不以为忤。总之，在这短时期中，傅、邓度过了一段比较轻松的日子。

上述片断，傅、邓也不过是忙里偷闲，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许多事要处理的。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还留有一个绥远问题。这时傅的两员大将董其武、孙兰峰在归绥、包头几成对峙之局。邓由榆林带出的陕甘部队，也由俞方皋、胡景通、杨仲瑛等统率驻在包头城内外，当时邓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还设在包头，这支军队是邓在北平遥控的。

“绥远方式”这是党中央早已决定的，所以当时这一地区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但国民党政府却用各种方法加以破坏。

解放区派有一个以潘纪文、鲁志浩为首的代表团，住在归绥，商谈和平起义。因为特务在大白天公然杀害了代表团成员王士鑫同志，潘纪文于柩棺痛哭之后，把代表团撤回丰镇，行前董其武还设宴为潘送行（笔者亦奉陪末座，曾目睹其尴尬不堪之状）。此时归绥市上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有一小部“土兵”在街头“示威”，砸《奋斗日报》，闹得董其武哭笑不得。原来董当时虽系绥远最高军政首脑，但所属杂牌部队有似土匪，即所谓正规军也步调不一，不完全听董指挥。孙兰峰由张家口只身逃出后，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和不少杂七杂八的“文武人材”，开府包头，与董分庭抗礼。所以董此时处境极为困难。可是绝大多数军政人员、地方人士，还是坚决拥董，准备起义的。傅也不断派大员如张濯清诸人来绥，协助董处理一切棘手问题。到了九月间，可以说“绥远起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仍须傅、邓亲自来绥包

处理，于是秉承中共中央指示，傅、邓于八月底由北平开专车来绥（在此之前绥包段铁路尚未与平绥路全线接通），中央特发给傅劳军钜款现洋若干，傅本人亦携带劳军钜款及其他物品颇多。傅、邓到达之始，既未在归绥驻，亦未进包头城，只在绥包路中间之美岱召停留下来，召见军政人员，特别点阅了部队，发放饷银，安定军心。然后进驻包头，准备起义之事。这时董其武坐镇归绥，“礼送”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人员至包头，大小特务一时麋集包头，煽动闹事，包头城内出现有反对傅、邓的标语。另一方面在绥的一些军政大员、地方人士，也集中到包头，在傅、邓周围展开动员参加起义的活动。最后，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专机飞来包头，妄想分化傅部，并妄图拉傅、邓南下。徐与傅、邓有多年交谊，傅、邓在北平和平起义后，徐即一度飞至河套，拉拢董其武西去，董听傅命以定行止，当然不为所动。这次徐最后竟来拉拢傅、邓，岂非梦想。新政协首届会议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开幕，十月一日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绥远起义必须于二十日前完成。这几天北平与傅、邓电报频繁，极为紧张，周北峰代表傅在北平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报告，随时向傅转达周总理的指示。绥远起义的通电准备于九月十九日发出，这之前，徐永昌还称病不去，想设法破坏。最后傅下逐客令，由邓婉辞告徐，徐始离去。同机而去的有国民党大小特务张庆恩、祁党民和国民党绥远财政厅长张遐民等人（事后笔者曾询邓为何当时不把徐扣下？邓只是说“不可能”）。

徐永昌走了，也带走了一些专事破坏起义的人，消除了这方面的干扰。另外有些傅部带兵官，包括杂牌军的土匪头子，也没有人敢公然反对。只是对孙兰峰费了不少唇舌，几经周折，最后孙终于表示跟傅走到底，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通电连夜

发出，傅、邓偕孙立即专车离包，过绥略作停留，赶赴北平出席二十一日的新政协，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盛会。

一九五〇年元旦，成立了由董其武、杨植霖为首的绥远省人民政府。春天成立了以傅为首的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傅、邓亲自来绥，这时邓已受命即返兰州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职，这次是最后一次来绥。傅对原绥远参加起义人员讲了话，谆谆告诫加强改造，革命到底，他领导大家走上了正路，以后就看大家自己的努力如何了。邓也慰勉他从榆林带出来的陕甘子弟兵，他们都改编为解放军了。原绥远部队于起义后改编为解放军，不久董其武率部开赴河北，并曾一度出国参加了抗美援朝。

(四)

邓回兰州就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后任省长）。从“七七事变”后到一九五〇年，他离开家乡已有十三年之久。今于共庆解放的同时，个人却有沉痛的悲伤。因为抗战时期，兰州的崔夫人和一子一女，压死在防空洞中。他在兰州有一花园，通称“邓家花园”，这时已成为上述死者的墓地，于右任给作了“慈幼园”的题字。好在三原的张夫人和子女时已移居兰州。

邓回兰州不久，发生张维自杀事。张字鸿汀，甘肃巨绅，邓一向推许其为甘肃造诣较深的学者。解放前张曾当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大约是因此种种原因，解放后受到一些压力，故自戕。邓闻讯后，大受刺激，亲往吊唁。数年后谈及，犹不胜悲怆。

镇反期间，兰州大学有一留学欧美的教师被判刑处死，邓

事后到京，亲向毛主席称此人有用，不该镇压。毛主席对邓说：“你当时来个电报就好了。”

上述两事外，邓对那时甘肃的引水上山，谎报粮食产量等等弄虚作假之事，亦均不满。但反右前后，他的旧部有戴上右派帽子的，有受其他更重处分的，他本人也当过批判对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被毆后，即与北京通话，向周总理泣诉，次日总理即派机从兰州把他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在此期间也曾往他处疗养过，最后在北京病逝。

傅任水利部长后，最初几年，外出视察，多所擘划，很辛勤工作了一阵子。后来心脏病发作，几次抢救脱险，就养病的时候多了。解放初，毛主席曾有意要傅将旧部组成一个党派，傅与邓及左右几经商讨，愿居于无党派民主人士地位，毛主席亦以为宜。后来中央要邓担任民革副主席兼甘肃省民革的主委，邓才参加了民革，傅则始终处于无党派地位。

傅、邓在北京经常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与日俱增。一九五〇年国庆后不久，傅即对人说：“我们真正参与了国家的大事，这是从前所没有的。”这当时大概是指抗美援朝这些重大国事的决策而言。傅欣悦快意的神态，为几十年来所仅见。邓对毛主席也是畅所欲言，备受嘉许。如前述所提甘肃镇反事，即为一例。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译本全文于我人大开会期间传阅后，一天毛主席从会场邀邓一人午餐，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邓询苏共党内为何不早批评斯大林，毛主席称，这是要杀脑壳的事，没有人敢说。邓谈可继续多出《毛选》，毛主席谦称，“还有人看吗？”

邓虽常住兰州，文化大革命前几乎每年都来京一次，有时系参加会议，有时也是疗养性质。那时有医护人员陪同，受到

良好的照顾。一九六二年夏，邓在颐和园休养一个时期。一天杨明轩、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特来探视，闲谈中，邓、杨、邵均对“三面红旗”有所非议，咸称本来国家经济建设已有进展，经此挫折，又陷困境云云。他们的议论，使听者为之咋舌。彼时王芸生、曹谷冰两先生发表旧大公报回忆录不久，其中涉及张季鸾，邵亦谓对张有失之过苛处。

邓在京逝世前，夫人张玉燕已在兰州故去。其后杨明轩逝世，南汉宸遇害，邓亦大受刺激，致神经时或失常。病中又缺周密医护，卒因心脏病突发未能及时抢救而长逝。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京隆重举行了追悼会，悼辞中对他的生平予以很高的评价。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于呼和浩特）



回忆华北人民政府 驻归绥联络处

青志浩

一九四九年六月，华北人民政府为了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绥远方式”的方针，根据华北人民政府与傅作义、董其武“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决定在归绥设立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联络处的处长是潘纪文（前中建部副部长），下边有联络处主任鲁志浩（前内蒙人委代理秘书长），还有曹文玉（前呼市副市长）、何树声（前包钢副总经理）、李贵（前呼市市委书记）、于峰（前包头市委统战部长）、李文超（前包头市物价委员会主任）、张露（前呼市委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银行工作组组长张光（前内蒙农业银行行长），一个铁路工作组组长郎觉民（北京铁路管理局局长）。联络处工作人员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进归绥城的，来时还带了一个警卫排，一部电台。

当时代表傅、董方面与我们联系接洽的人员，有张国林（前在内蒙人民出版社已故）、康保安（前在内蒙水利厅）、王景泰（原在内蒙政治学校，已故），后来增加了王克俊（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住在新城西落凤街（后来搬到德王府）。银行工作组，住旧绥远省银行，铁路工作组住呼市火车站。派这两个工作组，是原打算条件许可时，早日实现绥东解

放区与归绥通车，和早日在归绥发行人民币，整顿绥远金融。

七月中旬进城以后，由潘纪文同志负责与董其武商谈如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并分别与地方知名人士张钦、于存颢、荣祥等人谈话，说明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和联络处的任务就是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银行和铁路方面在谈判期间，解放区与归绥可首先通火车，并统一币制沟通商业来往。

正当我们建立与各方面的联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的时候，突然于七月下旬的一天，铁路工作组的一部分同志，从旧城回车站，路过现在的联营商店附近时（当时都是空地，有许多树木），被武装特务所袭击。工作组的同志有两人受伤，其中王士鑫同志（铁路工作组秘书），因伤势过重，入院后牺牲。这是蒋介石特务集团破坏和谈，企图挑起战争的阴谋事件。

此事发生后，因蒋介石系统的特务继续进行破坏，决定除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曹、何两人老家均在归绥，便于工作）及一个警卫员刘汝海（前在锡盟盟委工作）坚持工作外，其余全部人员和两个工作组，由潘纪文同志率领撤回绥东解放区。

当时，绥远军政集团，对和平解放问题，有两种态度。傅、董嫡系主张和平解放，蒋介石特务集团主张对解放军先打，后撤并南下。根据解放以后公安部门所得的材料，特务杀害我工作人员的事件，就是董其武部队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策划的，他们企图杀害我联络处负责人，因为得不到机会，就杀害了我铁路工作组人员，并以此破坏和谈，挑起战争。

谋杀我工作人员事件发生后，一时街上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一天中午，一个便衣特务曾冲进联络处院内，见我们警戒周密，未能得逞。联络处留下的几个人，曾有些天不能外出，只是遇

有来联络处的人，才能对他们进行些工作。

过了些天以后，联络处留下的人又外出开展工作了。当时主要是宣传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并与董其武方面研究执行和平解放的协议问题，促成早日和平解放，并搜集情报，了解情况。我们曾访问过工厂、医院、学校，访问过杨令德（现内蒙政协副主席）的书店，李健生（地下党员，曾任内蒙建筑干部学校党支部书记）的书店，访问过当时主张和平解放的地方知名人士张钦、于存灏、荣祥（解放后，都曾任绥远军政委员会的委员）。通过各种活动、社会关系，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大约在七月中旬或下旬，鲁志浩曾回丰镇向绥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汇报工作。领导机关指示留在归绥联络处的人要大力宣传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坚决不变。要求各方面有关人士，努力作好工作，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另外，旧绥远省立医院副院长李汇文（现包头医学院副院长）比较进步，董其武下边的人排挤他，想把他赶走。经和解放区杨植霖主席商量，不准他们排挤他。鲁志浩回归绥以后，曾找董其武将军谈，表明我们是坚持和平解放绥远方针的，希望他们努力作好工作，争取早日解放。并告诉他李汇文有技术，解放后也还是需要这样的人材，请他告诉卫生部门的人，不要排挤他。如果一定要把他排挤走，解放以后，我们有权把他带回来。联络处还邀请部分绥远省级机关负责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人士开座谈会，向他们讲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希望他们在争取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绥远省委通知鲁志浩回丰镇，省委告诉他：中央请傅作义将军来绥远，对他的部队进行工作，促其和平起义。叫鲁等待傅从北京坐来的软甲列车到丰镇时，和傅

同车到归绥。潘纪文同志是和傅同车由北平到丰镇的。潘由丰镇下车，鲁志浩由丰镇上车。原定傅作义到归绥不下车，直接去美岱召，后到包头。鲁到归绥以后，即下车回联络处。因为到了归绥，已经到了傅、董部队管理的范围，我们就不陪傅了。火车上有华北军区给他带的一批白洋，准备给他的部队发饷，还给他派了一部电台，准备叫他随时和北京联系。省委还说：他们（指傅等）到归绥后，如果有什么情况告诉你们，或者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省委。

因为鲁从丰镇上车时，正是半夜，第二天早起才和傅作义见面，向他说明是由丰镇上车，陪同他通过解放区，到归绥后就下车，潘纪文同志已从丰镇下车了。和傅同车的有邓宝珊、王克俊、李世杰、刘乃济等数十人。

原来傅作义来绥远之前，曾派张濯清（解放后呼市副市长，已病故）、安春山、王克俊等人先来找他部队的高级将领作过工作，我们联络处的人也都和他們谈过如何进行和平解放的工作问题。

傅到包头后，据了解，把他部队中的军长、师长和地方上的知名人士如张钦、于存灏、荣祥、杨令德等，都召集到包头开会，研究和平起义问题。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庆恩在包头活动得很利害，拉拢高级将领反对起义。也确有个别高级将领坚持过反对意见。蒋介石还派徐永昌坐飞机到包头，作争取傅作义、董其武的工作。但不久，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和党的正确的和平解放方针政策的威力影响下，在“九·一九”前和平起义终于酝酿成熟了。“九·一九”前夕董其武、王克俊派人将“九·一九”起义通电和签名名单，送到联络处。鲁志浩于“九·一九”前一天携带材料回丰镇向解放区党政领导作了汇报。

“九·一九”起义后，接着是全国政协开会。政协会后，高克林、姚喆等同志在华北局和华北军区领导下，和傅作义、董其武等研究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以及关于部队改造、军官训练等方案。我也随高、姚参加了些秘书、参谋工作。党政军领导机关进城以前，省委又叫我们联络处在归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军政和社会情况，提出了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和各团体进城后办公住址的方案。我们研究提出方案以后，经向省委作了汇报，才确定下来。此间，联络处又增加了金毅同志、刘志远同志进行妇女和青年工作，潘纪文同志又回来领导了联络处的工作。党政军领导机关进城后联络处的工作即告结束。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辑 - - 绥远九一九起义史料专辑

作者 =

页数 = 2 5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